

目 录

§ 回 忆 录 §

- 我的回忆 李坚贞(1)
我所了解的徐明清同志 孙达生(59)

§ 综 述 §

- 陕甘宁边区概述 《陕甘宁边区》编辑组(71)

§ 专 题 资 料 §

- 彭德怀受命率师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
..... 张 希(111)
建国初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肖健宁(160)
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文告和谈话资料
摘编 周大计(181)

§ 人 物 介 绍 §

- 刘少奇在盐城 王世谊(206)

§ 民国史·现代史 §

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 陈立明(218)

§ 史实考订 §

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人数诸问题的考辨
..... 周兴梁(255)

我的回忆

李 坚 贞

按：李坚贞同志系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26年参加革命，曾任闽粤赣特委妇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福建省委妇女部长，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长征后在中央纵队任干部休养连指导员。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又先后任东南局妇女部长，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兼党校主任，华中局民运部副部长，华东局妇委书记，山东分局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南分局妇委书记，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粤中区党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监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这里发表的是她长篇回忆录的一部分。回忆录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杨起君同志帮助整理而成。

一、初到中央苏区

我于1907年1月（清光绪三十三年腊月）出生于广

东省丰顺县小胜乡的一户贫农家庭内。父亲李目除租种地主的几亩水田外，农闲时兼作泥水工养家糊口，母亲王好，也是一个很能干的农村妇女。我在兄妹中，排行第二，出生八个月，因家中贫苦便被以八吊铜钱身价，卖给本县百溪村蕉头窝朱跃宏家做童养媳。养父母也是贫农，对我十分疼爱，给我取名见珍（1940年我改名为李坚贞）。我是他们大儿子朱日犬的童养媳。我的丈夫在外面读书，接受了新思想。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革命家、活动家彭湃为进一步发动广东农民运动来到了我们家乡，并住到了我家。在彭湃的指引启发下，也在我丈夫的影响下，我参加了革命，以后家乡成立区农协时，我当选为区农民协会的代表。1927年6月，我由刘中天、朱翠英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反动派的武装屠杀，广东东江等地相继爆发了党领导的“年关暴动”，在暴动中我负了伤。伤好后，我在1928年10月当选为丰顺县革命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分工负责妇女工作。1929年1月，东江特委从潮安迁到丰顺。不久，我又被调到东江特委妇委工作。这时，东江地区八乡山、九龙嶂、铜鼓嶂三块小小的红色区域已联成一片，就在这年春末夏初建立了饶（平）和（平和）埔（大埔）党的中心县委，我便和其他三位从东江特委来的三位同志一起参加了县委工作，我任妇委书记。1930年初，我又从饶和埔中心县委调到闽西特委工作，从此进入中央苏区。

(一) 和村巧遇张鼎丞

我从广东东江进入中央苏区，纯属一次偶然的机遇，那就是在饶和埔中心县委的一次会议上遇见了张鼎丞。

1929年秋冬，我在饶和埔地区的罗村一带做群众工作。当时，东江特委刚开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党的“六大”和广东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得到贯彻，纠正了过去一些“左”的做法。根据东江特委指示，我们把根据地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两类，在巩固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在游击区，则只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在分田地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田，其它的土地没有动，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也没有没收私人的商店、作坊。这些做法，群众很拥护，土地革命的热情很高，群众发动得也比较充分。一天，县委通知我回和村开县委会。在这次会议上我汇报了罗村一带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以及我们对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发动群众的一些具体做法。没想到闽西特委的领导人张鼎丞正好来饶和埔视察工作，参加了我们的县委会。张鼎丞听了我的汇报，很感兴趣，说：“这位女同志的发言很好，她对政策执行得好，很会做群众工作。”散会后，他又找我聊天，详细询问我的家庭、工作经历等等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他说：“好！好！”。不想在和村这次会议上与张鼎丞的相遇，就成了我日后进入中央苏区的契机。

几天以后，张鼎丞回闽西去了，东江特委巡视员黄炎同志告诉我说：“由于饶和埔根据地和东江特委之间隔了一条韩江，沿江各渡口都有敌人驻守，来往交通不便，上级

决定将饶和埔县委划归闽西特委领导。我们原从东委来的四位同志仍要回东委另行分配工作。”1930年1月，黄炎、邱忠海、李云香和我四人，便离开和村回东江特委。我们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韩江边，天色已晚，没有找到渡船，过不了江，就在江边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正准备过江，突然饶和埔县委的通讯员连夜赶来，通知我们说：“组织上已决定调李见珍同志到闽西去工作，她不要过江了，我马上送她去闽西。”就这样我和他们三人在韩江边分别，谁知这一别竟是永别。他们过了韩江，回到东委。不久，黄炎被叛徒杀害，邱忠海牺牲，李云香下落不明。我算幸运，到了闽西，而这一转机，对我一生的道路有着决定的意义。

我随通讯员从大埔走山路，到了福建省永定县的湖雷。我们是1930年1月30日到，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正月初一，我在湖雷过的春节。在湖雷接待我的是范乐春。范乐春参加过永定起义，是永定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一，当时，她还兼管闽西特委妇委的工作。我到永定不久，张鼎丞便要我接替她，负责特委的妇委工作。我在永定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因特委机关在上杭，我便到了上杭。不久特委要我带一个工作组，随部队到长汀、连城一带去做群众工作，我便带着工作组随部队行动。

这时，正是“立三路线”时期，上级命令闽西红军去攻打东江、夺取广州。记得有次特委的领导和红军的领导在上杭的白沙开会，讨论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会上争论得厉害。以后又到涂坊去开，还是争论这个问题。张鼎丞和李

明光都不同意打东江，但上级决定还是要打。有次李明光对我说：“红军要打东江，我们准备回广东去。”我那时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回广东的准备。结果红军几次攻打东江都失败了，我们也没有回广东。在主力红军攻打东江的同时，闽西的部分红军和赤卫队就攻打长汀和连城。我带着工作组跟着这支部队做群众工作，约在这年的七八月份，正是稻子收割的季节，部队打下新桥，特委指示在新桥成立汀东临时县委，由我任临时县委书记，赖月华任组织部长。我们在新桥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进行减租减息斗争，还参加剿匪，约有一两个月时间，敌人打过来了，我们又随部队转移到畚心、四都一带。同年冬，部队又打下连城，我们跟到连城，在连城成立了临时工委，我任工委书记。我们在连城发动群众，把被敌人打散了的农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又重新建立起来，扩大了赤卫队和红军。准备成立连城县革命委员会。革委会还未成立，特委通知我到龙岩去开会，我便离开了连城。

（二）参加闽粤赣特委

1930年12月，我到了龙岩，才知道是要我参加闽粤赣党员代表大会。这时，中央派邓发来到闽西，会议便由他主持。邓发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关于成立闽粤赣边特委的决定。会议还选举了新的特委领导成员，邓发任书记，李明光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郭滴人（以后是方方），肖向荣任秘书长，我在这次会上被选为特委妇委书记。

1931年2月，由邓发主持特委在虎岗召开常委扩大

会，提出要开展反“立三路线”斗争，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搞不清什么是“立三路线”，我只知道“立三路线”时，解散青年团组织，取消群众团体；还要红军去进攻广东，结果闽西主力红军几次攻打东江都失败了，使红军遭受了很大损失；还有一件事特别使我反感，就是凡开大、小会议都要做长篇大论的政治形势报告，这些报告脱离实际，群众听不懂。有次，我在上杭县白沙召集群众大会，领导上要我在会上做国际形势报告，我的文化程度低，不会做什么国际形势报告，逼得我没有办法，哭着去找特委组织部长李明光说：“我不会做长篇大论的报告，还是把我调回广东去吧！”因为不会做形势报告，成了我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这回反“立三路线”我很高兴，心想以后再不要我做国际形势报告了，放下了思想包袱。还有当时宣传反封建，提倡男女平等这是对的，但有些做法也太过份了一些，如：说男女平等就要男人从妇女的双胯下爬过去，引起群众反感；还搞什么蛇蜕口。我不同意这些做法，但我只是从自己亲身所遇到的几件具体事情，感到“立三路线”是不对的，至于什么“立三路线”的实质等等问题，我弄不清楚。

我在特委负责妇委工作，主要是做群众工作，很少住在特委机关，多数时间是在下面跑，到各县、区、乡和妇女干部一起，建立各级妇女代表会。通过妇女代表会发动妇女群众参加土地革命，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为红军做鞋、做衣、送菜、送粮支援前线；动员妇女送亲人参加红军等等。通过这些运动培养妇

女积极分子，发展女党员，女赤卫队员，选拔和培养妇女干部。各级妇女干部还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童养媳、等郎妹等不合理的婚姻习俗，也直接处理一些婚姻和家庭纠纷。我是农民出身的干部，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特别是对农村妇女的思想、感情和她们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她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也喜欢到群众中去做工作，虽不会讲什么长篇大论的道理，但可以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和她们谈心、交朋友，和她们一起劳动，帮助她们解决实际困难。群众也很喜欢我，他们不把我当外人，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我讲。部队刚打下连城时，我去做群众工作，一天，有一个在地主家当婢女的姑娘跑来悄悄对我说：“我家主人把好多金银首饰都埋起来了，我只告诉你，你不要跟别人说是我讲的”。说罢她又偷偷把我带到埋东西的地方指给我看。我们随即带着部队去挖，果然挖出很多金银首饰和一大堆银元，还有枪枝。我们把银元分给了群众，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并把那个地主从城里的住处拉回来斗争。那姑娘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以后还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妇女干部。

闽西的群众也和我们广东客家人一样，喜欢唱山歌。我从小就爱唱山歌，做群众工作时我更是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群众一起唱山歌。山歌随编随唱没有固定的歌词，于是，我就根据不同的任务，编出不同的山歌和群众一起唱。在扩大红军运动中，特委妇女部在才溪乡抓点，我便在那里组织群众开展山歌比赛。男女群众对唱山歌，一问一答，把扩大红军的意义，全用山歌唱出来，有时从晚上

一直对唱到天亮，一方编不出词来了，就算输了。结果，群众情绪鼓起来了，很多人报名参军。那时农村没有电影，也没戏看，山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也是群众很容易接受的一种自我教育方式，通过山歌来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激起群众的革命热情，可以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各项任务也比较容易完成，唱起山歌，群众在高高兴兴中受到了教育。我和群众在一起唱山歌，不分彼此，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联系群众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时，我们编了许多山歌，时隔 50 多年，绝大多数都不记得了，仅仅记得几首，现录如下：

打土豪

苦人苦伤心；
豪绅不做一身新，
餐餐吃的鱼和肉，
三筒大米酒半斤。
苦人餐餐菜糊粥，
做生做死米半斤。
苦人团结心连心，
拿起扁担打豪绅。

* * *

为红军做草鞋

新做草鞋四方方，
送给阿哥上前方。
哥在前方打胜仗，

后方工作妹担当。

* * *

反对封建婚姻
十八娇妻三岁郎，
夜夜睡觉捧上床，
辛辛苦苦捧到大，
郎大妹老梦一场。

(三) 到长汀当县委书记

1931年秋，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9月打下了汀州，接着又攻取了连城和汀、连、宁交界的广大地区；收复了杭、永、岩老区，闽西根据地大大地扩大了，向北发展到宁化、清流、归化，西部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闽粤赣特委改为闽粤赣苏区省委，邓发已调中央工作，由卢德光任省委书记，李明光任组织部长，罗明任宣传部长，我仍任妇委书记。不久，卢德光携金逃跑，由罗明代理省委书记。这时，由于根据地的扩大，需要许多干部到新区去工作，省委便调我到长汀县任县委书记。

长汀县位于福建西部山区，与江西瑞金交界，是闽赣两省的交通要道，当时全县辖河田、濯田、大田湖、南山、中屋、涂坊、南阳、四都、宣成、畚心、童坊、大埔等13个区，人口约18万。我虽然有几年群众工作的实际经验，也曾在汀东、连城当过临时县委书记，但那时是打游击，时间不长，管的地方也不大，任务也单纯些。现

在要我独当一面管理一个县，要统管建党，建设地方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领导生产，管好全县人民的生活，我感到担子太重怕担不起，加之那时在苏区还没有女同志当县委书记。我就向罗明提出：“我文化低，怕干不好”。罗明鼓励我说：“你大胆干，我派个文化高的同志去当秘书，帮助你学文化”。我那时年轻，才24岁，有股子“蛮”劲，组织上要我干，我就全力去干。

我上任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我负责布置一个假会场。11月，中央要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国民党反动派常派飞机来轰炸苏区，为了使全苏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免遭敌机轰炸，组织上要我在长汀布置一个假会场，迷惑敌人。我们就在汀州西郊去古城的路边，布置了一个假会场。我们在一间茅屋的周围挂满了彩旗。还贴了很多标语，故意搞得很热闹、很醒目。结果真是迷惑了敌人。11月7日，瑞金的大会开幕，8日，敌人的飞机就来轰炸汀州，把我们的假会场炸了，汀州的街道也被炸了，一些店铺被炸毁，受了些损失，但瑞金的会议却顺利开完了。

这一年的12月下旬，闽粤赣省委在罗明主持下于汀州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选出的省委领导成员有书记罗明，组织部长李明光和宣传部长郭滴人等。我在这次会上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大会还正式宣布了我为长汀县委书记的任命，方方被任命为上杭中心县委书记，肖向荣为永定县委书记。当省委机关搬到汀州后，长汀县委就搬到了河田，当时县委各部的领导人是：组织部长钟连

奎（从古城区委调来），保卫部长是阙初茂，宣传部长的名字记不清了，以后郭滴人也被调来长汀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妇女部长是涂新庭，以后是蔡丽珍。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是温必权，政府设有粮食部、民政部、土地部，下面设有土地委员会，妇女代表会，贫农代表会，各级苏维埃代表会，还有少先队（16至24岁），儿童团。陈丕显是少共的巡视员，到长汀工作，童小鹏是儿童团的团长，他们都是长汀人。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曾率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在长汀成立了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但其后不久，红四军回师赣南，长汀又陷于敌手。以后，红军几进几出与敌人形成拉锯状态，长汀成为游击区，直到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闽西与赣南连成一片，长汀才成为巩固的根据地。因此，长汀的工作要从新做起，有些工作比新区还难做。怎样做好一个县的工作，我从工作实践中体会到：搞好工作要靠三勤，即：腿勤、手勤、嘴勤。

腿勤。就是多往下面跑，靠一双赤板脚，走遍全县各区、乡、村，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我随身带一张地图，一个小本子，一个干粮袋，一支手枪，一项竹笠。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一边把我了解到的情况，用各种不同的记号，记在本子上。如：各区、乡、村的基本情况，各项任务完成的情况怎么样，好的划上一种标志，差的划上一种标志，中等的也划上一种标志；哪些地段的土地肥，收成

好，哪些地段的土地瘦，收成差，也划上不同的标志。各地的生产情况，群众生活情况，各项运动和各種組織建設的情況，我也記在小本子上。遇到不會寫的字，就問周圍的同志，有時問不到，就划上一個符號，等碰到文化高的同志時再問。這樣對各地的情況，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數，布置任務時，就可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征糧時，哪些地方該征多少，擴軍時，哪些地方該擴多少，組織互助互救時，該採取些什麼措施等等，我心中有數，任務也完成得比較順利，大家也沒什麼意見。

手勤。就是和群眾一起干活、一起勞動。走到哪里都能拿起鋤頭，挑起扁擔和群眾一起勞動。我在家時，從小就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一般活路我都能很順手的干，無論是下田割禾、插秧，上山砍柴，還是在家燒火煮飯，我都和群眾一起干。通過勞動，很快和群眾打成一片，就能進一步了解到各家各戶的實際情況。例如擴大紅軍是當時一項很重要的任務，經過多次擴大紅軍，積極分子都參軍了，再要動員群眾參軍就比較困難，特別是蘇區搞了肅反擴大化，錯殺了一些好人，有些群眾不敢參軍，一些紅軍戰士也從部隊跑回來。這就要了解各家各戶的實際情況，了解他們的思想，了解他們的困難。確有困難的就不要太勉強，有實際困難的，幫助他解決，思想不通的，做好家屬和他本人的工作，這樣分別不同情況去做工作，任務就比較好完成，群眾也較滿意。

嘴勤。就是多宣傳。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革命的道理，通過和群眾談心，唱山歌等多種形式，做耐心細緻

的思想工作。如：古城区刚解放时，群众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敌人撤退时散播很多谣言，群众把粮食和贵重物品都藏到山里去了，店铺也关了门。我就和区委的干部一起，逐家逐户地做群众工作，向他们讲解党的政策，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又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政策，讲明我们开展土地革命，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富农多余的土地和公田，其他人的财产一律不动，并保护工商业。经过宣传，群众的思想顾虑慢慢解除了，接着我们就领导群众，对地主和富农多余的土地予以没收，分给贫苦农民，而工商业一律没动。在实际行动面前，群众受到了教育，进一步发动起来，敌人的谣言也破除了。

1932年春夏，毛主席在汀州傅连璋的福音医院养病，有一天叫我去汇报工作，他问我长汀县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怎么样？我如实地汇报说：有些地方生产搞得好些，群众生活也好些；有些地方群众的生活还是很苦，粮食不够吃，靠吃菜干、薯干，吃盐也很困难，盐很贵，又买不到。我们只得动员群众种杂粮，种瓜菜来渡荒。毛主席说：你们这样做很好，当个县委书记，要管好大家的家务，要组织群众多种杂粮、瓜菜，晒些菜干、薯干、芋头干、南瓜干、笋干等等准备渡荒。没有盐吃，可以组织群众挖烂屋的旧墙土熬硝盐，过去盐商屯盐的地方的泥土也可挖来熬盐。有盐时，动员群众淹些咸菜，没盐时当盐吃。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编了个顺口溜：“大口小口，每家三斗（指三斗粮食）；大袋小袋，每家三袋（各种干菜）；大缸小缸，每家一缸（指咸菜）”。我走到哪里，就

宣传到哪里，要群众准备这些东西来渡荒。

1932年4月，中央红军组成了东路军进入福建准备攻打漳州，毛主席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汀州召集了有福建省委的领导参加的会议布置打漳州的事。会后，周恩来在罗明陪同下来到河田，召集我们县委领导开会，研究如何做好后方工作，支援东路军攻打漳州。会后，县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了两个模范少先队连，随着主力红军参加攻打漳州，又组织了约500多赤卫队员，参加抬担架和运输。很快红军攻下漳州，缴获了很多武器装备。我们的两个少先队连也装备起来了，去的时候，他们带的是梭标和大刀，回来时已用缴获敌人的枪枝、弹药装备起来。后来这两个连编入了少共国际师，经过训练后转入正规红军。那500多赤卫队员，也用肩担背挑，运回大批胜利品，有枪枝、弹药和金银，还有两架飞机，都放在河田，以后我们又组织赤卫队，把这些东西运到汀州，再由汀州运到瑞金去了。

总计我在长汀当了一年多时间的县委书记，得到很大的锻炼，各方面都有所提高。1933年上半年，福建省委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我因对反罗明路线思想不通，被调离了长汀县委。

（四）闽西的土地革命

1930年初，我到闽西根据地时，正值闽西开始土地革命。当时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田，将其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分配原则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地主、富农与贫苦农民同样分得一份土地；分配

办法是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不是打乱平分）。土地革命使根据地内的贫苦农民第一次得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土地，不交租，不还债，不纳捐，土地税又很轻，每家各户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入大大增加，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他们努力生产，踊跃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这是土地革命的伟大成果。但在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中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抽多补少”的办法，只注意土地数量的平均，忽略了土地的质量问题。结果抽出来的田多为瘦田，好的田都由原主人自己留下了，这就造成了地主、富农留下的肥田多，而贫苦农民原有的土地本来就差，补进来的又是些瘦田，一到收获时肥瘦田的差别就充分显示出来了。贫苦农民有意见，要求调整土地，把肥瘦田搭配均匀，做到各人分得的土地数量上平均，质量上也差不多。1930年6月，毛主席率红四军到闽西，了解到闽西土地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在长汀县的南阳（今属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根据群众的要求，在原来“抽多补少”土地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办法，就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就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会后毛主席前往汀州。而我当时也正在汀东做群众工作。一天傍晚，我接到通知要我赶到汀州福音医院后面北山老古井的一座楼房去向领导汇报工作。我到达福音医院天已经很晚，那时才知道是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开始后毛主席听说我带工作组下乡剿过匪、打过土豪、分过田地。

就笑着说：“呵，你这个女同志不简单哪！”接着向我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群众发动得怎么样呀？开起会来，他们敢不敢讲话呀？参加开会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要求呀？等等。我一一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有时边听边问，加以引导，有时又接过话题，分析议论，阐述革命道理。当我汇报到，对于组织农会，人们的态度并不一致，那些穿着比较好，嘴巴能说的人，就不那么热心，他们说：“我们几辈子没有参加农会，不是一样种田吃饭吗？”这些人开会喜欢挤在前面，他们看不起衣衫破烂，不大说话，站在后面的穷苦人，还常嘲骂穷苦人：“你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无一枚针，懂得什么！”毛主席插话说：“真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无一枚针的人，受苦最深，革命性最强，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一定要认真把他们发动起来。我们不能把工作的基础放在那些穿着得好，嘴巴能说的人身上，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分析”。当我汇报到我们还搞不清参加“三合会”、“三点会”等帮会组织的人算不算土匪时，毛主席指出：参加“三合会”、“三点会”的人，除少数会道门头子外，大部分是穷苦人，他们生活困难，没得吃，有时也自发地去抢地主豪绅的东西。但他们不是土匪，你们不能打，要团结他们。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孤立和打击真正的地主豪绅。毛主席又形象地用散沙和湖洋泥（即一种叫湖洋田的水田里的胶泥）做比喻，进一步向我解释团结的重要性。他说：群众没有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好比一堆散沙，缺乏力量，我们要用湖洋泥把这堆散沙胶在一起，捏成一团，

这就团结得很紧，不会散了。毛主席的比喻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它里面的道理又是那么深刻。我以前仅是凭着我的阶级本能去爱谁、恨谁，碰到比较复杂的情况，就不知如何办好，听了毛主席的教导，使我开始学会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当毛主席知道我是广东人时，又教育我要注意团结本地干部。他说：本地干部土生土长，情况熟悉，夜晚不打灯也能摸着群众家的后门。你们不熟，群众家的大门开着，你也摸不着。

南阳会议后，闽西的土地革命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对以前已分配土地的地方，又进行了土地的调整，群众普遍比较满意，积极投入了土地革命运动，闽西的红军扩大了，根据地也得到巩固和发展。不过这时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如提出了反富农的问题，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同时，富农的土地财产已被没收。到了1931年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政策，在闽西逐渐贯彻，土地革命的政策就越来越“左”，如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口号，以后又开展查田运动，越查越“左”，最后造成许多不良后果。我在闽西工作4年，直接参加了土地革命，对这些“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深有体会，其中记忆犹新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按人口平均分配，还是按劳动力分配的问题。闽西第一次分田时，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以后有人提出，按人口分配是富农路线，因富农家里人口多，按人口分配对富农有利，要按劳动力分配，16岁以下的小孩和妇女算半劳动力，只能分配半份

土地。这个问题一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激烈争论。劳力多的农户没意见，劳力少的就有意见，特别是妇女，意见很大。我做妇女工作，整天在各乡、村跑，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根据地不断扩大红军，贫雇农家里的青壮年男子多数参加了红军，妇女实际上成为主要劳动力，她们分半份田是很不合理的。再说家里人口多，劳力少的生活本来就困难，如按劳力分配，他们分得的土地就少，生活就会更困难。我坚决不同意按劳力分配，但上级规定要按劳力分配，我思想上很不通。

1931年夏，我参加闽西慰问团到瑞金慰问红军，在叶坪见到毛主席，他问起我们闽西土地革命的情况，我就向毛主席反映说：“现在群众对分配土地问题，讨论很热烈，有的人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有的人主张按劳动力分配，还有的说妇女和16岁以下的小孩是半劳力，只分半份土地，妇女和多子女的群众意见很大”。毛主席问我：“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还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好，最好是‘中间不动两头平’”。毛主席说：“要按人口平均分配，‘中间不动两头平’好！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中间不动两头平，即中农的土地不动，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和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地主、富农的田多是屋前村后的肥田，贫农的田多是边远山脚的瘦田，分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肥田和瘦田搭配均匀来分，替贫苦的农民设想得周到一些！”我听了很高兴。我们回到闽西后，有些地方已按劳动力分了田，出了不少问题，以后又改为按人口平均分配。

再一个问题是“青苗跟田走”的问题。1930年的夏秋，我在汀东县委工作，有些区、乡出了问题，县委要我下去处理。我下去一看，很多农民正急急忙忙在割青苗，这时禾苗已灌浆还未成熟农民把没有成熟的稻穗割下来，稻粒打不下来，就把稻穗磨成浆煮来吃。有的农民把菜园种的菜也拔了，连养的鸡、鸭和猪都杀了。我不知出了什么事。一了解原来是农民听说：调整土地时青苗要跟田走。农民怕自己种的作物，将来分给别人，再加上有些人趁机造谣破坏，所以农民急忙割呀！杀呀！我一看情况严重，就逐家逐户征求意见，群众都提出：调整土地时，原来是谁种的庄稼应归自己，不要跟田走。我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就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布：“谁人种禾，谁人收割，一切作物归原耕者所有，不跟田走”，要大家不要割青苗、杀家畜、家禽。这样才把混乱现象制止住。但当我回到县委把这个情况向县委的同志们讲后，有的同志便说我是“富农路线”。因当时提出要打乱平分，青苗跟田走，是在“反富农路线”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实则是一种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就闽西来说当时已不是第一次分田，田早已分了，贫雇农已在分得的土地上种上了庄稼。而当局部调整土地时，再提出青苗跟田走，农民就怕自己种的东西被别人收了，也就出现上述那种乱割乱杀的混乱现象，从而严重影响了生产。

第三个问题是查田运动。1932年下半年，我正在长汀担任县委书记，开始搞查田运动了。但我在闽西已搞了几年土地革命，对土地政策翻来复去，影响农业生产已是

深有体会。我暗暗思忖，我担任县委书记，要负责全县的生产和全县人民的生活，要慎重一些避免偏差。因而对查田运动的态度不那么积极，后来招致了“长汀县的查田运动搞得不好”的批评。到了1933年，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开展起来，而我已因对反罗明路线思想不通，被调离了长汀县委书记的岗位，没有直接领导查田运动，但我被调回省委做妇女工作，仍下去参加过查田运动，这时“查田运动”越查越“左”，查田，查阶级，把一些中农甚至贫农查成地主；地主不分田，扫地出门，剃成阴阳头游街，抓到劳役队去罚做苦工，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地主的小孩也抓去，不给饭吃，不给生活出路，致使不少地主逃到深山里当土匪。地主跑了就斗争富农，富农只分给坏田。斗了富农，中农就害怕，有的就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使贫雇农很孤立。在查田运动的同时，还在革命队伍内部查阶级，当了多年红军和革命干部的地、富出身的知识分子都被开除。这些过“左”的做法，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使根据地内部出现不稳因素。1933年秋冬，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一些地区后，有些群众就“反水”帮助国民党，应该说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些“左”的教训，在我脑子里极为深刻，以至我在1946年领导苏北淮安县和山东莱阳一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以及解放后我在广东领导土改试点工作时，都对当年的经验教训牢记在心。可惜历史上的教训并没有被全党所记取，解放后，我在广东兴宁、揭阳、龙川三县搞的土改试点，后来被批评为“和平土改”。

文化大革命时搞的左的那一套，更是比过去在苏区搞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 我见到的肃社党运动，周恩来对我的教导

1931年初，闽西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还专门成立了肃反委员会。肃反的事全由肃反委员会的人掌握，搞得很神秘。为什么要开展这个运动，我不大清楚，但我负责妇女工作，常在下面跑，曾亲眼看到抓人，当我在上杭一带发动妇女为红军做鞋时，上杭的县委书记刘瑞生，头一天还召集开会作报告，第二天就被抓起来了，说他是社会民主党，以后被杀害了。有些十五六岁的小孩也被抓起来说他们是社会民主党，并对他们施以酷刑，逼他们交代，小孩受不住刑，就把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讲出来，这些人就又被抓起来。此外，凡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多数都被抓起来了，女同志也被抓了不少。还有一天特委通知我回虎岗开会，我和一个叫王勇的同志一起从上杭回虎岗。当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王勇来敲我的门，他说组织上要他马上出发，可能要上前线打仗，要我告诉肖月华一声（肖是王的妻子）。过了几天，在虎岗召开审判大会，要大家都去参加大会，我们都去了。大会一开始，就有几十个人被五花大绑拉了进来，我一看大吃一惊，王勇也在被绑着的人当中，而我还以为他上前线了。大会宣判当场处死17个人，王勇也被处死，我真弄不清楚，好好的一个同志，为什么要处死他，执刑时还不用枪毙，为的是节省子弹。实在是目不忍睹，我们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可谁也不敢乱问。就这样，肃反委

员会的负责人，不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毫无根据的乱怀疑，再加上严刑逼供和轻信口供。结果，乱抓乱杀了许多革命同志，造成根据地内人人自危，不知道哪一天自己遭殃。

后来肃反委员会改组了，但并没有认识肃反的错误，仍然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弄清闽西究竟有没有社会民主党。直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路过长汀了解到闽西肃反的情况，批评了这种错误的做法。以后又派任弼时来纠正，这场错误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才停止。

我那时住在群众家里天天和群众在一起，群众对他们乱抓人，意见很大，特别是抓小孩，对小孩施酷刑逼供，反映很大。很多妇女就悄悄对我说，我就将群众的意见向特委领导邓发和卢德光反映，他们马上追问我：“是不是有反革命？”李明光知道了，马上告诉我：“以后要注意，不要随便对别人乱说。”此后，我思想上产生了顾虑，也很害怕，不敢再提意见，宁愿住在群众家里，不愿回机关，也不敢和同志们多来往，吃饭都不敢在一起吃。由于我的出身好，又常在下面做群众工作，群众对我很好，肃反中才没有受到怀疑。

1931年冬，我调到长汀县当县委书记，肃反运动还在继续。一次省委负责人对我说长汀古城区问题很多，还交给我一个名单，说名单上有的都是反革命，要我带一连赤卫队去古城，把反革命都抓回来。古城是长汀和瑞金交界的山区，是瑞金到长汀的必经之路，红军在这里几进几

出，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时重又解放了古城。国民党撤退时散布了很多谣言说：“共产党，红军杀人”。加之这时闽西根据地内的肃反运动正搞得很紧张，在土地革命中又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政策，有些地主、富农和革命队伍内一些出身不好人就都逃到了古城山区，这样就更增加了群众的恐怖，把谣言信以为真。我们到古城时，街上的店铺都关了门，冷冷清清。我们赶到古城区委时，区委书记，于正平正在主持区委会，见我们来了，他很热情，赶紧给我们安排吃，住。他和区委组织部长钟连奎，还有一个干部曹得喜一同向我们汇报了古城的情况，问我们来古城有些什么任务。我从他们汇报的情况来看，认为古城出现这些问题，主要还是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听信了谣言。区委在发动群众工作上缺少些办法，区委的干部不可能是反革命。我就对他们说：“我们这次来古城的任务主要是抓反革命”。于是，区委的几个干部就带着我们进山，到山里抓了一些“白毛子”回来，“白毛子”是逃到山里的人，时间长了，头发变白，群众就叫他们为“白毛子”。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反革命，该不该抓，我不了解，也没考虑那么多，只想到省委交来的任务，就该完成。我还自认为任务完成得不错，回到汀州就兴冲冲地到省委去汇报。当时省委在城内一个旧政府的房子里办公，我一进门见屋里坐着一位陌生的男同志，穿着一身老百姓的便装，中等身材，约摸30开外年纪，瘦瘦的脸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见我兴冲冲的样子，笑着问我：“这位女同志干什么来着？”我说：“抓反革命回来了。”他一听就笑

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说看，是怎么抓的？”“就这么抓呗！”“恩，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有什么根据？”我一时回答不上来，心里纳闷：他是谁？怎么刨根究底的？根据什么？领导上给的名单不就是根据吗？想到这儿脱口而出：“就根据领导上交给的名单抓的。”我有点不太耐烦的回答。李明光赶紧过来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中央局的领导周恩来同志，是刚从上海来，到瑞金去的”。我一听不由得为刚才自己的冒失窘得满脸通红，周身不自在，手脚都不知放在何处为好。周恩来见我这样，笑着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干什么工作？李明光向他介绍说：“她叫李见珍，就是长汀县的县委书记”。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哇！我第一次进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一位女县委书记”。接着，他就耐心地给我讲党的政策，他说：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的根据，要进行调查研究，弄清楚这个人有没有反革命罪行，是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敌人就不能放过，但不要随便抓人，切记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如果我们把好人当成敌人抓了，群众就会害怕我们，就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就不能团结大多数，就不能孤立和打击敌人，反而使我们自己孤立起来。周恩来对我的谆谆教导，打开了我的心窍，使我懂得了干革命光凭一股热情和“蛮”劲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会冷静地思考问题，特别是对人的处理，一定要调查研究，重事实重证据，才能带领群众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才能不伤害自己的同志。不久后，省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经过调查，把这次抓来的人都放回去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使我们避免了一次错误。周恩来的教

导，使我终生难忘。解放后我在负责纪检工作和组织工作时，在处理党员和干部时，总想起周恩来对我的教导，就特别慎重。

1932年初，邓颖超大姐也从上海到瑞金，路过河田，我第一次见到了邓大姐，以后我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便和邓大姐在一个屋子办公，得到她不少帮助和教育。

(六) 福建省委反罗明路线的情况

1933年春，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站不住了，就搬到江西中央苏区来了，于是“左”的政策便进一步在中央苏区贯彻，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受到排斥和打击，就连赞同毛主席主张的同志也接连受到“残酷斗争”和“无情的打击”，1933年2月，在福建开展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就是一场错误的党内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同志受到了打击。

事情的起因是当毛泽东被调离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曾住在汀州福音医院治病，正好罗明也在福音医院养病。毛主席就跟罗明讲：闽西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还指出：在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十九路军及陈济棠部队对苏区的进攻，这对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是十分重要的。罗明听了毛主席的指示，第二天便召集福建省委会议进行传达。会议是在福音医院进大门右手边的一间大厅里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

滴人等，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大家听了罗明的传达，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到杭、永、岩去开展游击战争，刘晓在省委主持工作。

会后，罗明即到杭、永、岩地区去，路过河田时，我主持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请罗明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罗明走后，我们县委也领导独立团、赤卫队等配合地方红军，在长汀县的边沿区域开展游击战争，我们还进一步动员群众，加强防卫，少先队、儿童团也动员起来，巡逻放哨，巩固根据地的政权，干部和群众都动员起来，广大群众粉碎敌人“围剿”保卫苏区的信心大大增强了。实践使我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正确的，罗明对我们的具体部署也是对的。

这一年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李步青（当时中央苏区的粮食部长）打来的电话，他说：要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问我知不知道。打完电话，我心里实在感到很突然，不知道罗明有什么错误？什么叫“罗明路线”？我认为罗明的工作很深入，能联系群众，他作风正派、待人诚恳，几次来我们河田，对我们工作帮助很大，为什么要反他？我真不明白，思想很不通。后来苏区中央局派到福建来的代表把我叫到省委进行了批评，他说：罗明是退却逃跑，悲观失望，犯了路线错误。所以要对罗明开展“无情的斗争”。这时福建省委内很多领导同志和不少县委的领导同志也和我一样，对反“罗明路线”思想都不通。于是，苏区中央局的一些领导人就说福建省委内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还说福建省委内以刘晓为代表对“罗

明路线”斗争不坚决，是腐朽的自由主义。罗明代理省委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后，也不让刘晓主持省委工作，改由中央代表陈寿昌任省委书记。

我受了批评后到河田。不久，省委书记就打来电话，要我带 10000 地方部队和赤卫队攻打大田屋。我一听就急了，当时我们县只有一个独立团，还不到 1000 人，赤卫队也只有千把人，到哪里去弄 10000 人，况且要我指挥，我怎么能指挥 10000 人的部队呀！急得我对他说：“我们集中不了 10000 人，我指挥 10000 人的部队也有困难”。我又把县里的实际情况跟他汇报，我的意见是现在不能打。他说：“你害怕了，一定要打；不许退却逃跑！”我一下急哭了就说：“朱总司令指挥多少人？我怎么能指挥 10000 人！”他批评了我一顿，还是要打。没有办法，上级的命令不执行不成。我就四处去动员赤卫队，把少先队也拉进来，凑来凑去怎么也凑不到 10000 人。后来刘晓带了一个独立团来支援，合起来还是不到 10000 人，刘晓和我一起指挥。由于这支部队是刚凑起来的，事先又未做好准备，仓卒进攻。而敌人已经获得我们进攻大田屋的情报，事先做好了埋伏。这一天天未亮，我们发起进攻，很快遭到敌人伏击，牺牲很大，撤退下来，敌人又趁机攻进河田，把县苏维埃政府的房子烧了，我们县委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和工会委员长三位领导同志都牺牲了。我心里难过极了，打完仗把情况如实向省委书记汇报，他又大骂我一顿，说我是盲动主义。我伤心得大哭一场，心想事先我就不同意打，那时骂我退却逃跑，现在打了败仗，又骂我盲动主

义，左右都不是。打了败仗，思想又不通，就把我调离长汀县委，到省委软禁起来，要我反省写检查，还要我到党代表大会上作检讨。我每天在房子里写检讨，看《红色中华》和《战斗报》，准备在大会上检讨。

过了不久，召开福建省临时代表大会，批判福建省委内的“罗明路线”，要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等人检查，也要我和宁化县委书记在大会上检查，中央派了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开始不久，张鼎丞正在大会发言作检讨，罗明进来了，他一进门就大声说：“我是罗明，罗明路线就是我，与他们无关，一切由我负责，你们不要斗争他们！”他这一喊，会场就乱了；于是又批判起罗明来，我们就没有再作检查。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等人都被撤销了职务，郭滴人被调到长汀县委任宣传部长。会后我也被要求回长汀去交代工作，因新的县委书记没调来，我就把工作交给了郭滴人。省委要我到省苏维埃政府去当党组书记，苏维埃政府根本就没有党组，去当什么书记？我就在省委打杂。

一天，我接到从连城打来的电话，说李明光牺牲了。噩耗传来，我的嗓子一下梗住了，说不出话来，两眼发愣，木然地站在那里，肖向荣看我那样，吓了一跳，以为我触电了。我把话筒递给他，他赶紧接过话筒与对方对话，才知道是李明光牺牲了。李明光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是广东大埔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投身于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又参加了高陂暴动和百侯暴动，创建了大埔县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后参加组建

红十一军四十六团、四十八团，先后任这两个团的团长，他曾与古大存等人一起为建立东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0年后他先后任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长，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福建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立三”路线时，上级命令闽西红军攻打东江，他不同意这种军事盲动主义。在闽西肃反运动时，他又反对乱抓乱杀的做法。在反“罗明路线”斗争时，省委要他到部队去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不愿违心地这样做，就到前线部队去指挥打仗。当他率领独立团在连城姑田一带作战时，在打退敌人几次进攻，敌众我寡地形又于我不利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他几次请示上级批准撤出战斗，但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根本不理，硬要他坚守阵地。结果部队陷于敌人重围，就在他率领部队突围时，身中数弹，英勇牺牲。明光同志生前我曾得到他不少的帮助和教育，当我工作上碰到了困难，思想上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去找他时，他都是很耐心热诚地开导我，帮助我，并支持我的工作，我也非常尊敬他。他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心里非常难受。后来，省委派肖向荣和我一起到姑田去安葬并处理李明光的后事。其后，奉省委指示就在连城工作，担任连城工委书记。9月，东方军攻下边城，红军打了胜仗，缴获了敌人很多东西，部队送给我两套衣服，一条毛巾、一条香烟和两块肥皂。当时，三军团的曾日三同志要我到部队去做民运部长，省委不同意，要我回省，我便于同月回到了省委。

(七) 在陈潭秋领导下工作

我从连城回到汀州，在省委第一次见到了陈谭秋，他是中央派来福建接任省委书记的。以前我也曾听说过他是党的“一大”的代表，是大知识分子，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有些拘束。当时，他穿双草鞋，戴着蓝布帽，一身旧衣服，虽十分简朴，却透出了文雅和谦和。他一见到我，就说：“你就是见珍同志吧？”我答：“是”，他忙过来和我握手，见到我赤着脚，身材高大，一付农村妇女模样，他笑着竖起拇指打趣的说：“好样的！”他那风趣和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的拘束顿时消失，好象见到了一位老领导一样感到很亲切。接着他告诉我：省委已决定调我回来担任妇女部长。

陈谭秋十分关心妇女工作。我到省委工作后他多次嘱咐我，妇女部的工作要宣传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要组织妇女学文化，办好妇女读书班、识字班；组织妇女做好支前工作，做好红军家属的工作，帮助她们解决实际困难，使她们的丈夫在前方安心打仗。当陈谭秋知道我是农民出身，有农村工作的实际经验，但对城市女工工作还不熟悉时，就又在一次个别谈话中对我说：“你是省委妇女部长，不仅要做好农村妇女的工作，还要做好城市妇女的工作，要学会做女工的工作，你先把汀州城里的女工工作抓起来”。他还多次向我介绍城市女工工作的经验。那时，有些出身农村的同志对工人还不了解，以为工人舒服，穿着鞋袜上班，又不下水田，干干净净的。针对这种错误认识陈谭秋讲：“工人也是很辛苦的，一天到晚站十几个小时，又是机器生产，工作很紧张，一个人停下来，别人就

无法工作，工人之间联系很紧，所以工人之间团结比较好，组织性也强，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就这样他帮助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提高了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在他的直接教育下，我的心胸也更开阔了。眼光看得更远，我开始学做城市女工的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汀州城里被服厂的女工发生了罢工，原因是城里没有面粉卖，女工上班买不到早餐吃，工人就不去上班了。我闻讯后就到工厂去做工作，先找到女工班长彭雪英，做她的工作，要她先动员女工上班，面粉供应的问题，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彭雪英在女工中的威信比较高，她的思想通了，就在女工中主动做了许多解释工作，结果当天下午就复工了。以后彭雪英由我介绍入了党，她后来还当了支部书记。

10月，在汀州召开了福建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陈谭秋主持，中央派了张闻天来指导。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委领导成员，在反“罗明路线”时，受到批评和处分的一些同志，又重新被选进了省委领导机构，陈谭秋、张鼎丞、郭滴人；方方和我都被选为常委，陈谭秋为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郭滴人为宣传部长。我是第一次当选常委，仍任妇女部长。原来的少共省委书记是冯文彬，这时他调少共中央工作去了，由从江西调来福建的刘英接任少共省委书记。

陈谭秋很注意培养工农干部，为了提高我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他向省委建议决定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他找我谈话说：“你有实际工作经验，现组织上送你到中央党校学习，提高你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你去后好好

学习，回来可以在省委担任更重要的工作”。能进学校去学习，这是我日夜所向往的，1933年底，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曾经战斗过四年的闽西，前赴中央党校。

二、在红色首都瑞金

(一) 进中央党校学习

从长汀到瑞金，约有六七十华里山路。我背着背包，在那山峦叠翠的武夷山中穿行，想到即将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想我刚刚参加革命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参加革命后，特别是当我当了领导干部后，工作需要文化，便常常为自己文化低而苦恼。我多羡慕那些文化高的同志啊！但是由于长期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我没有时间坐下来学习文化，学理论，只能利用战争和工作的间隙，拼命学习，向有文化的同志请教，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一笔一划地练习写。没有纸、没有笔，我就用树枝在地上学写字，帮群众做饭时，用烧剩的柴炭练写字，睡觉时也在手心上练习写。真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经过几年学习，我已能看懂党的文件和报刊上的文章，在长汀当县委书记时，也能用一半文字一半符号把各区、乡的基本情况记在小本上。现在能有机会到党校去专门学习，真是高兴极了。我决心学好理论，学好文化。想到这里，我又有些不安，怕到瑞金后能不能学得成？因为在闽西时，有一次组织上已决定派我去学习，正好红军打下一个新区，需要一些干部去做群众工作，组织

上临时又决定要我去新区工作，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放弃了那一次学习的机会，这次怎么样？

中央党校在瑞金沙洲坝乡的黄竹坎下村，离党中央所在地下肖区不远，校长是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兼任，副校长是董必武，他主持日常工作。罗明在党校当教务长，成仿吾也在党校工作。中央党校1933年开办，我们这一期是第2期，共分3个班，一是高级班，学员是有一定实际经验的领导干部；一个是白区班，是从白区和新区来的干部；一个普通班，是一般干部，这个班的人数最多。当我知道被编在高级班后，怕自己文化低，学习跟不上，要求董老把我编到普通班学习。董老说：“你当过县委书记，又是省委常委，有实际工作经验，编在高级班是可以跟上的，学习上有困难，我找两个文化基础好的同志帮助你”。董老既严格要求我，又体谅我的实际困难，他亲自指定了两位同志在文化上帮助我，这样我就在高级班安下心来学习了。我们这个班共有八九十个学员，女同志也不少，蔡纫湘、危拱之、阙思颖和我四人共住一个房间，她们三人都是知识分子，以后又由她们帮助我学文化。

党校的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理论课，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党的建设两门课程。董老亲自讲党的建设课程。我记得当董老讲工厂党的建设这一节时，他考虑到我们学员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干部，对农村情况熟悉，对城市和工厂的情况比较陌生，连什么叫做车间不少人都没听说过。于是董老讲解得格外详细，并在黑板上画图，说明工厂的组织系统，讲清什么叫车间，为什么党支部要建在车间等等；在

工厂，党要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就好比火车头，党的先锋作用就象火车头带动列车前进。董老讲课深入浅出，常用通俗的比喻讲出深刻的道理，学员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辩证唯物主义课则由成仿吾讲授，我们这些工农干部第一次听讲辩证唯物主义，听起来有些玄乎，但也很感兴趣，很新鲜。有很多理论，我们一下弄不懂，讨论起来很热烈，有的同志说：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服都是物质，为什么还要讲主义？有的说：辩证法是不是变戏法？大家学习热情很高，整天争论什么是辩证法，晚上睡觉时还争论不休，直到查哨的来了，叫快点息灯，而我们息了灯还在床上继续争。党校除了在课堂上上课外，还要参加社会活动和到附近的村庄去做群众工作。我到党校的第三天，就被派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当地党支部建立了联系。董老十分注意做好群众工作，他要求我们帮助周围的群众挑水、砍柴、送肥、洗菜，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就去帮群众劳动。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根据地，中央提出了扩大一百万红军的任务，党校的教员和学员都被派到各地去扩大红军。我们入学后只上了一次党建和一次辩证唯物主义的课，文化课还没上，就去参加扩大红军的工作。因我曾在长汀任过县委书记，组织上就要我带一个组到长汀去扩红。我们到长汀后和县委的同志一起，深入到各区、乡、村做群众工作。这次扩军一方面是招收新兵，一方面是动员回家的红军战士归队，当时从部队跑回去的战

士不少，动员归队的工作是比较难做的，过去对离队人员采取了惩罚的办法，结果使扩红工作更加困难，以后便改变了做法，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归队。我们和县委的干部下去后，便分头去做离队人员家属的工作，家属的思想通了，本人的工作也好办了。同时也了解离队人员有什么实际困难，尽力帮助解决，确实困难很大不能归队的，就允许他留在家里，不扣帽子。经过从这两方面去做工作后，我们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扩红任务完成后，我想这回可以坐下来好好学习了。不料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召开了，我是福建省的代表之一，要出席大会（当时规定参加大会的代表，必须完成扩红任务，没完成任务的，不能参加大会）。

1934年1月，我到沙洲坝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福建省的代表有张鼎丞、陈谭秋、范乐春、刘英和我等人，张鼎丞是代表团的团长。在这次会议上张鼎丞、陈谭秋、范乐春和我都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刚结束，组织上通知我调我到中央妇女部任部长。接到这个命令，我心里七上八下，怕自己水平低不能胜任工作，我要求到党校继续学习。谁知这时中央组织部已派人到党校把我的行李搬到中央局去了。邓大姐找我谈话，鼓励我要我大胆工作，董老也给我写信来，要我服从组织分配，鼓励我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锻炼、增长才干。在董老和邓大姐的教育鼓励下，我增强了信心，愉快地走上了妇女部的工作岗位。我这次进了中央党校，但又没有学成。

(二) 在中央妇女部

这一年的2月份，我到了中央局妇女部。以前中央局没有妇女部，妇女工作是由博古亲自抓的。后来彭老总提意见说：“总书记没有必要自己抓妇女工作，可找个女同志来做。”中央采纳了他的意思，就设立了妇女部。原先在苏维埃政府里还有个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负责人是周同林，我到妇女部后，周同林的工作也交给了我。

我到妇女部时，中央局各机关在瑞金下肖区的观音山，办公的地点是在一个大祠堂里，这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宣传部、组织部和总书记的办公室在楼上，妇女部和秘书处在楼下。宣传部办公室在妇女部办公室的楼上，宣传部长是张闻天，吴亮平也在宣传部工作，秘书处在妇女部的对面，中间隔一个天井，邓颖超大姐在秘书处工作，她正在负责起草党章。组织部长是罗迈（即李维汉）。毛泽覃，谢维俊等正在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还有罗迈的爱人当过胜利县县委书记的金维映，这时也调到了组织部工作。以上同志办公和住宿都在这里。除此之外，博古的爱人刘群仙，是全总的女工部长，她也住在这里。那时根据地的生活很艰苦，粮食有定量，机关同志每人每天九两米，各人用一个小蒲包把自己定量的米包好，放在一个大锅里蒸熟，邓大姐的饭量小，她常把自己的饭分给饭量大的同志吃。

妇女部的秘书是阚思颖和彭儒，以后李桂英、邓六金、吴富莲、钟月林、刘彩香、蔡纫湘也先后调到妇女部工作。当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根

据地的中心工作是反“围剿”战争，妇女工作也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主要是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是动员妇女积极投入扩大红军和参加赤卫队、少先队的运动。在扩大红军运动中，做好家属的工作，是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们把红军家属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突击队和宣传队。以现身说法的形式，一村一户地做宣传和鼓动工作，大大激发了妇女送夫、送子当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的热情。为了使红军安心在前方打仗。在后方做好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组织群众为红军家属代耕，组织红军家属学文化等也是我们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妇女部还协助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委在沙洲坝政府大礼堂召开了一次模范红军家属代表大会，有江西、福建和粤赣三省的家属代表，还有红军的代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给模范红军家属发了椭圆形的银质奖章，上面刻印着“模范红军家属”字样。发奖时，大家站起来拍手，大礼堂的楼板突然塌下来了，过了两、三天，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出了这两次事，会议就改到西江乡下，在一个祠堂里继续开完。

那时在根据在，每到一个大节日，都要搞一次群众运动，如“五一”就搞红五月运动等。我去妇女部时是2月，为迎接“三八”妇女节，要求各级党组织吸收妇女入党、入团；发动妇女参加赤卫队，少先队；发动妇女为红军做鞋。各个县、区、乡之间还要开展比赛。这次运动中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共发展女党员 3900 多人，女团员 2700 多人，女赤卫队员 14000 多人，女少先队员 13000

多人；三省妇女还为红军做鞋 15 万双。

第二是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战争消耗很大，红军要不断的补充和扩大，青壮年男子，成分好的几乎都去当了红军，后方的生产任务就落在妇女肩上。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红军所需的粮食和服装都靠根据地内解决。因此，后方生产的任务更重。据此，中央妇女部提出了“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生产战线，如象红军战士上火线一样英勇！”的口号，来鼓动妇女积极参加生产。过去江西的妇女多数是做家务和参加些田间辅助劳动，犁田、耙田和播种这些活都是男人干的。现在妇女要承担主要劳动，必须学会犁田、耙田。于是，我们在各乡组织了生产教育委员会，请犁耙田能手直接教妇女们学会生产技能。但是，江西妇女有不少是小脚，小脚怎么下田呢？我们就动员青年妇女放脚。第一步，要她们解开裹脚布，穿上鞋袜，先在旱地干活，每天晚上用热水烫脚，让她们慢慢习惯；第二步，穿上草鞋下地；第三步，打赤脚下水田。江西的妇女真好，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她们硬是咬着牙下水田劳动。苏维埃政府为了表彰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1934年8月，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妇女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福建、湘赣、粤赣省的妇女代表都来参加，部分代表中的犁耙田能手还到瑞金武阳区进行了劳动现场示范表演。大会还给妇女劳动模范发了奖状和奖品，奖品是一条围裙和一顶竹笠，围裙上绣上了“学犁耙能手”的字样，竹笠上印有“劳动模范妇女”几个大字。由于我当时也

和妇女们一起学犁耙田，并做了示范表演，因此也得到了奖状和奖品。为了解决根据地军民穿衣的问题，我们还发动妇女种棉花、种苧麻，纺纱、织布。江西妇女素有纺纱、织布和渍麻的手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纱、织布，农忙下田，农闲纺纱、织布。妇女们为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第三项工作是支前。妇女们支前首先是为红军做鞋。那时根据地没有鞋厂，红军和地方干部穿的鞋全靠妇女群众做。做鞋是经常性的重要的任务，江西妇女光在1934年的头两个月内就做了16万双鞋。长征前夕，我们又动员妇女为红军做了20万双鞋和10万条米袋，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能有两双鞋，苏区的妇女从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到六七十岁的老大娘都动员起来了，她们不分昼夜地赶做。那一针针，一线线倾注着她们对红军的一片深情。除做鞋外，妇女们还组织了担架队，洗衣队，送粮队。为红军送军粮、抬担架、洗衣服。根据地内设有被服厂，红军的衣服由工厂做，但工厂做不过来，又要动员妇女群众帮助钉扣子，锁扣眼。

由于长期反“围剿”战争的消耗，红军所需的物资不断增加，而根据地内的财力物力却更加困难。为了保障红军的供给，苏区政府一方面动员工人、农民增加生产，另一方面动员苏区人民节省每一个铜板、每一斤粮食支援红军。苏区妇女也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她们无私地把自己家里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捐献给政府，许多妇女把自己陪嫁的银手镯、银耳环、戒指都捐献出来，支援革命战

争。光是纪念“三八”妇女节那一次，妇女们就认购了10万元公债。

中央根据地的妇女工作，除了农村妇女工作外，还有女工的工作。当时在瑞金、兴国、长汀，上杭等县，我们都办了一些工厂，如纺织厂、被服厂、印刷厂、兵工厂等等，工厂有不少女工。女工的工作，由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管，女工部长是刘群仙，她是无锡人，纺织女工出身。在无锡、上海等地参加工人运动，以后党送她到莫斯科学习，学习期间与博古结婚，回国后仍从事工人运动。后随博古一起进入中央苏区，负责全总女工部的工作。刘群仙同志原则性很强，作风正派，心地正直，见到不公平的事，敢于正面提出。后来，她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又到苏联去学习，以后就下落不明了。当时根据地的女工工作中心是动员女工积极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主要工作有：发动女工参加工会，争取与男工同工同酬，组织女工参加识字班、夜校，学习文化，建立女工代表会等等。

为保障妇女的权益，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婚姻法，妇女部的工作还要宣传和贯彻婚姻法。当时，也有不少妇女起来争取婚姻自由，反对不合理的婚姻。对妇女要求离婚的，我们经过调查，认为是不合理的，就批准离婚，一般的就进行调解。为了使妇女能安心生产，在根据地还办了托儿所。当时兴国县和瑞金县托儿所办得最好，两县共办了200多个托儿所。

事隔50多年了，现在回顾这段历史，当年苏区妇女送子、送夫当红军的情景；刚刚放开小脚的妇女，下水田

学犁耙田的情景；妇女们日夜为红军做鞋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她们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她们都是无名的英雄。

（三）参加长征的女同志

1934年秋，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虽然苏区军民全力以赴，英勇奋战，但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根据地造成的恶果，加之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使反“围剿”战争连连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这时，要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中央领导人决定放弃根据地，转移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在8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直属机关在西江的一个小庙里召开了一个干部会，各部门负责人参加，邓颖超、刘群仙、金维映和我都参加了。中央领导人博古、张闻天、罗迈也都与会，会议由林伯渠主持，他说：敌人对我们采取步步为营干水塘政策，水干了就捉鱼。所以现在我们要转移，到湘西去。大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把粮食和一些贵重东西藏好，组织赤卫队加强巡逻放哨，先不要对群众说我们要走。林伯渠说着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博古接着讲了话，他说：我们先突围出去，过两个月再反攻，我们还要回来的。当时，我真以为很快就会回来的，就悄悄说：“过两个月就回来了，怕什么”。刘群仙拉拉我的衣襟，偷偷地说：“我们可能回不来了”。会后，罗迈对我说：“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妇女工作，你们妇女部先提出个名单给我，然后通知她们到卫生部去

检查身体，身体合格的，就可随部队走了，总数不要超过30人”。我根据罗迈的指示，提了一个名单交给他，由组织部通知她们去检查身体。我提出的名单是：邓六金、吴富莲、吴仲廉、钱希君、贺怡、李桂英、彭儒、阚思颖、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危秀英、谢飞、蔡纫湘、谢小梅、危拱之，还有一位是兴国人，想不起她的姓名，她是左中农的爱人。中央领导同志的爱人和在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是由中央决定的，不用检查身体，在军队工作的由总政决定。经组织批准随部队转移的是33人，曾玉当时身体不好，但她坚持要随部队去，组织上也就同意她走。后来贺怡和彭儒因毛泽覃和陈正人留下了，她们两人也就留下了。还有些很好的女干部如范乐春、唐义贞，陈璧英，黄长娇等，因工作需要没有参加长征，留在苏区。她们有的牺牲了，有的参加了南方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所以，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女同志总共是32人，除现在各种党史资料中提到的30位外，还有两位，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兴国人，她随部队到了湘南后，因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伤员很多，组织上派她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了，以后没有音讯，可能牺牲了。另一位是蔡纫湘，她原是彭杨红军学校的组织科长，长征前又在中央妇女部帮助工作。长征时先和我一起为民运工作队，到遵义后，又和我一起到干部休养连。红军到了毛儿盖，她和吴富莲、王泉媛一起被编到左路军。以后西路军在甘肃被围困，吴富莲牺牲，她逃出到了上海。当她得知中央到达延安后，又千方百计到延安找组织，不幸在敌机轰炸延

安时牺牲，她是一位很好的同志。

四、长征路上

(一) 长征途中的群众工作

长征出发前，中央机关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是总指挥，代号“红星纵队”，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军委领导同志都在这个纵队；二纵队是中央局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机关等，代号“红章纵队”，领导人是罗迈和邓发。编在一纵队的女同志有康克清，她是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李建华是做机要工作的，蔡畅、刘群仙、刘英、金维映在二纵队司令部工作，我在二纵队司令部任民运科长兼民运工作队的队长。

民运工作队约有 100 来人，工作队的成员，有的是在上海、广州、香港等白区工作的，有的是交通站的，有的是其他根据地来到中央苏区的，也有的是受王明路线的排斥打击，没有安排职务的领导干部。记得有陆定一、刘晓、谢维俊、罗梓铭、邵式平、洪水（他是越南人），还有贾拓夫，他是从陕北来中央根据地汇报工作，正赶上长征，就编在工作队，女同志除我以外还有阚思颖、蔡纫湘。工作队的任务是沿途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找粮食，找向导，找挑夫。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除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外，还在各地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以离间红军和群众的关系，企图困死红军。因此，打破敌人的污蔑战胜敌人给我们设

置的困难就成为红军特别是我们民运部门的一个重要、经常的任务。我们每进到一个村子，都严格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绝不允许乱拿群众的东西，借群众的东西一定要归还，损坏的要赔偿，实在赔不起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并写张欠条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赔。我们民运部门更是经常帮助群众挑水、打柴、舂米，以实际行动来粉碎敌人对红军的造谣污蔑。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子，由于群众听信敌人的谣言，青壮年和妇女都躲到山里去了，只剩下些老人留在村里。我见一位大娘去挑水，就走过去对她说：“大娘，我帮你挑水，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抢过大娘的扁担，帮她挑了满满一缸水，大娘很高兴，问我：“你们真是红军？”她见我们跟敌人谣言中的红军大不一样，因此有些疑惑不解。我说：“我们是真正的红军，我还是女红军哩！”她用目光上下打量我一番，相信我讲的话是真的，就问我为啥子出来当红军等等。我跟她讲起我的身世，我为什么要当红军，世上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讲起共产党和红军就是要推翻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使人民翻身做主人；我告诉她红军要在村里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穷人。老人听得入了神，握着我的手说“红军真好！你们要是能长住在这里就好了！”接着老人也将村子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说罢她又跑进山去将那些躲避的青年和妇女都叫了回来。对于村里的大户，我们经过调查了解，确实是土豪劣绅的，就没收他的浮财。没收来的粮食、现金、盐巴等红军急需的物资全部交给后勤部，其它财物就当场分给群众，并宣布

凡愿给红军带路和挑东西的，每人每天给一块大洋。群众第一次从红军手里分到了东西，高兴地说：“红军真是为老百姓服务的部队”。他们见工作队经手那么多财物，自己却分毫不私留，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象红军这样纪律严明、克己奉公的好人。一些老人和妇女还动员自己的儿子和丈夫给红军帮忙。结果群众中有不少人自动报名给红军当向导、当挑夫，还有不少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2月，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省境的黎平。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黔西北进军，并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罗迈要我们到遵义一带去发动群众，物色地方干部，建立革命政权。月底，我们抵达乌江东岸，乌江江面不算很宽，但水流很急，敌人沿江有重兵驻守，红军必须突破乌江，方能进军遵义。我们在乌江边的石头岩上迎来了1935年的元旦，过元旦那天我们从山上采来些松柏树枝和野花，扎起彩牌，老乡们给我们送来了糍粑，军民还在一起唱歌、跳舞，开展联欢活动，愉快地过了一个新年。元旦后开始渡江，主力部队接连两次强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强渡成功后先头部队很快用竹子搭起了一座简易浮桥，让大部队通过！

1月7日，主力部队攻下遵义，工作队随着进了城，当天下午在天主教堂召开群众大会，有很多人来参加。在会上我们宣布党的城市政策和土地革命的政策，宣布红军要在遵义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些政策和决定得到了到会群

众的热烈拥护，当地进步学生组织“红军之友协会”的同志，还将城内各阶级的情况向我们介绍，协助我们开展宣传工作，逐家逐户去发动群众。很快，我们便在城内建立了赤色工会、农民协会、儿童团等组织。为了筹建革委会，我们又在天主教堂召开群众代表会，代表们对选举革委会委员时是举手表决还是投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大家一同致同意举手表决。1月12日在第三中学召开群众大会，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罗梓铭任主席，赤色工会、农民协会都有代表参加革委会，罗迈要我物色一些地方干部，我就推荐了“红军之友协会”的周司和、李小侠等人参加了革委会。这一天到会的人很多，有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他们手拿彩旗，高呼口号，敲锣打鼓欢迎红军，庆祝县革委会成立。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博古、李富春等在大会上讲了话。

红军进到遵义后，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商人也很满意，各行各业相继开门营业。那时贵州吃盐很困难，盐贵如银。我们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盐行，除将部分盐分给贫苦群众外，其余则平价出售，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牵羊、杀猪来慰问红军，还有许多青年前来参军。1月下旬，我们撤离遵义向四川进军，在土城战斗时，组织上要我负责收容伤员。这时伤员增多，不能带走，只得将伤员寄放到老乡家里。贵州的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抬伤员，又冒着全家性命危险收留伤员。妇女们背着竹篓跋山涉水给我们送来糍粑……这些情景我永远也不会忘怀。

2月，我们到达扎西，洛甫（张闻天）给我们做地方

工作的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他还说：现在我们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变，在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也不要破坏，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以前，我们沿途打土豪时，拿不走的東西，一时也来不及分给群众的就打破它。遵义会议后在地方工作方面这些“左”的错误做法得到了纠正。部队在扎西再次进行了整编，把一些笨重的印刷机、磅秤等东西丢掉了。当时中央决定留下一些同志在川滇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阙思颖和李桂英两人也留下了，我被调到干部休养连去工作。分别时，我们三人在一起哭作一团，心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

（三）长征中的干部休养连

干部休养连属卫生部领导，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全连约有 300 余人，分五个休养员班，即：老同志班，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成仿吾等在这个班；伤员班，收容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师、团级以上的干部，钟赤兵、张宗逊、文年生、姚喆等先后在这个班待过；女同志班，这是有病和怀孕的女领导干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先后在这个班的有邓颖超、贺子珍、肖月华、廖似光、陈慧清、杨厚珍、周越华、曾玉等；机要人员班，收容负伤和生病的机要人员及在白区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还有一个流动班，成员不固定，在长征途中生了病的领导干部就送到这个班，病好了就回原单位。休养连的工作人员分别编为医务室、警卫排、饲养排、担架排、运输排。担架员和运输

员都是请的民夫。还有邓六金、吴富莲、王泉媛、钱希君、钟月林、刘彩香、危秀英、谢琼香（谢飞）、谢小梅、蔡纫湘等 10 位女干部，叫“政治战士”，她们什么工作都做，既做政治思想工作、宣传鼓动工作，又帮助抬担架、挑药箱、护理伤员等等。全连共有 20 位女同志，除以上 18 位外，还有吴仲廉和我。

连部设连长、指导员、秘书、文书各一人。连长侯政，原是八军团的卫生部长，黎平整编后调到休养连，接何长工任连长。前任指导员叫黄应龙，是个军政委，扎西整编后，回主力部队去了，我接他的工作。秘书吴仲廉，文书谢有发，全连建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总支书记是董必武，委员是侯政、邓颖超、李见珍、吴仲廉。下面还有几个支部，我兼连部工作人员这个支部的书记。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由老、弱、病、伤和女同志组成的队伍，送到休养连来的伤、病员，都是为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个连非常关心和照顾，但同时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要求我们必须将体养员一个不丢的护送到目的地，这个任务是异乎寻常的艰巨。当我调到休养连时，侯政一看调来位女指导员，一下子凉了半截，他想：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又来位女同志，不是更增加负担吗！因此，对我不太欢迎。我见他那样，也有点不太高兴。心想：你看不起女同志，我也不跟你说什么，还是以后看行动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侯政改变了他的看法。全连的同志团结得很好，工作人员竭尽全力护送伤、病员，伤、病员也很体谅工作人员，尽量减少连里的负

担，尽力帮助连里的工作。特别是董老不顾自己年老体弱，邓大姐不顾重病在身，日日夜夜为全连的工作操心，遇有重大事情，他们就千方百计出主意想办法帮助解决。我们碰到困难就去找他们，他们也总是热心的为我们排忧解难，连里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就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反映，使我们的困难能够得到及时解决。我们这支特殊的部队就这样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董老、邓大姐、徐老、谢老的具体帮助下，全连同志同心同德，以惊人的革命意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没有丢下一个休养员，全体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四）休养连的艰苦历程

我刚到休养连不久，在娄山关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就被送到了休养连，医生说要锯掉伤腿，才能保住生命。开始我去跟他谈，他一听说要锯腿，一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冲着我说：“指导员！你若锯掉我的腿，我就枪毙了你！”他思想不通，怕锯掉腿寄放到老乡家里，不能跟着部队继续前进。一个身经百战的指挥员，锯掉一条腿如何行军、战斗啊！我完全理解他当时的心情。周副主席知道此事后，指示我们：一、腿要锯掉；二、无论如何要把钟赤兵抬到目的地。邓大姐又去找他谈，传达周副主席的指示，钟赤兵思想通了，同意锯腿。做手术时，没有麻药，大家就只好用绑腿布将他的两手、上身及另一条腿绑在两张四方台上，以免他乱动，给他吃了一点鸦片作为麻药，医生就这样硬着心肠给他锯，黄豆般大的汗珠从他的头上和全身冒出来，他喊了几声就昏了过去，

站在旁边的同志目不忍睹，止不住流下了眼泪。钟赤兵以顽强的意志终于挺过来了。以后就用担架抬着他走，一路上他吃了不少苦头。一次，在贵州一个山谷里行军，突然遭到敌人袭击，董老就带着队伍赶紧往前走，连长和我把警卫员集中起来在后面阻击敌人。忽然，我听见有人喊我：“李见珍！把枪给我！”我回头一望，见钟赤兵一个人坐在担架上，还没有走，急得我不知他出了什么事，就问他：

“你怎么了？”

“我要和敌人拚了！”

“你的担架员呢？”

“不见了！”

原来担架员听见枪声紧，把他扔下躲起来了，他怕拖累别的同志，准备和敌人拚了。但我们怎能让这位娄山关战斗的英雄再受到损伤呢？，连长正和警卫员去阻击敌人，我背起钟赤兵就跑，追上了部队。后来五军团的部队也赶到了，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使我们脱离了险境。

4月的一天，我们来到贵州西部一个叫猪场的地方，天已黄昏，马匹上的伪装已被卸下正准备宿营，我和几个女同志刚去找房子，走出不远，就突然发现飞来了几架敌机，这地方周围是山，远处看不见飞机，也听不见声音，待敌机飞到宿营地上空已是措手不及了，我赶紧叫：“同志们！快卧倒！”我们的药箱是马口铁的，在夕阳照射下有些反光，马匹目标也大。敌机很快发现目标，开头一阵机枪扫下，接着扔下几颗炸弹，甩头跑了。我们几个女同志靠在一个田埂旁，溅得满身都是泥，还好都没有事。贺子珍

正坐在担架上，没来得及卧倒就被弹片炸伤了，一位理发员和一位警卫员也当场牺牲，还有一位曾在白区做交通工作的小朱负了重伤。马匹炸死了不少，我们立即抢救伤员，收拾被炸的药箱行李物品，安排同志们宿营，点火做饭。毛主席知道我们连被敌机轰炸后，便带着傅连璋，打着马灯赶来看望。他向董老问了我们连损失的情况，就去看望贺子珍，傅连璋看了贺子珍的伤，并给她包扎了伤处，还去看了其他伤员。毛主席见我们难过的样子就对我们说：敌人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但他们也绝不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毛主席走时，把自己的担架员留给了贺子珍。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也来看望我们，中央领导的关心给我们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我们把全连人员安顿好，等大家吃罢饭，休息后，连长和我又带几个警卫员，打着马灯，强忍着悲痛，为牺牲的同志去挖墓坑，把两位同志安葬好，天已快亮了。我们稍事休息又准备开始第二天的行军。出发时，小朱知道自己伤重不能带走，就抱着我的腿说：“指导员！你给我一枪吧！”他这一喊，我的心都碎了，那时红军不怕战死，就怕负伤不能随大家一起走。我们的马匹被炸死了不少，担架员一时也找不到。没有办法，我只好背起他去找老乡，把他寄放到老乡家里，安慰他说：“小朱！你好好在老乡家养伤，等伤好了来找部队，我们到了目的地，一定派人来接你。”说罢，我不忍心再回头看他一眼，含着眼泪，去追赶部队。以后，我们到了延安，中央曾派人去找伤员，多数都没有找到。

5月，我们通过了凉山彝民地区，来到了大渡河边的

安顺场。听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在这里全军覆灭。而这时我们的境况也很困难，前面有敌人扼守大渡河天险，后面还有几十万敌人追击。敌人也想利用大渡河天险来消灭红军，使我们变成石达开第二。但是我们英勇的红军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首先是十七勇士抢渡了大渡河，接着红一师全部过了河。中央决定其它部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夺取泸定桥，从泸定桥渡过大渡河。从安顺场到泸定桥，全程 320 华里，道路蜿蜒曲折，崎岖难行，路的左面是高入云霄的峭壁，右边是河水湍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对岸的敌人还不时向左岸射击。我们要抢在敌人到来之前渡过泸定桥，必须昼夜行军。这时，又值雨季，淫雨连绵，路滑更难行。老同志、轻伤员拄根棍子，互相搀扶着，一会这个滑倒了，一会那个摔了一跤，摔倒了又爬起来继续走，饿了就吃点干粮。晚上行军，对岸有敌人，不能打火把，就摸着黑一个拉着一个，前后呼应着走。担架员、运输员更艰难，女战士们就和他们轮流着抬和挑。就这样走了两天两夜，大家精疲力竭，两只脚象灌了铅一样沉重。但同志们顽强地坚持着继续前行。

快到泸定桥头了，突然对岸一阵枪弹打过来，我的饲养员负伤了，他头部胸部鲜血直流，一只眼睛也被打伤。这是位很好的红小鬼，早在瑞金时就跟着我，就在前两天他还向支部表示过决心：“要不惜一切，把休养员一个不丢的安全护送到目的地。”我也曾想过：“等革命胜利了，一定送他进学校去学习文化知识”，没想到他在这荒山野岭里负了重伤，而这里连一户人家也没有。我拼尽全力背着他

爬过了两座小铁索桥，我的衣服被汗水和他的鲜血湿透了。脚步越走越沉。这时我隐约听见他那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指—导—员！放—下—我—吧！”我的心真如刀绞，想起苏区人民对红军的一片深情，如今我绝不能把这位江西老表丢在这里，他就是死了，我也要将他安葬好。他的手已扶不住我的肩，我把腰往下弯弯，不知那来了一股劲，背着他又走过了一坡又一坡，来到一个桥头，这里有几户人家，只是人都跑了，还有一座小庙。我把他安放在小庙里，他已全无知觉，只是心脏还在跳动。我真想坐下来痛哭一场，可是时间不允许啊！我要组织全连人员安全渡过泸定桥，任务重，时间紧迫，我只好解下干粮袋放在他身边，又把随身带的几块钱放在他的口袋里，心中默默地祈望着：“老乡们！快点回来吧！救救我们这位兄弟啊！”

我赶到泸定桥头时，大家还在等待过桥。这时，主力部队已夺取了桥头堡，九根铁索联成的桥身已铺上门板，但桥面没有铺满，门板也来不及固定，人走在上面象荡秋千一样。桥下是奔腾咆哮的大渡河，真有些胆战心惊。这时，找来的挑夫见到如此危险，怕过桥后回不来就跑了。我们连的人员、马匹、药箱都堆在桥头，时间又是刻不容缓，急得我们一筹莫展。正好，毛主席从这里路过，见我们如此情景，立即将他的警卫班留下帮助我们过桥，这真是雪里送炭。我们用绑腿布将担架杠子绑在身上，两个人在前面拖，两人在后面推，将重伤员的担架一副一副拖过去，轻伤员和老同志由两位同志扶着过去，女同志把药箱

绑在背上，手抓住铁索，匍匐前进，一趟趟把药箱全部背过了河，就这样我们连的人员、马匹、药箱全部安全地通过了泸定桥，大家真是兴奋极了。

红军渡过大渡河，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尾追，继续北上。我们又面临着一场和大自然的生死搏斗，必须越过几座大雪山，跨过渺无人烟的草地。6月，我们来到第一座雪山——夹金山下。该山海拔4000多米，山峰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传说鸟都难飞过去，只有神仙才能过去，当地群众称之为神山。为了北上抗日，我们一定要爬过雪山。过山前，领导上要求我们作好物资准备，可当时，连白酒也找不到，只买到些辣椒、生姜、大蒜。周副主席很关心我们，派人送来了一些肉类和粮食。那时正值六月酷暑，大家穿的只是一身单衣，为了能抵御山上的严寒，我们千方百计向藏族土司买到些羊毛和羊皮，每人做件背心。出发那天天气晴朗，开始走的还很顺利，但越往上走，天气越冷，路越窄，坡越陡，老同志和轻伤员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抓住马尾巴往上爬，担架员、运输员就更困难，抬担架走在前面的稍好些，抬后面的就难上去，女政治战士就在后面使劲推。快到山顶时，突然又狂风四起，风雪交加，大家冻得浑身发抖，赶紧嚼片生姜。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大家一步一喘，一步一歇，但同志们顽强地坚持着，互相鼓励：“不要停下！坚持就是胜利！”一位运输员喘不过气来，眼看要倒下去了，大家赶紧扶住他，拖的拖、拉的拉，把他拖过山项，然后用雪擦他的四肢，使他缓过气来。我们这

些老、弱、病、伤和女同志终于翻过了这座连鸟都难以飞过的神山。

接着我们进入藏族地区。这一带人烟稀少，藏族同胞长期受汉族反动军阀的欺压，民族仇视很深，加之反动派严令藏民不得帮助红军，否则就处以死刑，结果造成藏族同胞一听到红军消息就躲避开。这样就使我们的粮食状况越来越困难，为了筹粮，我们只好到还未完全成熟的麦地里割下麦子而把钱留在地里。割下的麦子因为未熟麦粒打不下来，我们就用火烧，烧得半生不熟的麦粒掉下来后，就用手抓来吃，吃和满嘴都是黑，象长了胡子一样，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由哈哈大笑，虽然生活如些艰苦，但还是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可是越往后走连未熟的麦子也找不到了，我们就只能采些野菜和碗豆苗煮点稀汤喝。

女同志就更有难言的苦衷。月经来了，没有草纸，只好找块破布来代替，连一块破布也很珍贵，用完了，洗干净，大家轮流着用。到后来破布也难找到，就用小块破布包些乾树叶垫上，仍然爬山涉水。有时蹿过小河，河水都被染红一片。那时，也顾不了这些，许多女同志因此得了妇科病。我们连在长征路上还有五位女同志生孩子，她们就更不容易了。在途中生孩子，没有营养，孩子不能带走，生下小孩后还要继续坚持行军。那时，伤、病员和产妇都集中在一个连队，连长和指导员也很难个个都照顾得周到。有时，因找不到担架，刚生完孩子就得走路。长征路上，如能弄到一点糖，我们总是小心保存起来，等哪位

同志生孩子时，冲碗糖水给她喝，这就是最好的补品了。当红军进入贵州时，廖似光由于劳累和颠簸，仅怀孕七个月就早产了，产后找不到担架，邓大姐就把担架让给她了。廖似光产后还没满月，就帮助我们沿途做群众工作。贺子珍也在贵州生下了一个小孩。她生产后不久，又被敌机炸伤，她是带着全身的伤痛，以顽强的意志，坚持长征到底的。曾玉在行军途中，产前阵痛突然发作了，好不容易坚持到宿营地，同志们找来一捆稻草，曾玉躺在稻草上就把孩子生下来了，第二天又要行军，连寄放孩子的老乡也没找到，就用块布把孩子包了一下，放在空屋的稻草上，母亲就由两位女同志扶着艰难地跟着部队出发了。天下哪有不爱孩子的母亲！女红军也是母亲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在挣扎、在啼哭，那哭声有如尖刀刺着母亲的心，她们只能以坚强的毅力克制自己的感情，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抱着对孩子负疚的心情，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继续前进！这就是我们女红军的精神。这就是我们女红军为革命做出的牺牲。我在女同志中身体是最好的了，有几次也差点死于非命。一次是在贵州西部山区的夜行军。部队在一条旁山小路上急速前进，正值4月梅雨季节，下着细雨，天黑路滑。走着走着，我一下发现路边有一个大坑，我怕同志们没注意掉进坑里，就站在坑边，向路过的同志们招呼着：“小心，这里有个坑，靠里边走！”等休养连的同志们都安全通过后，我才松了口气，也许是刚才思想太紧张，站的时间太久，刚松了口气，想往前走，突然感到头重脚轻。

身不由己，掉进坑里了。待我醒过来时，部队早已走远了。坑底一片漆黑，我试着爬上去，无奈坑壁很陡，又没有草和灌木可以攀沿，试着爬了几次都掉下来了。“难道就这样完了？”一种不安的情绪向我袭来，要是爬不上去，赶不上部队，一个人在这深山野岭可不就完了。我又想，我曾遇到几次危险最后都死里得生，这次也不能就这样轻易地完了，总会有办法的，兴许收容队还没过去！我用耳朵贴在坑壁听听上面有无脚步声，过了一会，果真听到了脚步声。我在下面大喊：“坑下有人！”，上面来的正是卓雄带的收容队，他们听见坑下有喊声，知道定是有人掉下去了，就用几条绑腿布接起来，扔下坑来。我摸到他们扔下来的绑腿布，在我的腰上系好，抓住绑腿布，然后把我拉了上来。要是收容队的同志沿途不仔细搜查，没发现坑下有人，那次我可就真的完了。

我们在雪山中艰难地行军一个多月，7月份来到了毛儿盖。前面是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神秘莫测的水草地。跨过水草地，北上陕甘，就可以抵达抗日前线。这时，侯连长和吴富莲、王泉媛、蔡纫湘等同志调到左路军去了。邓大姐和休养的部分女同志也回到各单位，上级又新调来一位毛连长。8月下旬，开始进入草地，极目所见到处是草和水，没有树木，没有人烟，天上常常阴云密布，接着就是一阵大雨夹杂着一阵冰雹，草丛中更是泥潭星罗棋布，明河暗沟纵横交错，一个个泥潭和一条条暗沟都是陷阱，走错一步陷下去就越陷越深，很难爬出来。过草地时，我们每人都拄一根棍子，碰到河沟时先用棍子插

进水中，试探一下水的深浅，如棍子被水漂起，说明水深，不能涉水就要绕道过去。一次，我们走到一条小河边，我把木棍插进水中，立即被水冲上来了，我对大家说：“这河水深不能过，我们要绕道过去”，毛连长说：“不怕，可以过去，我先下去。”我说：“不行，你别下去，还是绕道走吧！”他不信一定要下去，结果刚下到河里就被一个旋涡卷走了，毛连长牺牲了。大家难过地哭了起来。同志们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绕道继续前进。我们不少红军战士，没有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牺牲，却在草地中被这恶魔般的泥潭吞噬掉宝贵的生命。毛连长牺牲后，我的担子更重了。许多同志的脚被水草扎破，我的脚也被扎破感染化浓，没办法我找来一块生牛皮扎几个洞，用绳子绑在脚上，拄根棍子，一瘸一拐地走，滑倒了爬起来继续走，饿了就抓把炒面塞在嘴里，后来炒面被雨淋湿，结成硬疙瘩，就啃这个硬疙瘩。我们的衣服被雨淋湿，穿在身上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晚上宿营就在露天铺块油布，大家挤在一起互相取暖过夜。就这样我们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终于走出草地。走出草地，到了巴西，领导上看到伤病员集中在一个连，负担太重，决定撤销干部休养连，将伤病员分散到各单位，我被调到军委纵队政治部重做民运工作。再往前走翻过著名的六盘山后，中央红军很快就进入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一年后另两支主力红军也结束了长征，来到了陕北。我刚在陕北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后，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新形势下，奉中央指示又重回南方走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工作岗位。

我所了解的徐明清同志

孙 达 生

徐明清同志在 30 年代就是文化教育战线上我们党的
一名坚强战士。她于 1911 年生浙江临海县山区的一个
农民家庭里，1925 年她 14 岁，在台属女子师范读书时，
参加进步组织“乙丑读书社”，1926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
团，任学生会评议会主席。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
反动学校当局要逮捕她，经组织帮助转到上海泉漳中学读
书，作团的组织工作，不久又因参加上海工人起义一周年
纪念活动，被学校开除。1928 年党调她到杭州，在党的
浙江省委秘书处工作，但由于她当地熟人较多，不好工
作，遂于不久后，经组织同意考入南京晓庄乡村师范，任
团支部书记，1929 年转入共产党。

晓庄师范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该校以新
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提倡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脑体
并用，学校宗旨是为广大劳苦农民扫除文盲、普及科学知
识而培养教师。在办学思想上主张民主自由，各种思想流
派兼容并包。学校师生经常到校外对农民开展平民教育。
我们党就利用晓庄师范的有利环境，建立组织，发展了大

批党、团员。1930年4月5日，南京市委发动了支援英商合纪蛋厂工人罢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军舰进驻长江口岸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晓庄师范广大师生因积极参加这一斗争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镇压，蒋介石下令查封晓庄师范，通缉陶行知先生，还逮捕了30余名革命师生。在国民党这次镇压行动中，我党同志牺牲10余人，徐明清同志被迫逃往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她又参加了支援抗战和救济难民工作，在工人难民工厂任教育科长。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创办生活教育社，开办工学团、科学通讯学校、劳工幼儿园等试验性的人民教育组织，委托他所信任的学生徐明清和王洞若主持晨更工学团。

1932年，党中央委派原晓庄师范支部书记刘季平和丁华发起组织了“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徐明清和王洞若最先参加，不久担任“教联”常委。教联是中共中央文委从1931年起先后发起成立的八个联盟之一。教联刚成立时，中央责成江苏省委及团委在上海组织动员各大中学教师学生、小学教师及热心教育工作者的人士约百余人参加并登记编组，作为最初的教联盟员，其中大部分是党、团员。教联成立后，很快在一些学校中建立起教盟小组，组织开展教育战线上的反帝救亡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斗争，并曾组织学习李浩吾（杨贤江）写的“新教育学大纲”，开始介绍苏联的学校教育经验。当时国民党在各正规学校里实行的是党化教育，广泛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专门迫害我党地下组织及进步师生的爱国民主活动，使教联在各正规学校中的活动很困难，于是，教联

工作重心就转向社会教育。除了自己办的工人夜校、小图书馆、读书会之外，主要和陶行知先生合作，在各工学团、幼儿园建立组织，开展活动。教联也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在各女工学校建立组织，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教联的组织形式是以常委为领导机关，由中央文委（对外称文总）派人领导，下设各单位的盟员小组，党内则设党团，分工有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并在盟员中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因原来参加文总下属各联盟的党员、团员组织常遭破坏，文委决定各联盟发展党员归各联盟的党团领导，这就使工作统一，又便于保存组织）。教联盟员的小组生活，每月交纳盟费，有收入的纳所得捐，生活困难的人不交。我们常委和党团的同志，则几乎所有的收入都作为革命的活动费使用了。教联的组织每周开一次小组会，由上级派人出席，会议内容：一、时事讨论；二、工作汇报；三、布置下步工作；四、生活检讨批评自我批评。这种组织生活实际和党内党小组的组织生活差不多。而敌人对党员盟员也一视同仁，予以无情的迫害，所以文总下的各盟，先后都成为地下组织了。由于活动日益困难，群众基础缩小，并不断遭到破坏，到1936年春，中央文委仿照苏联解散文总及各联盟的经验，也结束了文总及各联盟，而改为各救国会。教联则进一步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社合作，组成“国难教育社”，教联组织的主要成员均成为这一组织的骨干力量。

教联组织存续期间由徐明清同志参预领导的晨更工学团是教联工作开展最活跃的单位之一。教联常委机关一度

设在晨更工学团内，在徐明清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晨更工学团还开办小学，大量招收北新泾附近的工人、农民和商店店员的子女入学，并为农民、工人、店员办夜校，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剧团，使晨更工学团很快成为北新泾一带劳动人民学习知识和革命思想的文化活动中心。

明清是晨更工学团的公开负责人，她善于关心人团结人，是一个好管家。工学团是没有经费来源的，全靠陶行知、黄警顽两先生从自己的生活费中尽量节省出一点钱，以及随时向社会上同情者募一点钱来维持。工作人员没有工资，一切劳动服务大家动手干，有时连简单的伙食也发生困难。从陶行知先生处领到一点钱仅够买几十斤米，从自己种的菜园里拔些鸡毛菜再加上点油盐，煮一锅菜饭，大家吃起来都说很富有营养。一次遇到米也断档了，明清不得不把自己的钢笔送进当铺，当两元钱应急。然后对大家开玩笑说不管谁搞到钱，一定先赎笔，不能让知识分子长期缴械。明清偶尔从老家探家回来，她的母亲一定在网篮里装上一些腊肉、干鱼、笋片、挂面之类的食品，大家就都可以“打牙祭”（改善伙食）了。

晨更的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不断侦察盯梢，但当时晨更工学团中有些青年盟员和共青团员，也有一些左倾幼稚病的表现，有时把反国民党的标语贴在校园篱笆上，有时在群众集会上喊过左口号，在学生中教唱国际歌等。明清同志一再提议不能搞过左的幼稚活动，指出：这只能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而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却不大，而且要引起统治当局的震动和镇压。可惜，在当时条件下

徐明清同志的话难于引起人们的重视。

1933年底，明清发觉晨更的环境不安全了，常有些不明身份的人以参观为名来问长问短，北新泾公安局还有一次找明清去局里盘问。鉴于这种情况她向教联常委会建议要早点采取对策，教联常委会遂决定将机关转移到租界地去，明清也根据组织的决定换了工作阵地。此时，教联已通过陈望道、康若愚等人的关系，开辟了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女工学校作为新阵地，明清旋即调到浦东的烂泥渡女工学校主持工作，而将晨更工学团的公开负责工作交给了青年王东放同志。在明清意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1934年2月的一天，大批警察特务包围了晨更工学团，捕去5名工作人员，劫走全部图书设备，捣毁了这个进步的文化教育中心，只是由于明清的警觉和教联机关的及时转移，才未招致更大的破坏。

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有6个女工学校，主要是对女工进行识字教育，不谈政治，教联同志通过教课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扩大知识面，又请剧联、音联同志们配合活跃学校的文化生活，才使党领导的进步文化工作渐渐打开局面。明清同志很善于作女工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女工为改善生活和资方作斗争，帮助解决她们的就业问题，家庭纠纷，正确处理婚姻问题等。因此，女工们什么事都愿找徐老师商量，她也成为广大女工的贴心人，她在教学过程中还倡导采用了一种高班生辅导低班生的办法，结成互助组，再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文化较高、热心工作的女工成为新教师，推荐到其他女工学校，这也就极大地扩

大了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化事业的影响，陶先生对徐明清首倡的这种群众性的教学方法，极为赞赏并加以总结提高，在工学团中加以推广，让每个小学生都回家向家长和邻居教识字、讲常识、即知即传，成为有名的“小先生制”。

包括晨更工学团被查封事件在内，教联组织在存在期间曾多次遭到破坏，主要有以下几个事件：

(一) 1932年6月，教联党团书记刘季平被捕，转押到烟台监狱，教联常委会曾通过陶行知先生多方设法营救，并派徐明清去泰山求冯玉祥将军，向山东省当局疏通，无效以后，由徐明清以刘季平的三妹的名义按月向监狱寄送衣物书报，直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刘才由党中央交涉获释。

(二) 1934年2月，晨更工学团被查封，陈企霞、袁超俊、柴川若、王东放、赵章等五人被捕，先后保释。

(三) 1934年9月江青被捕。

(四) 1935年2月黄小平被捕，关押在榆林桥西牢，教联常委会派劳工幼儿园的盟员杨文霞同志以黄的未婚妻的名义，按月探监送衣服，直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西牢结束时黄才被放出。

(五) 1935年4月，徐明清被捕。

(六) 1935年秋，文委领导教联的陈楚泰同志被捕，遭酷刑拷打后牺牲。

(七) 1936年9月，丁华被捕。

(八) 1937年9月，张敬仁从西安返沪被捕。

其他因游行示威，参加集会，集体被拘捕，略经审问

或关押几天释放的事，几乎经常发生，敌人对我党同志的迫害，在1933年以前是抱定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的政策，多按军法从事，关在龙华陆军监狱，严刑拷打，大部杀害，还有的由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秘密处死，更有个别被捕叛变，被秘密放出再打入党内，作内奸叛徒配合军警特务的工作。从1934年以后，敌人改换方式，长期侦察，监视跟踪，掌握更多线索，求得一网打尽。逮捕后则尽量强迫或引诱自首叛党，发表反共声明，至少也要表示不再反对国民党，再具保释放。仍派特务纠缠，逼迫汇报人事来往及行动，也有的长斯押在拘留所不作判决，或转到苏州反省院长期关押，逼供和诱迫转向。我党对付敌人的办法是严密党的组织，保密纪律，同志之间除工作之外不来往，不通姓名；发生被捕、被搜及可疑情况时迅速转移；利用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当局的不同法律和矛盾，通过有关人士在案件发生之前，从警局法院探听消息及时发出警报；在案发之后，通过内线或进步律师调查了解案情，设法营救，判刑后则按监狱的规定，定期派人化装探监，传递消息，送衣物书籍，出狱后则尽量安排生活、治病，转移地方，躲开特务的纠缠。

打倒“四人帮”之后，因审查江青历史，牵涉到徐明清和她的关系，有必要介绍一下她俩在上海被捕的情况。

江青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俞其威（黄敬）结婚，住党的机关，同年4月因机关破坏，小俞被捕，她失掉关系，不能在青岛立脚，经俞珊介绍来上海，住在田汉家，并加入剧联工作，7月又

经田原介绍到晨更工学团辅导歌咏并排演话剧，即转入教联。1934年夏，教联派江青到沪西小沙渡路纱厂女工学校教书，她仍在各工学团、各女工学校帮助教歌和排演话剧。9月某日她约团中央的阿乐为女工学校演戏时拉小提琴（阿乐原在青岛工作，即与江青认识），他们在兆丰公园接头，不知阿乐已被特务盯梢了，江青从北门出去，在华界曹家渡马路上被特务架走了，关在上海市公安局。因为既无叛徒指征，又无任何证据，公安局将其关押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有价值的口供，允许找保放出。在她被捕后，教联常委会和女工学校都不知她的下落，常委通过黄警顽先生求李伯龙再求史良律师设法打听，才得知江关在公安局，案情不重，经与基督教女青年会教育干事钟绍琴女士多次协商，由女青年会出具证明信，证明江青是女工学校的教员，才得以放出。出狱后江青身体很坏，神经也不大正常，她说公安局要不定期的找她，查询她的行动和人事关系，指派一个叛徒盯她，所以她不敢回女工学校去。常委会认为她宜先设法治病，最好暂时离开上海，正好徐明清母病家里来电要她回家一趟，常委同意江青跟徐明清去浙江临海山区暂避，明清的父亲懂得中医，用草药给她治疗20余日，使江青健康有些恢复。这时，小俞也从北平来信，叫她去北平了。

徐明清的被捕，本来组织上照顾到明清的公开身份和对外工作的方便，尽量减少她参预秘密工作，而在工学团和女工学校的工作中，她的群众关系很好，也起到掩护作用，但是就在4月某日突然也被捕了。事情的经过是：原

教联盟员莫仲乔曾在晨更工学团开过几次会，后自动脱离了，他在杭州教书，被捕叛变，带领便衣警察到浦东徐明清宿舍捕人，明清被押走到一个女学生何淑君的门口，以要解手为由进入这学生家，让她赶快给王洞若送信通知自己被捕了。教联同志及时得到消息，经与陶行知先生研究派晓庄同学去公安局探望，求上海社会局长潘公展出面营救无效果。又被押往杭州，寄押在反省院，陶先生再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写信求情，又曾派女工朱冰如化装为上海社会局某科长的亲戚，持信三次去杭州探监，送衣物，传递消息。在审讯时，叛徒曾指证徐明清是共产党，但无充分证据，只能说她是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和她一道参加过教育学术讨论会，明清坚决不承认和共产党有关系，在工学团教书纯属职业性的工作，只不过是和一些教育工作者讨论过苏联、美国及陶先生的教育主张，也是正常业务活动，根本没有违法的事。敌人又调查她早年参加过共青团，明清说已脱离关系 10 余年了，什么也不知道。敌人严刑逼供，指望从她口中打开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突破口，使用了多种刑具拷打，使她的脑神经受伤，全身浮肿，头发脱落，但她坚贞不屈，不给敌人任何口实。国民党监狱当局多次审讯后仍不能定案判刑，不得不允许徐明清于 1936 年 6 月，经在杭州的同乡们具保获释。明清出狱后即来上海向党汇报受审和出狱的经过，恢复了关系。此时她的病情和伤势均很重，组织决定让她暂时回山区家乡养病，等健康恢复再考虑工作。1936 年 7 月，我从西安来上海向上海临时工委（由原中央文委和江苏省委合并成

立，邓浩为书记，王学文负责白军工作)汇报工作，要求增派干部加强东北军地下党的工作，工委当即决定调原教联党团书记张敬人和刚出狱的谢克东，中央出版部的宋任远，编义勇军小报的石天霓4人去西安，丁华、王洞若提议让徐明清也去西安，既远离上海的环境，也好治病，健康恢复后可作妇女工作，于是在沪的4个同志随我先走，规定好联络办法，再通知徐明清随后赶去。此后明清于这年9月到达西安，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安排住在105师师长刘多荃公馆，担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家属妇女支部书记，我则于11月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将上海来的同志的组织关系交给白区工作部。西安事变后，中央代表团到西安正式成立陕西省委，调明清作省委军委机关工作。1937年2月，国民党中央系部队进驻西安，省委迁走，明清调西安市委任妇委书记，七七抗战后，中央调白区党员70余人去苏区学习，由柯庆施领队，明清又调去延安，而江青经徐明清介绍前赴延安，就在徐在西安工作这段时间内，原来江青自临海徐明清同志老家转赴北平后不久，即于1935年3月又回到上海，因她到北平既无组织关系又没有工作，所以再回上海后，教联也未再安排她的组织生活，江青本人也正式跻身影剧界，取艺名蓝蘋。这一时期江青为争取当明星，生活逐渐灰色，又与唐纳数次闹婚变风波，一时声名狼藉。上海“八一三”抗战后，与江青订有合同的联华公司迁往武汉，江青便找国难教育社的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要他通知徐明清，自己秘密的只身一人前往西安。到西安后她找到徐明清，说自己在徐入狱后没有

知己朋友商量，在婚姻问题上犯了大错误，现在决定不在白区环境生活，要去革命根据地从头学习，从头工作。当时教联、影联各盟的组织均已结束，江青没带什么介绍信，徐明清不能以什么组织名义介绍她，只能将她在上海几年的活动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同志汇报，其后经博古同志批准江青被安排住在办事处。几天后即随运货卡车去延安，被分配在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不久江青要求审查她的历史，解决组织问题，又进了中央党校。这一时期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均曾审查过江青的历史，也找徐明清写书面介绍，现在档案中存有的徐明清写的材料，并未证明她在上海有党的关系，完全按实际情况介绍的，与别的同志证词相同，是实事求是的。

在文革十年浩劫期间，徐明清因住过监狱，就被定为叛徒，长期被游斗，关牛棚，“四人帮”被打倒后，又因与江青的关系问题被关押两年零四个月。本来江青和徐明清的历史关系在延安已经过多次审查核实，中央完全了解的，特别是陈云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时负责审查过，因为徐明清在陈云同志领导下曾担任中央组织部妇女科副科长。当年江青与主席的关系，马列学院许多同志曾上书洛甫表示反对，洛甫也曾以中央总负责人和马列学院院长名义向同学们作过解答。徐明清的冤案直到1979年11月中央才正式作出平反结论，1982年7月7日，中组部发的案例复查通报第一号，又就徐明清是否包庇江青的问题公布了复查结果。我想这该是可以澄清人们的一些误解和传闻了。

〔附录〕

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

中发（1977）10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中，引用了原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1972年定徐明清为叛徒报告的内容；并认定徐明清和江青订立攻守同盟、互相包庇自首叛变问题。

1979年，农业部党组对徐明清同志历史上被捕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撤销了1972年和1975年原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定徐明清为叛徒的报告，为徐明清同志恢复名誉。

关于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时为江青写的证明材料与其他同志所写的材料一致，是实事求是的，并未证明江青1933年在上海北新泾有党的关系；徐明清同志在被关押期间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恢复她自由的当时，就声明纠正了。据此，认定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上述结论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

1988年9月20日

陕甘宁边区概述

《陕甘宁边区》编辑组

一、陕甘宁边区的形成

陕甘宁边区地处祖国的西北黄土高原，山峦连绵，沟壑纵横，雨量稀少，灾荒频仍，交通不便，地瘠民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旧社会，由于军阀野蛮掠夺，官府衙吏横征暴敛，地主豪绅残酷剥削，民生凋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陕北、陕甘的党的组织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组织起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支红军，创立了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建立，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六个师对西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现子长）、延长、延川、安塞、保安（现志丹）、靖边等六个县的县城，陕北、陕甘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建立和巩固了二十多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红军扩

大到五千多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在创造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是两位杰出的领导人。

1935年9月，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与由陕南转战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军团成立后先后在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中，取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大部的伟大胜利。正当陕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紧要关头，苏区内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被捕，革命形势出现严重危机。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边的吴起镇。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下令纠正苏区内正在进行的错误肃反。1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指挥下，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联合作战，取得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

1936年2月，红军渡黄河东征。6月，东征回师之后又挥戈西进，解放了甘肃、宁夏边境的部分地区，形成了陕甘宁边区的区域范围。

1937年3月，苏区改为特区，不久，改名为陕甘宁边区。9月，经蒋介石指定和国民政府行政院333次会议

^① 引自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5页。

通过，将延安、延川、延长、绥德、米脂、葭县（现佳县）、清涧、吴堡、神木、府谷、安定、安塞、靖边、定边、保安、甘泉、邠县（现富县）、淳化、正宁、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枸邑（现旬邑）、盐池等二十六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辖治。当时，边区的区域面积十二万九千余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万。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先后夺去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等五座县城、六个区、四十三个乡，计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万。边区政府随即新建了新宁、新正、淳耀、赤水、固临等五县。1943年底，陕甘宁边区的区域面积为九万九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五十万。共辖有一市、三十县，划分为五个区，即：

延属分区，辖：延安、甘泉、富县、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固临等九县和延安市，人口约四十万。

绥德分区，辖：绥德、米脂、清涧、吴堡、佳县、子洲、神府等七县，人口约五十六万二千。

关中分区，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县，人口约十二万一千。

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曲子、华池等六县，人口约二十六万二千。

三边分区，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等四县，人口约十五万五千。

二、陕甘宁边区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扩大、巩固和建设起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足点，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陕甘宁边区的特点是：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的十三年中，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总后方，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的摇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如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同年8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8年9月底到11月初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1945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8年12月在米脂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等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制定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引中国革命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胜利地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转折，指引中国人民胜利地完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在延安时期全面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延安时

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①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重要决议文件、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发表的大量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党的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著作、讲话中，它哺育了全党，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今后也将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胜利前进的灯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力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到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浴血奋战，打击、歼灭敌军，不断壮大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抗击了64%的日军和95%的伪军，开辟了十八块敌后根据地。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英勇奋战，最终打败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陕甘宁边区是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延安被誉为革命圣地和革命熔炉。抗日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进步人士、爱国青年和爱国侨胞，不畏艰难险阻，不远千里万里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寻求真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为了

^① 引自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56页。

适应抗战需要，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二十多所，培养干部四万多人。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了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和党的优良作风，提高了觉悟，改造了思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心，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曾经出版过相当数量和有很大影响的书刊报纸。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时期在延安出版马列著作五十多种，报刊三十多种，对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坚持抗战，赢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中共中央从延安首先发起，总结了成功经验，然后在抗日根据地推行的。前者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后者是解决抗战物资需要和财政经济困难之间的矛盾。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政组织和全体军民，尽了最大的努力，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中共中央通过在陕甘宁边区的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全党工作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彭德怀指出，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经验，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有重大影响。聂荣臻指出，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的出发点，陕甘宁边区的一切重大活动牵动着全国的神经，

代表着中国的方向，全国进步人士无不对陕甘宁边区寄以厚望。陕甘宁边区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1936年，美国记者埃·斯诺到陕北苏区和红军战地考察采访，写出著名的《红星照耀在中国》一书，向全世界人民如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展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和希望的所在。抗日战争时期，艾·史沫特莱、贝特兰、哈·福尔曼、伊·爱泼斯坦等一批外国记者先后到陕甘宁边区访问，他们回国后大都对陕甘宁边区作了客观、友好的报道。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等率领的援华医疗队，先后不远万里来到延安，并奔赴抗日前线工作。他们不仅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也扩大和增进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在延安还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日人反战同盟支部和华北联合会以及日本工农学校、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等。越共领袖阮爱国（胡志明）、日共领袖冈野进（野坂参三）、国际学联代表柯尔曼、雅德、傅洛德、雷克难等，亦曾到过延安切磋国际反法西斯的问题，这些都具有国际影响和意义。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亲赴延安参观访问，对边区和八路军在精神和物质上都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援，更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国外侨胞中影响很大。1944年，美军派观察组驻延安，实地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情况，对美国当时对华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三、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产生和建立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这个统一战线民主政权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根据地在新形势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正式实现的直接产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进行谈判，最后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9月22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次日又发表了蒋介石“团结御侮”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实际上获得承认。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形成。随着形势的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由苏维埃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制已成为形势所需。早在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之后，1935年11月中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即告成立，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被划分为陕甘、陕北两个省和神府、三边、关中三个特区，统一归于西北办事处领导之下。西北办事处是西北苏区的最高政权机构，同时也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办事处设主席团，博古任主席。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主持西北办事处的工作，开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更名”、“改制”的

准备。所谓更名，就是将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谓“改制”，就是将工农民主制的苏维埃制度，改为普选的不分阶级的民主制。5月，《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公布，从7月开始，举行了乡、县选举，改选了乡、县两级政府，至12月全边区共选举产生边区议会议员五百多名，但由于战争环境及其他原因未能及时举行边区议会的会议。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九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从此，陕甘宁边区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 机构的变革和党的建设

中共中央初到陕北时，撤销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成立了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省委，在关中、三边、神府成立了三个特委，在伊克昭盟成立了工委。1936年6月红军西征时，又成立了中共陕甘宁省委。193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高岗、林伯渠、吴亮平、马明方、李富春、周兴、李建贞、郭洪涛、王达成、习仲勋、白治民、刘长胜、崔田民、张秀山、刘景范、崔田夫、李维汉为边区党委执委，罗梓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

英、马丕勋为候补执委。第一次执委会议选举郭洪涛为书记。在边区党委成立前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了中共陕甘宁、陕北、陕甘省委，边区各地的党组织统一由边区党委领导。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高岗接替郭洪涛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1939年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党委，书记高岗，副书记王观澜。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边区党委改为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工作委员会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委员林伯渠、谢觉哉、肖劲光、陈正人、王世泰、张邦英，候补委员贾拓夫、李卓然。1943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为西北中央局常委。194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1945年10月以后，高岗调往东北，习仲勋任西北中央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及以后的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强了党的建设，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各项工作的不断发展。

1937年和1939年的两次边区党代表大会和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对于加强边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937年5月2日至14日，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指出：“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毛泽东作

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结论中论述了党的建设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和全党团结问题，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团结全党象钢铁一样”，“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①秦邦宪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指出：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党必须提高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水平，改革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这次大会，指明了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方针任务。5月15日，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百二十余名苏区代表，举行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党委成员。

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边区已有党员三万二千四百一十八名。在会后的两年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党员的决议》，全边区的党员发展到四万六千二百二十七名（军队中的党员未计在内），比1937年增长42%。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建立和健全起来，加强了对党员的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特别是党的纪律教育，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7至268页。

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准则。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各级组织的工作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1939年11月13日至12月17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塞县徐家沟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一百七十名。毛泽东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向边区党组织提出了“提高自己，帮助全国”的任务，召开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作了《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大会的决议特别强调指出，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列水平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巩固党的关键，并规定了党内政治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具体要求和办法，召开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大会还发出《告边区全体党员书》和《告边区民众书》，号召全边区的共产党员团结广大群众，以充分的毅力和信心贯彻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8月25日作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这次大会之后的两年内，边区的党组织进行了党员的审查和教育工作，党员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成长了一批老干部，提拔了一批新干部，增强了党的队伍的素质。党的组织也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

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

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并规定了二十二个整风学习文件（以后又增加了几个学习文件）。在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边区一级总学习委员会，下设党、政、军三个分学习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的整风运动。4月1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对整风学习作出具体部署。4月21日，任弼时在二千多人参加的边区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整风学习问题的报告。会后，全边区从上而下陆续掀起整风学习的热潮，边区系统的一万二千多名各级干部和各类干部学校师生参加了整风学习。大家认真学习整风文件，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开展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通过这次整风学习，较好地解决了各级领导机关，广大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这个基本方向问题。彻底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展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收获是极大的。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边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重要负责干部三百多人参加会议。这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一次整风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大问题：第一，是中央到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觉悟，清算了左倾错误路线对西北革命造成的危害。第二，是检查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以及实际工

作中的某些偏向，特别是某些干部闹独立性，地方工作中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军队中某些干部的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从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第三，是边区的任务问题，会议检查和纠正了某些干部在建设边区工作中的“百端并举”、“样样是中心”等不切实际、不正确的思想，确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这次大会有力地推动了边区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对于边区工作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在整风学习后期进行审干运动和群众性的反特斗争，康生利用整风审干之机，发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报告前后，边区各机关各地区掀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混淆敌我，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发现这一错误后，立即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随后对受害人员进行甄别平反，赔礼道歉，使整风运动得以继续健康发展。1944年中共中央组织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个文献集，进一步总结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五、坚持抗战，剿匪除奸， 保卫边区，巩固边区

（一）组织和加强抗战武装力量

国共合作实现以后，陕甘宁边区一度处于和平环境。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太原失守后，日军逼近黄河边，威胁边区安全；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磨擦事件，边区境内外土匪猖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团结抗日。为了坚持抗战，保卫边区，中共中央加强了边区的武装力量。将留驻边区的部分八路军主力，组成留守兵团，由肖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并设立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警备区司令部、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将地方兵团，组成保安司令部，由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为副司令员，谭希林为参谋长；同时，加强民兵建设，组织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以上三部分武装力量，形成边区军民三结合的武装体系，担负着保卫河防、肃清匪患，制止反共磨擦、保卫边区的重要任务。

（二）进行抗战动员，保卫河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年11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信，提出要把边区变成抗战动员的模范，要求党的一切支部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要求各个群众组织把抗战动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1938年3月8日，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

书》，提出：全边区人民应该武装起来，开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努力帮助政府军队做好各项后勤工作；一切群众团体都要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抗战工作之顺利进行。边区人民热烈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战动员工作。1937年、1938年、1940年三年内，边区动员一万三千多名青壮年参军，加上抗战前夕参军的人数，总计达三万余人。1937年、1938年组织二十二万人参加自卫军（三万多人是基干民兵），二万八千多名少年参加少年先锋队配合部队保卫边区。1937年11月晋南吃紧，边区沿河各县在七天内动员一万多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到山西帮助军队运输物资，支援战争。并为前线募送毛袜、手套十万双。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向边区河防发动二十三次进攻，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1939年5月，敌以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先后占领军渡、孟津、碛口一带，炮击沿河的宋家川、枣林坪，并用飞机轰炸延安乃沿河各县及边区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在宋家川方向，与日军昼夜隔河激战；边区动员各地自卫军整营出动，在隆冬寒月里，协助部队修好千里河堤工事，配合部队阻击敌人。在此期间，边区河防部队与日军大小战斗七十八次，在晋西北人民和军队的配合下，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使敌人未能跨我河防一步。

抗日战争期间，边区安置了一万一千五百多名伤病退伍军人，优待军烈属十万人，其中，为之代耕的一万七千多人，代耕土地十五万亩。边区脱产人员是很多的，最多时达十万人，仅粮食一项，每年就需要近十几万石。1937

年至 1945 年八年中，边区人民缴纳救国公粮九十八万三千石。在地瘠民贫、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供给这样多的粮食，谈何容易。但边区人民努力生产，节衣缩食，尽最大的努力，保证了抗战的需要。

（三）剿匪锄奸

1937 年八路军主力开赴前线后，边区境内外的四十多股土匪（四千多人）乘机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抢劫人民和合作社的财物，杀害抗属和伤残人员，破坏交通要道，掠夺军用车辆，甚至袭击基层党政机关，妄图破坏边区民主政权。边区军队在民兵配合下，采取以武力进剿为主，政治瓦解为辅的方针，彻底歼灭了股匪。同时，边区群众组织了九千多个锄奸小组，十万人参加，两年内破获敌特汉奸案一百多起，土匪案一百五十多起，消除了隐患。边区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四）制止反共磨擦

从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之前，国民党抗战比较积极，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也较正常。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他们散发反共文件，制造反共事件，破坏团结抗日。1939 年 5 月以后，国民党在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封锁线，包围边区的部队多达二十多万人。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2 月，国民党军队袭击占领了边区的镇原、宁县、正宁、旬邑、淳化五座县城、六个区、四十三个乡，先后在边区周围制造了一百二十四起反共磨擦事件，包括六十三次武装进攻。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边区境内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政

府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为绥德行政区督察专员，并在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延安、延长、延川、淳化、旬邑、富县、甘泉、安定等十三个县继续委派县长，这些地方大都是原来的苏区，在内战期间县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但是农村大都仍属边区。为实施组织人民一致抗日的大计，边区政府理所当然的在上述十三县内也建立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而何绍南等人却不顾团结抗日大局，公然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活动，诬蔑、攻击驻防的八路军，指使反动地主豪绅进行反攻倒算，有的国民党县长甚至绑架民主政权县长，枪杀民主政权的干部和伤残退伍军人。针对这种情况，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严正指出：“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1939年，中共中央发表“七·七”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并提出同顽固派进行斗争的三条原则。第一，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第三，休战原则，斗争到一定阶段，适可而止。这三条原则总起来一句话，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边区的党、

政、军、民坚持执行了这些原则，对敢于进犯破坏边区的顽固派，坚决予以还击。1940年2月中旬，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惩办贪赃枉法、破坏团结、擅离职守、贻误河防的“犯官”——何绍南，并报请委任王震为绥德行政区督察专员；3月19日，又致电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主任，要求撤走国民党在边区境内十三个县的县长。指出国共两党合作已三年之久，一县之内竟有“双县长”，政令不一，滋事扰民，古今中外，无此怪事。国民党政府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将委任的县长先后撤走。边区政府立即在上述十三个县建立了普选的民主政权。至此，结束了边区境内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边区得到统一和巩固。

1943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撤退河防大军，准备分九路闪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朱德当即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呼吁团结抗日，避免内战。7月9日，延安召开了三万人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号召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也纷纷集会，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边区人民的充分准备，各抗日根据地的有力声援和全国人民反对破坏团结抗战的强烈呼声，使蒋介石进攻边区的计划未能得逞。

从1945年7月15日开始至8月8日，国民党军队向边区的关中分区爷台山地区多次发起进攻并一度占领爷台山。边区军民奋起反击，于8月11日将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赶出边区，取得了爷台山的保卫战的胜利。

六、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陕甘宁边区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大力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完整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纲领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内容。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有益的经验。

（一）政权建设

毛泽东说：“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①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完全体现了这一原则。具体组织形式是“三三制”政权。即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1、参议会，实质上属人民代表大会性质，是最高权力机关。分边区、县、乡三级。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2、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5页。

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3、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1941年、1945年进行了三次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普遍、直接、自由的选举。

1939年1月，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到会参议员一百四十五名。林伯渠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这个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命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会议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这次参议会开得很成功，奠定了边区民主政治基础。这次参议会还没有实行“三三制”，边区政府聘请了十二名开明绅士为特邀参议员。

1941年11月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显著特点是实行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原则。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①林伯渠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接受并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于1945年5月1日公布、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1页。

经过全边区人民广泛讨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责成边区政府领导各级政府和全区人民群众切实执行。这个施政纲领更完整地规定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二十一项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纲领在陕甘宁边区的进一步具体化。大会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开明绅士）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开明绅士）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在选举的十八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七名，超过三分之一，徐特立即申请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这次参议会审议通过了非党人士李鼎铭等提出的“精兵简政”的重要议案，大会决议，“交政府速办”。1941年至1943年，边区政府连续进行三次精简，初步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是政权建设中的一项重大改革。1944年12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1945年的唯一任务是打倒日本侵略者。

1946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到会参议员一百七十名，共产党员六十一名，占三分之一稍强。这届参议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国共双方在1946年1月10日签署的“停战协定”，阴谋进攻解放区的时候召开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揭露内战阴谋，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和建设。林伯渠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到会发表演说，指出“中国的反动派还是不愿意

中国人民享受民主，他们正在寻找各种名义来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继续保持独裁，来继续进攻已经得到民主权利的人民，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与全国人民一起来粉碎反动派的阴谋，推进全国的民主事业和建设事业”。大会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马锡五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在十九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六名，占三分之一弱。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要让非共产党人士有职有权有责，不如此，就失去了“三三制”的意义。边区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要求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领导干部之间保持个人之间的联系，促膝谈心交换意见，要求共产党员和干部尊重民主人士主官的领导等。这样就充分发挥了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中，一贯重视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边区的三届参议会参议员选举中，少数民族的参议员名额按人口的比例高于汉族。边区参议会的议员中，少数民族议员六名。中共中央设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负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西北工委于1940年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并派出考察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考察。西北工委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后，西北局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边区政府成立了

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回族和蒙古族区域自治工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教育干部和群众尊重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边区政府还成立了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二）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分散的农村环境，经济建设以农业第一，工业第二，商业第三。抗战以来，边区的经济建设经过三个阶段。1937年9月至1939年为休养民力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有国民党政府发给军饷和外来援助，边区政府取之于民是很少的，1937年和1938年两年共征收公粮一万五千余石，1939年也只征收五万余石。大大休养了民力，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1940年至1942年是边区战胜严重困难的阶段。1940年9月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了军饷，而且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继绝了外援，一切军需民用都要自给自足。从1941年到1942年，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边区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太大了。”^①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自力更生”的伟大号召，要求全体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度过难关，支持战争”，要求边区军队和机关、学校一律参加生产，并

^① 引自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3至894页。

迅速建起自给性的公营经济。1940年到1942年三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获得的收入占了经费支出的部分或大部分，有的还做到自给有余，上缴公粮。终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几年来生产运动的成就和经验，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而只注意向人民要粮要钱的错误作风，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一系列重大政策。1943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提出为争取“丰衣足食”而斗争的号召。在整风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思想基础上，边区经济建设进入以争取丰衣足食为目标的新阶段。全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一切男女劳动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截止1944年底，农业方面，军民开垦荒地二百万亩，耕地面积增加到一千四百四十三万亩，粮食总产量较1937年增长70%，棉花种植面积由1937年的三万九千亩，增加到三十一万亩，增长近十倍，总产量三百多万斤，自给率达到50%以上。工业方面：由无到有，由少到多，先后建立起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火柴、造纸、印刷、煤矿、石油、化工、炼铸、盐业、机器制造和兵工等大小工厂一百二十多个，职工达一万二千人；私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一千四百多家，职工四千五百多人。棉布自给率达到73%，其他日用品工业也实现了自给或半自给。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公私营

商业也繁荣起来。延安市的私营商业，1937年只有一百二十多家，1943年增至四百七十三家，各类合作社也有很大发展。

边区的部队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自给。三五九旅除自给外还上缴公粮一万石，创造了“当兵不脱产，经费靠自给”的中外奇迹。边区的机关学校从1943年起，经费自给部分占全年财政总支出的64%，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从1943年起公粮逐年减少。1941年的征收公粮二十万石，1942年降至十六万石，1943年为十八万四千石，1944年降至十六万石，1945年降至十二万四千石。农村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前，贫农、雇农是农村主要群众，这时大多已上升为中农。手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比战前提高一至三倍，国营企业的工人工资提高60%至80%，机关、部队、学校的供给标准也有了提高。1940年、1941年那种极端困难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陕甘宁边区确实初步实现了丰衣足食，形成以农业为主体的私有经济《包括私营工商业》、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三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主要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干部，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财政经济的总方针和西北局关于生产第一的建设方针以及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结果。这个时期所采取和实施的主要措施是：

1、加强对生产运动的组织领导。

边区政府成立了财政经济处，各专区、县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实行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各级领导机关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动员工作，从中央到地方以至每个单位、每个工作人员，每个农户都制定和落实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使生产运动成为广大人民和干部的自觉的行动。

2、组织机关、学校、部队一切人员参加生产。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亲自种地、种菜、养猪纺织，为全党树立了榜样，所有工作人员一律参加生产，力求做到经费自给或半自给。干部参加生产，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提高了思想，锻炼了本领，带动了群众，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尤其重要的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安置难民、移民，开垦荒田。

陕甘宁边区除绥德分区各县和陇东分区庆阳等县人多地少以外，其余各县大都人少地多，有许多荒地可供开垦。1941年到1945年，边区安置移民、难民十万余人，组成一支新的劳动大军，五年来，开垦荒地三百多万亩，成为边区增产粮食的重要措施之一。边区政府规定：移民、难民开公荒可取得所有权，开私荒三年不交租。无论公荒私荒，三年不缴纳公粮。同时认真帮助移民、难民解

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极大地调动了移民、难民的生产积极性。许多移、难民一年就在经济上翻了身，有的还当选为劳动模范。

4、军队屯田。

1940年5月，朱德提出军队屯田政策。1941年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垦区。他们是战斗队，也是生产队。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努力生产，保卫党中央。”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都无一例外地斗志昂扬地投入到紧张的生产运动中去。第一年开垦一万一千多亩，第二年开垦二万六千多亩，第三年开垦十万亩。不但做到粮食自给，还上缴公粮一万斤。广大指战员以辛勤的劳动，把南泥湾创造成为“陕北江南”，“南泥湾，好地方，遍地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响亮歌声，传遍边区的各个角落，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在南泥湾屯田政策的影响下，1943年边区部队生产的粮食达七万石（折细粮），占当年边区增产粮食的三分之一。

5、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全边区共有企业劳动力六十三万多个，其中，全劳动力三十三万个，半劳动力三十三万多个。1942年，约有25%的男劳动力组织到以个人经济为基础，以自愿为原则的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中来（如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等），1943年半数左右的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有效地调剂了劳力畜力，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943年，全边区有十五万妇女参加了纺织组，纺纱一百六十多万斤；五万多妇女参加了织布组，织土布十

一万四千五百多匹。有一部分妇女打破了“好女不下地”的旧习，参加了农业生产。米脂县的妇女农业劳动模范，郭风英成为全边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标兵。

6. 奖励劳动模范，开展劳动竞赛。

在农业战线上，开展了学习吴满有劳动。吴满有是延安柳林二乡农民，他连年开荒，把六十垧（每垧三亩）荒地变成熟地，改良农作，增产粮食，他还带头多缴公粮，拥军优属，扶贫济困，成为劳动致富农民的榜样。1942年5月，边区政府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在工业战线上，开展了学习赵占奎运动。赵占奎是农具厂翻砂工人，他积极工作，始终如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爱护工具，节约原料，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努力学习，帮助别人。1942年9月，边区总工会号召工人向赵占奎学习。后来向吴满有看齐、向赵占奎学习，成为农业战线和工业战线上的群众性运动。全边区在农业、工业和其他战线上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劳动模范，他们在生产上和工作上起了很重要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成为推动大生产的核心力量。1943年劳动英雄杨朝臣、吴满有提出了开展劳动竞赛的倡议，朱德、贺龙立即指示在部队推广，西北中央局也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推广。从而掀起了个人与个人，村与村以至乡与乡之间的竞赛热潮。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在延安同时举行了劳动英雄大会和农业展览会，毛泽东在劳模招待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报告。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延安又举行了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和边

区全面建设展览会，毛泽东作了《必须学会经济工作》的报告，通过这几次盛会，检阅了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交流了经验，奖励了劳模，有力地推动了全边区生产运动向纵深发展。

7、改造二流子。

所谓“二流子”，指的是那种抽大烟、赌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全边区有二流子六千五百多人。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是社会上和生产中的一个消极因素。在大生产运动中，各地通过教育和强制生产等办法，使绝大多数二流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还被选为劳动模范。改造二流子对于改良社会风气，安定社会秩序，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促进生产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8、发展合作社经济。

合作社是由群众集股金办起来的集体经济。它对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支援工农业生产、方便群众购销、活跃市场稳定物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边区政府对发展合作社给予大力支援、帮助和指导。1943年全边区有各类合作社（消费、信用、通输、手工业、综合等）二百五十五个，股金一亿五千万万元（边区货币）。1944年则增加到六百三十四个，股金达七亿三千万元（边币）。延安南区刘建章办的综合性合作社办得最好，深受群众的欢迎，成为全边区合作社的旗帜。

9、发展公有经济，主要是发展公营工业。

1938年以前，工业方面的一些日用品几乎统靠外间输入，公营工业只有几个小规模军工、印刷、被服等

厂，工人人数也不过二百七十人。1938年开始注意建设公营自给工业。在1943年至1944年两年，公营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44年全边区公营工业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三个，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力量，对于解决军需民用，推动和刺激边区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边区处于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工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业和半机器生产。已建立起来的公营工业分别由十一个系统管理，技术落后，管理混乱。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决定：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并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去，努力改善管理，改进技术，提高产量和质量。1944年4月20日，张闻天《在边府直属工厂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公营的任务有三：即供给公家的任务，发展边区经济的任务，培养管理工厂干部的任务。”这以后边区公营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培养出了大批工业干部和技术工人，甚至对建国以后的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0、加强财政贸易金融工作。

边区财政贸易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抗战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平衡财政收支，稳定市场。1941年1月边区政府授权财政厅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章程，保证边区货币的顺利流通。1941年3月，边区政府确定新民主主义的税收原则，即在照顾人民生活的前提下，增加税收，保证抗战需要。人民的纳税负担，既要普遍，又要合理。从1943年起，改征收公粮为征收农业税，并实行统一累进税制。由于人民生产收入增加，农业税的负担面达

到总农户的 70%到 80%，1943 年前后，边区政府发放了农贷三千多万元，帮助缺乏资金的农户发展生产。同时对私营公业也予以资金帮助（或用贷款，或用投资），促其发展。边区的贸易工作以出口食盐、皮毛、药材为主，换回必需的物资，并将公营商业的商业网与民众的消费合作社密切联系起来，形成边区内外的流通网络。

11、彻底实行减租减息。

边区半数人口以上的地区，在抗战以前，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未经土地改革的地区则实行减租减息。1942 年以前减租减息停留在一般宣传上面。1942 年 10 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出《关于实行减租减息的指示》，同年 12 月，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从这年冬开始，未经土地改革的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实行了彻底的减租减息，减轻了封建剥削，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进行上述工作中，也曾出现过某些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偏向。但一经发现，即坚决纠正，所以整个生产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在大生产运动中，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涌现出不少新鲜事物，谱写出许多壮丽的篇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改造自然、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还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文教建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

落后，文盲高达 90% 以上。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农村连小学都很少，农民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和卫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疫病流行，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苦。

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在 1942 年的中共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上决定把生产与教育列为边区的两大任务后，边区的文化建设事业蓬勃地发展起来。

1. 大办干部学校。

抗战以来，中共中央把创办干部学校当做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1939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干部教育问题时说：两年来，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训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鲁迅师范等十七所干部学校，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后来，延安又成立了医科大学、自然科学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等。1941 年 9 月，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3 年 4 月，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新文学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大，1944 年 5 月行政学院并入延大，直属边区政府领导。此外，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及后来的边区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均办有党校，分期分批培训边区的县、区干部。党校以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以学用一致、言行一致为教学方针，先后培训干部三千七百多名。大大提高了边区干部的

文化政治素质。1942年以后，又在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附设行政人员训练班（地干班），培训行政干部四百多名。1943年开始，每年冬季各县举办区、乡干部训练班，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总结交流工作经验，每年参加训练的约二千人左右，有效地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理论政策水平。

2、加强在职干部教育。

毛泽东在1939年5月20日召开的干部教育大会上，号召在职干部在百忙中以“挤”的办法获得学习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了解和深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1942年《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特别强调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

陕甘宁边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指示，在干部中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和具体的部署。边区一级机关，按干部文化程度，分成甲、乙、丙三类组织学习组，分别学习规定的课程，包括文化、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内容，并规定每天上午7时至9时半为学习时间。各分区、各县也各按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学习，并且从上到下形成制度。坚持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对于提高干部文化、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并带动了边区各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3、办好中、小学校 and 冬学、夜校、识字班，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①边区党和政府，按照这个方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小学教育。1940年同1937年相比较，全边区初小增长七倍半，五年制小学增长三倍，在校学生增长六倍多达四万一千人。以后逐年增加，1944年以后还办起民办小学五百余所。中等学校也从无到有，到1942年边区就已有中等学校十所，其中普通中学二所、师范学校五所、中等专业学校三所，在校学生二千多人。冬校、夜校、读书班、读报组等的主要对象是成年农民，以扫盲为目的。1944年办起三千四百七十所冬学，入学农民达五万人，各类读报组、识字班几乎村村都有，最高时达五六万人。不论中小学教育和成年教育，教学内容都与抗战生产紧密结合，将提高文化和政治教育融为一体。

4、新闻出版工作。

抗战期间，延安和边区各地出版马列著作五十多种，报刊三十多种。《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是中共中央和西北中央局的机关报，各分区也都出版发行日报，有的县也办了报纸。边区级报刊的工农通讯员达一千一百多人。群众还自办大众黑板报，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和新人新事。

5、卫生工作。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2页。

延安建立了四所医院，各分区、县也办有卫生院、卫生社、医药社等医疗机构。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培训接生员，推广新法接生，动员群众同封建迷信和不讲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增强人民体质。

6. 文艺工作。

抗战期间，边区集结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大批文化人，形成了一支相当大的文艺队伍，文艺社团、文艺院校和文艺期刊，象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影响较大的有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鲁艺实验剧团、延安电影团、青年艺术剧院、延安平剧研究院以及鲁艺、边艺、部艺出版的《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月报》、《大众文艺》、《部队文艺》、《新诗歌》等刊物。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名演讲中，详细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指明了文艺工作的方向。5月30日，毛泽东又在到鲁迅艺术学院检查整风学习时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此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纷纷走向农村，走向工厂，奔赴前线部队。他们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演唱，改造旧文艺，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更加积极地为抗战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而斗争。文艺工作者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和提高。延安和边区其他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演出大量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诗歌、音乐，如《兄

妹开荒》、《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三打祝家庄》、《黄河大合唱》等风靡全边区，迅速传播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有些歌曲、剧目如《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等在全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新秧歌变成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对全国包括国民党统治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有所促进。在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文教建设中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教师、医生、通讯员、文艺工作者。为了表彰先进，总结经验，进一步推动工作，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边区政府会同边区文联于1944年10月17日至11月6日联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毛泽东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①这是边区群众文教运动的政策总结，为进一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指出了前进的途径。

上述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教建设综合起来，就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宏图，为新中国的建设安放了第一块基石。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0页。

七、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 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闭幕词中他指出，这次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①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与民主，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于8月28日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即《双十协定》。但蒋介石集团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悍然于1946年6月开始，发动全面的大规模的内战，从此，中国革命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党内指示中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页。

革命的阶段。”^①1947年3月，国民党出动达二十三万之多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当时边区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两万多人，在彭德怀等指挥下，同边区人民紧密团结，奋起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方针，主动撤出延安以至放弃边区的所有县城，扩大敌之弱点，精心捕捉于我有利之战机，各个击破，歼灭敌之有生力量。西北野战军转战一年，经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沙家店、清涧、宜川、瓦子街等战役，歼灭敌军共计十余万；而西北野战军却由两万多人发展到十一万人（野战军七万人，地方兵团四万人）。1948年4月，敌全军败退，狼狈撤离延安，逃出边区。西北野战军胜利地转入进攻，肩负起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一直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人民解放战争。这是对陕甘宁边区军民的极大鼓舞，也大大地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陕甘宁边区有两万多青壮年参加主力部队和地方兵团，一万多青壮年参加游击队，三万四千多人参加各分区地方武装，组成随军担架六千六百多付、临时担架一万五千五百多付，随军运输牲口五千五百头，供应前线部队粮食七千八百八十万斤、军草一亿多斤、军鞋十五万双，培训一千五百多名中学生担任野战医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9页。

院和后方医院的护士。边区人民在人力和物力上对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撤销。陕甘宁边区从成立到撤销，历时十三年零三个月，胜利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做出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用鲜血和汗水在中国革命史上写出了光辉的篇章。

彭德怀受命率师 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

张 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彭德怀正在祖国西北致力于恢复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艰巨斗争。他没有想到美帝国主义在我国东部邻国燃起的战火，使他重新披起战甲走向抗美援朝战场，在敌我武器装备十分悬殊，物资供应极端困难，战场条件异常恶劣的情况下，面对以美军为首的有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①的强大对手，导演出一幕极为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最终迫使美国在第一个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终以胜利而告结束。本文在这里叙述的则是彭德怀在率师赴朝之前的一段历史。

^① “联合国军”是由美军为首的16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即：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另加南朝鲜的军队。

(一) 新的任务 新的重担

1949年12月23日，在辽阔的西北高原上空，一架苏制军用飞机迎着西伯利亚的寒流，自乌鲁木齐飞来到西安降落。飞机的舱门打开后，首先走下飞机的是一位头戴皮帽，身披皮大衣身材结实魁梧的人，这就是彭德怀。他此次飞抵西安是在完成了和平解放新疆的繁重任务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匆匆回到西安，准备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的。

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彭德怀出任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2月，彭德怀来到新的工作单位——西北军政委员会上任。在西安市中心的一幢旧式大楼里，他开始以百战之躯领导展开一系列新的工作——制定西北地区各级政权机构设置方案，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计划……。此时此刻，他安静地坐在弹簧椅上，闭目沉思，几十年风雪露宿枪林弹雨的生活已成过去，新的任务，新的战斗和新的生活将从此开始。他现在不仅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而且还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几项重任集于一身，这不能不使他更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倾注全部精力领导西北人民建设好大西北。他曾对“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先生说：“西北地区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虽然这块穷地方比我们南方的气候和物产相差很大，但我还要扎根在大西北，死在大西北。”这是

因为自 1935 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后，他的大部分战斗生活是在西北地区度过的。西北地区的人民养育了他，在极为艰苦的战争年代和他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西北地区的高原、山川、城镇、农村多处有他留下的足迹，他和西北人民有着亲密的关系和感情，也决心不辜负西北人民的期望和信赖，要以战争年代那种坚强的毅力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领导西北各族人民建设好自己的家园。为了完成好这一崭新任务，他上任伊始常常抽空邀请一些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到他的办公室，倾听他们对开发西北地区经济建设的各种建议和意见并认真地做出笔记。有一次，他对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说：“我对于打仗还有点办法，对农业方面也懂一点，但对搞经济建设，还必须从头学起，因此，我们要吸收那些虽出身不好，但愿为社会主义祖国献策的专家一起工作，我们要团结他们，相信他们，绝不能歧视他们，要发挥他们每个人的专长为人民服务，搞经济建设必须有各方面的人才参加。”

1950 年 6 月 6 日，彭德怀出席了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讲话，中央主管财政经济的陈云同志也对恢复国民经济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彭德怀在发言中则针对当前党内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说：“我曾和邓小平同志谈过，我们现在已开始搞经济建

设，但我们党内现在的干部队伍多数是‘万金油’干部^①，我们必须尽快培养新的熟悉各种业务的专家。”就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央决定，要求各大行政区尽快拟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并要求在国庆节后向中央作全面汇报。为了贯彻中央的决议，彭德怀于会后火速返回西安，旋即召集西北地区各省市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讨论西北各省经济发展，规划远景，为在国庆节后向党中央汇报作准备。

(二) 朝鲜半岛 爆发内战

正当彭德怀集中精力拟制西北五省三年经济恢复计划之时，1950年6月25日，从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我国邻邦朝鲜半岛爆发内战的消息。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南部，面积仅占亚洲大陆总面积的二百分之一，它象一截突出的树干，从亚洲大陆北部向东南延伸，伸入太平洋的黄海与日本海之间，形成三面环海背连大陆的狭长半岛。自1910年8月，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朝鲜人民即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美两国政府代表1945年7月举行波茨坦会议期间，为了协调未来对东方法西斯——日本的军事行动，经讨论协商，两国决定，以朝鲜国土北纬38

^① “万金油”是一种普通的油脂药品，该药使用范围很广，什么病都可用，但什么病也治不好。

度线作为苏美两军对日军进攻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苏军向 38 度线以北的日军进攻并接受日军投降，美军向 38 度线以南的日军进攻并接受日军投降。1945 年 8 月 10 日，苏美两军开始从陆地和海上同时向朝鲜半岛的日军进攻。日军在苏美两军强大攻势下，于 9 月 2 日战败投降。从此，朝鲜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获得解放。但在日军投降后，苏美两军又以 38 度线为界，分别驻扎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地区。本来，38 度线只是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苏美两军也只是暂时驻扎。但是，朝鲜南部在美国的扶持和导演下却于 1948 年 8 月 15 日单独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选举了曾在美国居住了几十年的李承晚为总统。朝鲜北部人民鉴于美国破坏朝鲜的国家统一的新情况，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也于 1948 年 9 月 9 日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任命金日成为内阁首相。从此一个完整的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三八线成了一条互相对立的界线，北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南部朝鲜“大韩民国”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立情况下，双方矛盾日益加深，政治和军事摩擦斗争日益尖锐化，因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日益严重，战争空气逐步升高，终于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凌晨爆发了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

朝鲜战争本来是一个国家的内战，但是，美国政府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不顾世界人民的反对，为了继续维护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的统治，迫不及待地采取了武

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反动政策。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侵入朝鲜，配合李承晚军队作战，27日，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命令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全力支持南朝鲜军队作战。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也通过一项非法决议，要求各会员国给予南朝鲜李承晚政府以“必须的帮助”，为美国搜罗侵朝军队。然而，美国采取的侵略朝鲜的措施，并没有能立刻挽救南朝鲜军队在战场上的颓势，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乘胜向南进军，于6月28日解放了汉城，并继续向朝鲜南部的大邱、金山方向进攻。

鉴于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公开宣布派美军人朝支援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作战的严重局势，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一天，周恩来总理也发表声明，称“杜鲁门27日的声明，是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政府的庄严声明，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民的民族反侵略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继续向南进攻的情况下，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案，决议提出立即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军旗帜”，同时授权“由美国指派司令官”统帅和指

挥参加侵朝军事行动的各国军队。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任命了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兼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就在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同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发表声明说：“我国人民决不能再作殖民地奴隶，我们不能饶恕美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全朝鲜人民团结起来，为祖国的荣誉、自由和独立积极开展全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把美国侵略者赶出朝鲜去。”

(三) 美国出兵 我国备战

朝鲜半岛的内战，完全是朝鲜人民自己的内部事务，但是由于美国无视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反对，竟然出兵干涉朝鲜内政，而联合国又通过了要组成“联合国军”支援南朝鲜李承晚军队的无理决议，因而，使朝鲜战争局势日益复杂和严重。美国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非法决议案^①，更明目张胆地调遣大批军队侵入朝鲜，随后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帜，先后纠集了世界五大洲，16个国家的军队，

^① 决议是在5个常任理事会中，苏联缺席，中国席位为蒋介石集团窃据情况下作出的。

组织“联合国军”^①。另外，还有5个国家派出了战地医疗队。美国的战略企图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首先消灭前进到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然后越过“三八线”，占领北朝鲜，以达到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作为其侵略远东地区的军事基地。

鉴于联合国军侵入朝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应付朝鲜战场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的严重局势，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7月7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以及各军种、兵种和东北军区的负责人。这次会议决定立即组建一支东北边防军，尽快开往与朝鲜相邻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布防待命，以保卫我国东北边防的安全，同时根据朝鲜战场发展情况，随时准备渡江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委扩大会议后，中央军委即于7月13日命令驻华南地区的原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力所属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和驻黑龙江地区的四十二军共4个军组成“东北边防军”，此外，又抽调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和4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战车团、1个汽车团等26万多人，于7月底至8月中旬全部车运到鸭绿江北岸之本溪、凤城、辽阳、安东（丹东）、通化、集安、宽甸等地集结待命。为了加强领导和保证备战工作的顺利进

^① 派出军队的国家是美、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另加南朝鲜军队。派出战地医疗队的国家有：瑞典、丹麦、挪威、意大利、印度等5国。

行，东北边防军所属部队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领导，并任命原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为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另调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上述部队至8月中旬先后到达了鸭绿江北岸的特定地区，旋即开始进行政治动员，充实人员，改换装备，加紧训练，积极进行各项备战准备工作。

自7月中旬至8月，除美军陆续抵达南朝鲜外，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新西兰等国部队也先后自空中和海上到达南朝鲜协助李承晚军队作战，使朝鲜战争的规模逐步扩大。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主席于8月5日亲自拟电给高岗称：“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各部应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边防军于8月11日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传达并讨论了8月5日毛泽东的指示电。但会议上各部普遍反映，部队刚刚集结在南满地区不久，各项准备工作尚未就绪，特别是更换武器装备，进行临战训练，政治思想动员工作还没有系统进行，难以在8月底彻底完成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会议结束后，高岗于8月15日将部队反映的情况电告毛泽东并建议推迟出国作战时间。这时朝鲜战场上人民军的战场形势已逐渐恶化，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况和东北边防军当时存在的实际困难，于8月18日又电示高岗，边防军的准备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该电还称：“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此时，朝鲜战场的形势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经过多次激烈战斗后，至8月中旬已前进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大田、大邱等地，歼灭了南朝鲜军队中的大部和前来支援李承晚军作战的美军第二十四师一部，解放了南朝鲜约80%的广大地区。但是当人民军前进到洛东江边时，南朝鲜李承晚军队为阻止朝鲜人民军继续前进，固守待援，将洛东江上的重要桥梁全部炸毁。这时，向南败退的李承晚军队7个师的残部和先后到达南朝鲜支援李承晚军队作战的美军几个师，都收缩在洛东江对岸只有10000多平方公里，以釜山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由于敌军兵力高度集中，后方供应迅速及时，武器装备又占绝对优势，使朝鲜人民军进攻受阻，双方形成胶着状态的对峙局面。美军则一面自空中和海上继续增加兵力、准备反扑，一面又出动数百架飞机，轰炸朝鲜北部城镇和交通要道，严重破坏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供应线，因而使人民军的攻势受到极大的影响和挫折，处境越来越不利。在此严重情况下，毛泽东预见到朝鲜战局将会发生重大的曲折和变化，他考虑此事关系重大，有必要事先给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打个招呼通个气。8月27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一电，该电称：“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自从朝鲜人民军于8月初进攻到南朝鲜的大田、大邱、洛东江一带时，彭德怀就表现出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情。他曾几次对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说过：“朝鲜

半岛现在是一分为二，相互对立，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北朝鲜人民军打到南方去，美国不会坐视不管，这样下去可能会出问题，我国也应作点准备。”彭德怀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事家，作从战略的角度细心观察，已预感到朝鲜战争将不是一帆风顺的，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问题。

随着大批美军和其它国家军队源源进入南朝鲜来支援李承晚军队作战，美国空军加紧对朝鲜北部交通沿线狂轰滥炸，朝鲜战场形势开始急剧变化，为争取主动，捍卫我国边境的安全，中共中央军委不得不相应调遣有力部队开往机动地位进行备战准备。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驻扎在上海地区由宋时轮指挥的第九兵团调至津浦铁路沿线；将驻扎在西北地区由杨得志指挥的第十九兵团调至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以做到随时机动。这是一项有备无患的重大战略措施。

就在我国加紧备战之际，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秘密的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调遣了强大的陆、海、空军兵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南进到洛东江边受阻，后方交通供应断绝的情况下，由他亲自指挥陆、海、空军共约7万多兵力，在20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在朝鲜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随后登陆部队在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指挥下，急速向汉城方向进攻，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线拦腰截断。此时正在洛东江对岸布防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约10个师，也配合在北面的登陆部队开始向北进攻，对朝鲜人民军形成南

北夹击之势，人民军腹背受敌，加之后方供应断绝，遭到严重伤亡和损失，被迫沿山间隘路向北撤退，逐使已取得的胜利全攻尽弃，而且形势日趋恶化。

美军在仁川港登陆成功后，于9月26日又攻占了汉城。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假设俄国人或中国人没有宣布进行干涉的意图或没有进行实际干涉，你可越过三八线，消灭北朝鲜军队。”杜鲁门的指示实际上授权麦克阿瑟可以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9月29日，大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进抵至“三八线”附近。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严正警告美帝国主义。他说：“中国人民密切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然而，麦克阿瑟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他认为中国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战争创伤尚未恢复，不可能出兵援朝与美军作战。他认为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不过是“虚声恫吓”和“外交上的政治讹诈。”他吹嘘说：“如果中国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进行干预的话，那就可能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现在我们再也不怕他们干预了。”就在中国总理发表警告美帝国主义公开讲话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给麦克阿瑟立即发出一份电报称：“我们要让你感到，你在向‘三八线’以北前进时，无论在战术上还

是在战略上，你都不会受到限制。”有了杜鲁门的授权和马歇尔的鼓气，麦克阿瑟立即指挥高度机械化的“联合国军”向‘三八线’逼近。

当此朝鲜人民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于9月30日晚在使馆地下室仍举行了国庆招待会，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会后，金日成首相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参赞柴军武，当面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集结在鸭绿江边的十三兵团迅速过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反击敌人。”10月1日，麦克阿瑟又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金日成首相和外务相朴宪永鉴于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威胁的情况，在10月1日当天就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发来急电称：“……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机，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我们谨向您提出以上意见，请予以指教。”这封紧急求援的电报，迅速送至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

(四) 中国焰火 朝鲜战火

1950年10月1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虽然金日成的急电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馆的电报接连不断的

传到中南海，但在北京的街头巷尾，仍然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然而，就在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在一派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已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金日成的来电和我国驻朝鲜大使馆发来的急电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中央常委们讨论彻夜，一直到天亮才休会。同一天，离北京数千里之外的古城西安市，20多万群众也在新城广场敲锣打鼓喜气洋洋的欢庆新中国建国1周年，彭德怀以及西北局、西北军区的领导人习仲勋、杨得志、李志民、马明方、马文瑞等出席了大会并检阅了游行队伍。晚上彭德怀还以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举行了盛大国庆宴会，他在宴会上满怀信心地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我国各族人民有了空前的大团结，我们相信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一定会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接着他又十分乐观地叙述了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的宏图。这时的彭德怀一个心眼的考虑西北地区的建设问题，他并未预料到就在几天之后，对他个人肩负的使命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

就在我国广大人民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的同时，1950年10月1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三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

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终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鉴于此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彻夜未眠，他在十分焦急情况下，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对此，毛泽东略显急躁的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

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人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那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实际上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毛泽东从他和彭德怀在20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生活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严守党纪、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勒马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了：“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

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他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作出了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

这次会议还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初步把我国出兵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议临结束时，毛泽东又提议，将今天开会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电告斯大林。电文要点如下：（1）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2）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既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3）在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

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说：“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不巧得很，10月3日

华北地区乌云密布，细雨濛濛，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苏制的小型伊尔——14两个螺旋桨的飞机，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宜起飞，所以，直到10月4日周总理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才飞往西安。

(五) 彭总莅京 临危受命

1950年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来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汽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俩火速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时，彭总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计划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将这些计划方案向中央汇报。中办警卫处的同志向彭总敬礼后，为了严守秘密，只是对彭德怀说毛泽东主席请他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彭德怀一愣，惊奇的问：“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但不知开什么会？是不是原先通知要召开各大区领导人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方案的会？”来人回答说：“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只是对我们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准停留。”彭德怀迟疑一会说：“那我总要给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打个招呼吧？”来人又催促说：“不行，对谁也不能讲，要赶快去机场！”彭德怀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同志找来说：“中央让我立刻坐飞机到北京开会，来不及作交待，大概过几天就回来了，你可分头转告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几个主要领

导同志，对其他任何人先不讲，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办，我马上要坐车到机场去了。”^①此时一贯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的彭德怀，对这突然紧张的情况也感到迷惑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过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不管开什么会，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单位报来的三年经济恢复发展的规划方案、调查报告和图表统统带上，和他一起坐飞机到北京。上午11时左右，这架从北京匆匆飞来的飞机又匆匆起飞，穿过西安上空的云雾直飞太原。坐在这架飞机上的除了北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两人外，就是彭德怀，秘书张养吾、警卫员郭洪光等3人，这使得这架能搭乘20多人的飞机机舱内显得空荡荡的。因伊尔——14飞机性能较差，只能飞短途，于12时20分飞机在太原机场降落检修和加油。^②但非常凑巧彭总在机场上遇到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赖若愚和苏联顾问沙契柯夫，赖若愚向沙契柯夫介绍说：“这位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去年解放太原的战役，因徐向前同志有病，毛主席和党中央特派彭副总司令亲自来帮助指挥的。”沙契柯夫一听是彭副总司令，即热情地邀彭德怀和他共进午餐。此时彭总虽有要事在身但又不能对赖若愚讲出，于是他一再托词谢绝，但沙契柯夫拉着彭德怀的手坚决不放，一再挽留。秘书见此情景实在难以摆脱，即侧

① 据彭德怀秘书张养吾同志的日记。

② 见原彭德怀秘书张养吾同志的日记，1950年10月4日的记事。

到彭德怀身后低声说：“还是应付吃一点算了。”^①饭后彭德怀一行在机场候机室稍事休息，直到下午2时20分，才再次搭乘飞机自太原起飞。至4时零5分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②当彭德怀跨出舱门快步走下舷梯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迅速迎上前来向彭德怀敬礼，几辆小汽车早已停候在跑道一侧。李处长边帮忙提行李边对彭德怀说：“彭总，今天气候不好，气流不稳，一路辛苦了。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好了住宿。毛主席交待说，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彭德怀的脸立刻严肃起来，高声说：“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③

古老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穿来穿去的不停。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是千千万万的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总的话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

① 见原彭德怀秘书张养吾同志的日记，1950年10月4日的记事。

② 见原彭德怀秘书张养吾同志的日记，1950年10月4日的记事。

③ 据李树槐同志1985年的回忆。

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您没有亲眼看看当时欢乐的场面。”彭德怀若有所思的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不是不想来，就是前线离不开呀！”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毛泽东也发话了：“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的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共理由是：（1）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2）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 100 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3）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4）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5）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①毛主席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②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第二天上午 9 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彭总下榻的北京饭店。他和彭总两人在房间交谈约 1 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因为在昨天下午政治局的会议上，彭德怀未曾发言，毛泽东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

① 见《聂荣臻回忆录》（下）第 735 页。

② 见《彭德怀自述》第 257 页。

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报，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在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沓的眼神，直言坦率的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的频频点头，一边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的支持我的意见啰！”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

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 5000 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和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 24 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 25000 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 100 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接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彭德怀同意地说：“主席分析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

话题至此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来对彭德怀微笑说：“老彭，你看，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挂帅合适呢？”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即刻紧锁双眉两眼一闭，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东北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四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可是，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接着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付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挂帅，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毛泽东说到这里，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出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着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此时深为感动，略带感叹地讲：“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

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已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①，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

^① 据后来同周恩来一齐赴苏谈判志愿军武器装备等问题的师哲回忆，林彪、叶群当于这年9月下旬赴苏养病。

顿时呈现活跃，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面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5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因考虑须马上和彭德怀、高岗一起研究入朝的作战方案，遂留下彭、高以及周恩来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你和高岗8日先到沈阳去召开东北边防军高干会议，迅速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督促部队立即作好入朝准备。同时我把党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通知金日成。关于部队入朝的时间，给你10天作准备，初步预定10月15日。关于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问题，恩来同志即刻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尽快解决。”彭德怀虽然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1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毛泽东听后很高兴地说：“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你100%支持我，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将来全国人民都要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了使到你到朝鲜后工作上的方便，你先把岸英带去，他既会俄文，又懂点英文。我让他去的目的，为的是在你身边有个可靠的翻译，将来与苏联方面联系比较保密，让他担任翻译工作，另一方面也让他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在战争中去锻炼，这也叫作送子从军吧！”彭德怀听后感到有点突然，开始他默不作声，后来他婉言劝阻说：“你让岸英跟我到朝鲜前线去，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是想给全

党带个头。但是自开慧同志牺牲后，岸英从小受苦，到处流浪，后来又送到苏联学习很长时间，他已长期不在你身边生活，你们难得团聚在一起，我看还是别让岸英跟我去，就留在主席身边照料吧！”彭德怀虽然一再表示不同意，但最后毛泽东仍坚持让岸英随彭一起入朝。^①关于毛岸英随彭德怀入朝的经过，当时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元帅是这样回忆的，“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②

关于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的物资供应，毛泽东当面指示高岗应首先依靠东北地区的供应，然后全国都要支援。

10月6日凌晨1时左右，彭德怀回到了北京饭店，他躺在沙发上燃起一支香烟，独自一人沉思默想了一会儿，然后叫来张秘书要他尽快派人将带来的西北三年文教事业发展规划送至科学院郭沫若同志处，最后他又对张秘

^① 根据成普同志关于他人朝前夕在丹东招待所与毛岸英谈话的回忆。

^② 根据笔者1987年对聂荣臻同志的访问记录。

书说：“你天亮后给我的侄儿侄女所在学校打个电话，让他们请两天假到我这儿来玩玩，我想看看他们。”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又赶往中央军委，准时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

紧张的抗美援朝临战准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战场日益严重的局势，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10月7日吃过早饭后，他指示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记后，马上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保密室保存。然后到行政处去领被服和日用品，准备出发。当天，彭德怀乘车到中南海毛泽东处，和高岗一起共同研究志愿军出国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问题。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彭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导问题。彭德怀向主席提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导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千斤的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的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饭店，因为明天就要离京，他首先进屋看了这两天接来和他短暂团聚的侄儿侄女们，此刻他意识到，这次离别后，何时再见面很难预测，遂把他给孩子们买的衣物分给每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伯伯明天就出发执行任务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要经常给妈妈写信，把你们在北京的情况告诉妈妈。”幼小天真的孩子们立刻反问：“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还是回西安吗？”彭德怀拍拍孩子们的肩膀笑道：“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接着他叫来秘书吩咐说：“你和小郭把我们需要带的东西今夜准备好，明晨出发。”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内容如下：“（1）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籍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2）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3）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4）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5）我中国人

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6)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10月8日即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命令的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同志的特急电报，并立即发出。

电文如下：

(1)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2) 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它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4) 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①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① 朴一禹，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后为朝方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全权代表。

10月8日晚上，当倪志亮大使和参赞柴军武将此电报面交给金日成首相时，金高兴得两手一拍说：“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别拉着倪、柴两人的手进入会客厅，随手拿出几瓶酒请倪、柴一起喝酒言谈。其间他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

（六）争分夺秒 准备出征

1950年10月8日上午7时，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与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彭德怀指挥所的负责人成普，参谋徐亩亢，龚杰，秘书张养吾，翻译毛岸英一行乘飞机直飞沈阳，这次航行是绝对保密的，连每个人的亲属包括彭德怀的夫人均不知他们将前赴何地。上午10时左右，飞机冒雨安全降落在沈阳机场。东北局派人将彭德怀等接到和平街1号交际处休息。

中共中央根据事先与苏联方面的协商，就在彭德怀、高岗飞往沈阳的同一天，特派周恩来带翻译师哲和一名机要员，乘专机前往莫斯科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高谈购买苏方武器装备和苏联派出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

彭德怀飞抵沈阳后，即争分夺秒地开始了极为紧张的人朝准备工作。他和高岗首先召见了原东北边防军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

任杜平等，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派兵援朝的决定，并听取了当前部队备战和思想汇报情况。大家看到是彭老总来挂帅，都非常高兴，更增强了胜利信心。散会后，原在红三军团工作过的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杜平跑到彭德怀住处，高兴的向这位阔别了十几年的老首长说：“彭老总，我们真没想到你来挂帅”，彭德怀微笑说：“不但你没想到，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组织志愿军，中央原来考虑是让林彪去的，但林彪说他有病，不接受任命，于是中央才临时决定让我来的。”^①

下午，彭德怀和高岗召集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开会，在高岗讲话后，彭德怀说：“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司令也参加了。中央已下了最大决心尽快出兵援朝，要和敌人抢时间，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关于后勤供应问题，中央决定东北地区要全力以赴支援志愿军作战。希望东北局和军区的领导同志要认真研究部署，各项保障工作务必落到实处，这是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关键问题。”^②会议并商定10月9日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干部开会，研究部队出国前的日程安排。

8日黄昏，金日成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于当天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相朴一禹来到沈阳。朴一禹向彭德怀汇报了当前敌军进攻情况和朝鲜人民现状，并转达了金日成首相要求志愿军迅速出

① 见杜平回忆文章，载《星火燎原》1985年第6期第10页。

② 根据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1984年的回忆。

动，首先一部控制咸兴，一部控制新安州。会谈后的当晚朴又返回新义州。10月9日上午，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开会，目的是“说明目前形势及中央的意图，同时了解部队情况”^①。彭德怀在会上讲话说：“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和金日成首相的要求，中央已决定出兵援朝。这不是我们好战，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逼我们走这条路的。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前夕，周总理曾一再对美军发出警告，倘若越过‘三八线’北犯，中国将出兵援朝，但美国 and 南朝鲜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无视我国政府的警告已越过‘三八线’，正向中朝边境鸭绿江边进攻。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待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支援，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是三天前才决定的。”“这次出兵援朝，我们要决心打赢，但是也要有不怕打烂的精神准备，万一美国人打进我国来，那我们就烂了再建。各军要日夜加紧准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树立必胜观念，要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各军要在10天之内，克服困难，连夜突击，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但在会议上，各军干部也提出了问题，他们最担心的是在出国作战时，有无空军支援。于是当会议还在进行中，彭德怀和高岗又于9日上午11时联名致电毛泽东称：“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

^① 见1950年10月9日《彭德怀致毛泽东的电报》。

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

这时，已经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犯的敌军有：美国第八集团军所属之第一军（辖骑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第九军（辖步兵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十军（辖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和空降兵第一八七团，另有英军第二十七旅、第二十九旅、加拿大旅、土耳其旅等每旅各约 5000 余人参战；南朝鲜军队计有：第一军团（辖首都师，步兵第三师），第二军团（辖步兵六、七、八师），第三军团（辖步兵二、五、九师）。此外南朝鲜步兵第一师配属于美第一军作战，第十一师配属于美第九军作战。当时先后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还有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拥有各型战斗机 700 余架，第二十战略轰炸机航空队有各型轰炸机 300 余架，此外，美军每个师有侦察机 10 架支援其地面部队作战。至 10 月中旬，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总兵力已达 40 余万人，各型飞机 1000 多架（海军飞机除外），各型军舰 300 多艘。^①

自 10 月 1 日夜，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李承晚军队陆军第三师首先越过“三八线”后，到 10 月 9 日美国及英、加、土等军也全部先后越过“三八线”。鉴于朝鲜战场的局势严重，彭德怀心急火燎，他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我双方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决定亲赴鸭绿江沿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我态势。在 9 日军以上干部会议结束后，傍晚即乘

^① 邓华：《出国作战时敌情报告》。

火车由沈阳赴安东（丹东），他在沈阳的两天里，几乎是通宵达旦的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研究出国作战方案和后方供应等问题，每天几乎工作约20个小时，连吃饭时也谈工作，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10月9日夜在从沈阳赴安东的乘车途中，彭德怀仍不肯睡觉，他一边啃馒头干，一边在列车上召集丁甘如、成普等人开会，研究组织他的指挥所。他说：“在沈阳两天太紧张，现在抓紧时间算算人头帐，把从北京和沈阳调来的同志们分分工。”就这样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机构，就在火车上组成了。10日凌晨火车抵达灯火管制中的安东，边防军司令部将彭德怀一行接到镇江山招待所，彭德怀吃过早饭后不顾连日的疲劳，亲往鸭绿江边察看渡江地点，了解战备情况。此时侵朝“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40余万人的总兵力中，第一线兵力即有4个军共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共约十几万人，正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进犯。鉴于这一情况，为使志愿军在地面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以达初战获胜之目的，彭德怀于10月10日急电请示毛泽东，称：“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将4个军3个炮师全部集结江南待机歼敌，改变原定计划，妥否盼示。”^①此外，彭德怀还深感8日他在沈阳与朴一禹的匆匆会谈，内容不够详细具体，于是当晚20时他再次急电请

^① 这一建议为毛泽东1950年10月11日的电报所批准，事实证明，这是志愿军出国作战后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关键。

示毛泽东，称：“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须与金日成同志面商解决，拟明（11日）晨经安东前往德川。特报。”^①但彭德怀的电报刚发到北京，情况却又发生了突然变化。10月10日毛泽东也收到了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急电，称：斯大林答复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请中央对出兵问题再作考虑。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军掩护支援由苏联负责。因此当中共中央于10月2日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于当日深夜即将决定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空军作出准备。10月8日就在彭德怀、高岗飞往沈阳筹划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周恩来也于10月8日飞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督促苏联空军立即准备出动。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中国已决定立即出兵援朝。但是当8日晚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苏联南方黑海之滨克里米亚附近的阿布哈季亚别墅休假。9日上午周恩来和翻译师哲在苏联无帅布尔加宁的陪同下，乘苏联政府专机飞抵克里米亚，然后乘汽车前往克里米亚以东的阿布哈季亚，当晚7时与斯大林开始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会谈主要协商在中国志愿军入朝时，苏联能出动多少战斗机和轰炸飞机支援中国援朝志愿军，并由谁担任指挥，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但是出乎预料的是斯大林

^① 当时金日成同志已自平壤转移至德川。

根据朝鲜战争 10 月 2 日以后的事态发展，美军竟不顾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越过“三八线”北进，斯大林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中苏边境进攻，因此斯大林担心如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以，斯大林从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犹豫后退了。他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先给中国 20 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尽快运到满洲里，但是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其实，空军和陆军不同，飞机调动转场不过两三天就可准备完毕，而当时还有 10 天准备时间，完全可以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斯大林的态度，不过是犹豫推诿之意。中苏这次高级会谈直到次日凌晨 5 时才结束，中方代表周恩来对这一突然变化大吃一惊，立刻感到事关全局，于是他在苏外长莫洛托夫陪同下，赶紧于 10 月 10 日飞回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将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情况迅速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 10 月 10 日下午收到周恩来发自莫斯科的电报后，未曾料到的突然情况立即使他陷入焦虑之中，是马上出兵还是暂缓出兵呢？当夜他又突然收到彭德怀自安东发来的准备 11 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这两份电报使他翻来复去更感决心难定。经与代总长聂荣臻商谈后，他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明天先不要入朝而是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这时已是深夜，聂荣臻考虑万一明晨以前彭德怀收不到电报，彭就将入朝会见金日成了，

于是聂荣臻于 11 日晨 1 时左右赶到总参谋部作战室给彭德怀打电话称：“你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讨论。”

10 月 11 日下午，彭德怀奉命带了指挥所负责人成普由安东乘火车于深夜抵沈阳。12 日，彭德怀在沈阳和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紧急开会，针对他在安东调查到的部队存在的困难特别是后勤供应问题研究了一些紧急措施和解决办法。当晚 8 时，彭、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称：“（1）10 月 9 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来京一谈。”

13 日早饭后，高岗、彭德怀即奉命乘专机由沈阳飞回北京，由聂荣臻代总长在北京饭店迎接后一起到三楼交谈，聂说：下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出兵问题再次讨论。

在彭德怀与高岗奉命回北京之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部越过“三八线”，并已作好大举进攻平壤的准备。10 月 9 日麦克阿瑟以威逼口吻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称：“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10 月 10 日下午 4 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又到我国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威胁恫吓的情况，金日成首相于 10 月 10 日紧急召见我国驻朝鲜大使临时代办柴军武同志

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11日金日成首相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0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彭德怀在会议上汇报了三个问题：（1）与朝鲜代表朴一禹会谈的内容。（2）当前侵朝“联合国军”兵力部署和动向。（3）志愿军各部备战情况和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会议针对斯大林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对朝鲜战场的形势表现忧虑，对我国决定出兵援朝又顾虑重重，因而又取消了原定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的协商方案等新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反复考虑反复研究。因朝鲜战场朝鲜人民军情况危急，时间紧迫，不容犹豫，经彻夜会议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会议号召要自立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迎击向北冒犯之敌。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是否出兵援朝作战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中共作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为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立刻在中南海给与他同机飞回北京正在军委作战部待命的成普打电话，让他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出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仍要继续作好出

国准备。就在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拍发了火急电报，称：“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还与高岗、彭德怀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14日清晨，由于天气不好，飞机飞行有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岗先乘火车匆匆离京返回沈阳旋即召集志愿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局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政治局的最后决定，宣布立即作入朝的各项准备，并决定准备召开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14日全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志愿军各部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10月14日21时，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作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和第一步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其要点如下：（1）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2）美军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3）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

全军 26 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 10 天时间。(4) 为准备在 11 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 12 个步兵师 3 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5) 在我军开进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军前进为有利。”毛泽东为什么将上述决定告知周恩来呢？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我们出动 6 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 12 个步兵师和 3 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种改变出兵方案，有必要通告苏方，以使苏联方面了解我国出兵情况，从而尽快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困难。

10 月 15 日清晨，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这一天他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因为他知道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基地，打仗要靠重工业，战争的胜负，除了人是主要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当他在沈阳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六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他还亲切地鼓励职工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并指示工厂领导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15 日，由于敌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前来沈阳会见彭德怀。朴向彭说明敌军已逼近平壤，金首相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同志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 10 月 19 日开始部队分批

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进攻，迟滞敌人，我同高岗今天要赶赴安东去十三兵团布置部队渡江计划……”。彭德怀并邀请朴和他一起赴安东。16日上午，在安东召开了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彭德怀首先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随后他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形势，阐明了抗美援朝的重要战略意义，他说：“现在美军及南朝鲜军队正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疯狂进攻，局势是很严重的，我们对于兄弟党和邻国遭受侵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中央经过反复认真讨论后，认为不能置之不理，决定大力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我认为中央这种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如果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反动派的气焰就会高涨，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那对我国就是个直接威胁，国防、边防都会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他在讲话中严肃批评了“恐美病”思想，指出这种思想只会削弱我军的战斗意志。他指出：“敌人在武器装备方面是占绝对优势，但我们在战术方面就比敌人强，坚决勇敢，敢于近战，送炸药、拼刺刀、投手榴弹等，这些就是敌人所害怕的。”彭德怀根据朝鲜北部山高林密，地形狭窄，三面临海的特点，还指出：“过去我们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运动作战方式，在今天的朝鲜战场上不一定适用。”为此，他提出：“志愿军在战术上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形式，如敌人来攻，我们要把敌人顶住，一旦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

坚决包围歼灭之。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一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阵地。”针对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新情况他特别强调：“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者，这次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援助兄弟党，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援助朝鲜也就是巩固我们的国防，因此，我们进入朝鲜后，千万不要骄傲，不要以大国援助者的身份自居。对朝鲜的党，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切实尊重他们。”彭德怀最后强调入朝作战要作相当长期艰苦的打算，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切实遵守纪律，尊重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各级领导干部要多研究新情况，多想新办法，只要发挥群众力量，就能胜利地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师以上干部会结束后，为了听一听干部们对我国出兵的反映，彭德怀又约集了几个干部到住处谈话，进一步了解部队情况。在谈话中他又指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说：“当前部队干部战士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同思想反映，你们应起草一个政治动员令，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意义，提高指战员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胜利信心。”政治部旋即根据这一指示；编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誓词》，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在誓师大会上领读。誓词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战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全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

共同的胜利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姿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然而，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在美国方面，却出现了十分乐观的气氛。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所以他们判断美军在向鸭绿江边前进时，不会受到阻碍。麦克阿瑟猖狂扬言要在感恩节（1950年11月23日）前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他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的优势，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①美方要员们根本就沒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料到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敢与美国相抗衡。这些错误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在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导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的基本原因。彭德怀在安东部署渡江方案时曾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

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指示，“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扮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同电又指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毕竟还是比较清醒些，

^① 见《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第99页。

他在进入 10 月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了 30 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 45 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使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①于是杜鲁门紧急决定，必须和麦克阿瑟进行当而磋商，以便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关于中国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断。10 月 15 日，杜鲁门由华盛顿乘飞机经过 30 个小时的飞行，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当面会谈。当杜鲁门问及：“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可能性极为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 300000 军队，其中不超过 100000 至 125000 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 50000 至 60000 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他向杜鲁门断言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终止，”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谈，使美国政府认为侵朝战争已近尾声。于是杜鲁门亲自授予麦克阿瑟一枚橡叶勋章，以示对麦克阿瑟在朝鲜所谓卓越功绩的表彰后，于 10 月 16 日返回美国旧金山。17 日他洋洋得意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道：“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战士们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

^① 见《麦克阿瑟传》第 342 页。

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①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为暂时的胜利兴高采烈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正紧张地为出国作战加速准备工作。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司令员和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的保障问题。但此时，彭、高突又接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等的来电称：“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无顾虑的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意见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下午5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18日乘飞机火速回京。这是因为周恩来定于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电告彭、高：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并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18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

^① 见《杜鲁门回忆录》第433、第438页。

返回北京，旋即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 17 日来电内容。由于此时敌进甚速，平壤告急。就在当日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接着，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 4 时即停止，5 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毛泽东 10 月 18 日 21 时。”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十三兵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志愿军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中华人民共和国

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先头，开始跨过鸭绿江大桥。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朝鲜战场上，我党我军的一代名将——彭德怀又开始导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威武雄壮的一幕战争活剧。

建国初期中美关系 中的台湾问题

肖 健 宁

台湾问题是建国初期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后来逐渐发展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因而回溯和考察一下美国在如何对待中国领土台湾这一问题上，所采取政策的演变过程，无论对了解历史或把握现实都是有益的。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此后台湾被割与日本。1941年12月9日，在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时，宣布废除同日本签订的一切条约。1943年中美英三国共同签订了《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一律归还中国。《开罗宣言》随后又得到苏联的承认。台湾归属中国就此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对战后的设想之一，就是中国能成为美国在亚洲战略上的重要伙伴。因此，美国乐于承认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台湾归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45年10月25日正式接收了台湾，离开中国50年之久的台湾又回到祖国怀抱。

然而中国事态变化之快出乎美国的预料。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不复存在，形势急转直下。从这时起，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筹划如何从中国大陆脱身的同时，美国对台湾开始另有一番考虑。1948年11月初，美国国务院要求军方就台湾可能落入“克里姆林宫指挥下的共产党人之手”将对美国安全产生何种影响作出估计。军方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有重要地位，因而美国必须“通过外交和经济的手段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①。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初作出的对台政策报告肯定了这一基本政策。为什么要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而不用军事手段呢？美国军方解释道，这是因为美国在全球所要担负的“义务”众多，而实际兵力却严重不足。台湾的战略地位虽重要，但在全球战略中还排不上队——至少它不如欧洲的冰岛对遏制苏联的作用大^②。因此，最好是采取这种既不出兵，又能保住台湾的办法。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和

①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年第8卷, 华盛顿, 1973年版, 第261~262页。

② 《美国外交文件》, 1949年第9卷, 第285~286页, 1975年华盛顿版。

经济手段呢？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制定的对台基本政策报告中说：“最切实的手段就是把这些岛屿（指台湾和澎湖列岛——笔者注）同中国大陆分离开”，而美国不要“公开地、单方面地为它负责”^①。国务卿艾奇逊补充说，欲达到分离台湾的目的，就必须小心地掩盖这种目的，“克制对台湾表现出热心”^②。美国决策人是想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实现台湾的独立自主。为此，他们曾设想了一系列办法。如联络“台独”势力；拉拢台湾省主席陈诚；阻止蒋介石去台湾；支持吴国桢、孙立人建立“开明”政府，最终实现台湾自治。但蒋介石名义上下野，实则大权在握，他把台湾作为最后基地，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驱蒋出台、换马或依靠台独势力等方法都行不通。此外美国还设想以国际托管为名来暗中控制台湾，可是美国的盟国和蒋介石都不支持这一方案，也只好暂时作罢。到头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仍不得不同蒋介石打交道。但出于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和对台湾即将失守的深深忧虑，美国采取了低限度、有条件援蒋的政策。1949年11月3日，美国驻台总领事麦克唐纳会见蒋介石，向他宣布：已批准的对台援助仍继续进行，新的援助则视台湾当局的表现而定。国民党政府应限制大陆人员大量流入台湾，并在台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否则不会得到新的援助。同时麦克唐纳还说明，美国无意以武力保卫

① 《美国外交文件》，第270~275、290~291页。

② 同上第294~296页。

台湾^①。以上是1948年11月到1949年11月的情况。美国出于强权政治的需要，由支持台湾回归中国转为设法分离大陆与台湾。

二、对台湾保持距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9、10月间，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对台湾的前景进行了研究，认为在美国无力出兵的情况下，台湾会在1950年陷落。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国务院和军方在共同承认不能出兵保台的前提下，各持一种意见。军方认为，台湾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让台湾国民党维持的时间尽量长一些对美国部署亚洲的防务有利。还有人认为台湾可以作为秘密支持大陆反共游击活动的基地。基于上述考虑，除了应继续对台湾进行政治、经济和心理的支持以外，美国还应给国民党政府以“指导得当的，在严密监督下的少量军事援助”，并可派去军事顾问^②。

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认为，对台湾问题要从长远和全局来看。采用军方的意见，无非是把台湾陷落的时间推迟一年，但美国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为此，美国将同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联在一起，再一次卷入失败之中。这会使美国在亚洲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会把中国人的仇恨都集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402~403页。

② 同上第461页。

中到美国身上，还会给苏联提供攻击美国的借口，凡此种，得不偿失。美国的主要目标应是使中共同莫斯科相脱离，而援助台湾国民党政权会进一步促使中共仇美亲苏，这正是美国所应力求避免的。现在共产党人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国，这是国民党政府自身腐败的结果。中国国内现在并无抵抗共产主义的基础，军事援助不会起什么作用。而且，丧失台湾并不会真正危及美国的防务^①。

双方各持己见，看法相左，于是上交总统杜鲁门裁决。1949年12月29日，杜鲁门召集军政各方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杜鲁门认为军事应当服从政治，同意国务院的意见。从这时起到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台湾采取了“不插手”政策。这一政策转折的标志是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对台政策的内部指示，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对台政策的公开声明和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关于美国对亚洲政策基本立场的讲话。

国务院的内部指示主要下达给美国政府的宣传机构，让它们统一对台政策的宣传口径。内部指示的主旨在于通过宣传制造舆论，使各方面对台湾的“陷落”有精神上的准备，不致因此过度损害美国的威信和盟国的士气。指示要求美国政府宣传机构通过宣传说明以下问题：台湾在军事上并不重要，它被中共所占领并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国产生严重损害，也不会给中共提供特殊的战略利益。国民党在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第160~161、465~467页。

台湾同样治理不善，保住台湾并不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它没有企图，也不对它承担责任^①。另外，作为美国亚洲政策指导性文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1949年12月30日）中也说明，台湾很可能在1950年陷落，届时美国将退而以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一线为基地而与台湾决别^②。

国务院的内部指示很快被军方亲蒋派透露了出去，引起了在野的共和党的指责。事已至此，为了公开说明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杜鲁门总统便发表了正式声明。声明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现在无意在台湾获取特权、建立军事基地、派兵干预或对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③。国务卿艾奇逊在解释杜鲁门声明的时候还说，美国一贯支持台湾回归中国，不因权宜之计而改变自己的一贯立场云云^④。

接着，艾奇逊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被称为“划线”的讲话。讲话中他划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岛屿链防线。称凡在这条防线上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必须全力来保卫；而这条防线以外的地方，则主要靠当地人民自

①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第6—10页，196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② 美国国防部编《美越关系 1945—1967》（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 1945—1967），第8卷，第270—272页，1971年华盛顿版。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10页。

④ 〔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29页，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己负责其安全。艾奇逊划出的这条著名岛屿链防线，北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到菲律宾，其中并不包括台湾。艾奇逊还说明，蒋介石政权是因自己的腐败而被中国人民所抛弃的，美援非但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反而会导致中国仇美亲苏^①。

以上文件、声明和讲话标志着美国官方确定了对台湾的“不插手”政策。但这并非事情的结束。在此之后，美国朝野一直有一股保台势力在活动，企图改变“不插手”政策。

首先，杜鲁门的对台政策声明就不彻底。杜鲁门说的是“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加上“现在”二字是美国军方的意见。他们认为万一将来美苏之间发生战争，美国应占据台湾，以防这个战略要地落入俄国人手中。尤其是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一些人认为苏联已经控制中国，因而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其次，军方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后并未甘休。从1950年4月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多次建议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保住台湾。其中嚷得最凶的是美国远东战区司令、著名的共和党亲蒋人物麦克阿瑟。他形容台湾的战略地位有如“不沉的航空母舰”，公然称台湾是美国远东防线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②。

^① (美)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33页，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②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7卷，第162页，1976年华盛顿版。

再次，国务院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和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提出了建议书，建议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措施，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同时设法排除蒋介石，并通过联合国使台湾独立^①。另外，美国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人也积极主张援蒋或制造台湾独立。上述舆论压力对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改变对台政策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尽管存在着上述反对意见，但直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止，美国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不插手”政策。1950年5月，美国劝令其所有在台侨民撤离，以防台湾“陷落”。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两天，艾奇逊还向报界表示，美国将坚持对台湾的“不干涉政策”^②。如果这时台湾受到大陆的军事进攻，华盛顿或许不会为此同新中国大动干戈，而可能继续奉行不动用美军保卫台湾的政策。但战争没有出现在台湾海峡，而是发生在朝鲜半岛。对此美国作出了强烈反应，并立即改变了对台政策。

三、对台政策的转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国内麦卡锡反共浪潮和国际上美苏冷战加剧的气氛下，这一突然事变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6卷，第339、346~351、366~367页，1976年华盛顿版。

^② 《纽约时报》1950年6月25日，第18页。转引自〔美〕南希·B·塔克：《尘埃中的模式》第187页，1983年纽约版。

对杜鲁门等人震动极大。朝鲜不同于台湾。李承晚政府是美国所扶持的，而蒋介石政权则被美国当作包袱。更重要的是，作为美苏临时军事分界线的三八线实际上是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它涉及到战略均势，是个极度敏感的问题。接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杜鲁门等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朝鲜战争是苏联“侵略”行动的第一步，如果任其发展，终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认为，在用主要军事力量防卫西欧的同时，必须在朝鲜“迎接挑战”。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全球战略的平衡，给共产主义以威慑，并为盟国撑腰。据此，杜鲁门等人当即决定用一定的兵力对朝鲜进行干涉。他们认为，在大战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为确保朝鲜美军的安全和远东防线的稳定，必须占据战略要地台湾。这正符合军方的计划：一旦美苏发生战争，美国应防止台湾“落入俄国人手中”。美国当局原来认为，今后美苏间的战争将是一场动用核武器的全面战争，主要战场在欧洲。朝鲜战争的爆发开始使这一观念产生动摇，加上日益强烈的保台呼声，杜鲁门和艾奇逊对台湾问题的看法由此发生转变。因此，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杜鲁门等人就作出决定：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大陆进攻台湾，为避免冲突扩大，必要时也劝阻台湾进攻大陆^①。这就是所谓的“隔离”政策或曰台湾“中立化”政策。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就来了个大转折，由“不插手”变为武力控制。这是当时美国强权政治和反共心理的产物。杜鲁门

^① 《艾奇逊回忆录》，上册，第267~270页。

在他6月27日的声明中说：“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①这同他1月5日声明中所表白的台湾应归还中国的诺言恰成鲜明对照。杜鲁门6月27日声明是美国对台政策上的大倒退，是它公开地分裂大陆与台湾的信号。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打着维护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旗号，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对台湾以“隔离”为名，行武力控制之实。杜鲁门政府恢复了对台援助，并开始把台湾纳入美国的远东战线。但是在具体的对台政策上，杜鲁门、艾奇逊同军方尤其是麦克阿瑟之间，也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军方主张把台湾建成一个有力的军事基地。1950年7月27日，军方决策机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立即向台湾提供军援，增派美军，允许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空袭并在大陆港口布雷。7月29日，联席会议又致电麦克阿瑟，发出警报说：中共已集结20万军队和4万艘海船，宣布要夺取台湾，台湾形势非常危险，联席会议已批准国民党采取行动^②。麦克阿瑟早就反对政府“欧洲第一”的对外政策立场，而主张“亚洲第一”。他认为蒋介石是亚洲抵御“共产主义扩张”的代表，美国必须给他以有力的支持。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告后，麦克阿瑟迫不及待于7月31日访问台湾。国民党人把他看做是救世主和

^① 声明全文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89~90页。

^② (美) 布雷德利、布莱尔合著《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109页，1985年军事译文出版社版。

患难朋友，对他的访问给予隆重的欢迎，大事渲染。麦克阿瑟也非常得意，他发表声明称：“余在台与各级人员所举行之会议极为恳切而和谐。”“余统率下之美军与中国政府军队间之有效联系，业已完成，敌对力量倘愚蠢到企图发动攻击，则吾人当更能作有效之应付。”^①麦克阿瑟还擅自派小批战斗机到台湾进行适应性飞行，并准备在情况紧急时把三个中队的战斗机调往台湾。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杜鲁门、艾奇逊等人的不满。尤其使杜鲁门恼火的是，麦克阿瑟在8月份给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公开信中公然同美国政府的外交辞令唱反调。当时美国正竭力为出兵台湾辩护。美国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说，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中立”的行动，是为了“保持和平”，美国并不想占据台湾，美国欢迎联合国对台湾进行实地调查，解决台湾的地位问题^②。而麦克阿瑟的公开信中却大肆强调美国占据台湾的重要性：“由于台湾的地理地位和基地的潜力，假如它被与美国敌对的军事强国所利用，则美国前线地位的中央及南翼的战略重要性，将被抵销或整个被淹没。”“以为我们假如保卫台湾，就会疏远亚洲大陆，这种论调实在是荒谬无比”。^③这后一句话显然是针对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的观点说的。

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一方面派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同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123页。

② 同上，第150页。

③ 同上，第153~154页。

意给国民党以一定的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不愿让国民党进攻大陆，不愿同蒋介石一起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他们认为过分发展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会有四个弊端：一会破坏美国在亚洲人心目中的形象，使人认为美国支持腐败政权或对台湾有野心。二不利于分化中苏联盟。三可能引起中美战争，使苏联从中渔利。四会遭到盟国的反对。基于以上考虑，艾奇逊拒绝了国民党派军队援助南朝鲜的请求（台湾当局于6月30日送交美国国务院一份备忘录，说愿派33000人赴朝助战。艾奇逊认为这样会削弱台湾防务，并可能引起北京出兵朝鲜，遂复函婉言拒绝）。艾奇逊和杜鲁门不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让国民党空军空袭大陆的建议，并指示麦克阿瑟不得擅自派飞机或军队驻扎台湾。他们对麦克阿瑟访台给人造成美蒋军事联盟的印象一事也很不满。为此，杜鲁门还专门派特使哈里曼当面向麦克阿瑟强调美国的政策：“绝不允许蒋介石成为发动对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我们卷入一次世界大战。”杜鲁门还指示军方致电麦克阿瑟说，对台湾防卫应仅限于无需派陆军去该岛就能实行的那些行动^①。麦克阿瑟那封公开信发表后，杜鲁门更是气愤，当时他曾想调动麦克阿瑟的职务，但考虑到麦克阿瑟的威望而没有这样做，而是命令麦克阿瑟把那封信收回，并强调

^①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419、422页，1974年三联书店版。

说：“在对外关系方面，只允许一个人发言。”^①通过考察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分歧，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朝鲜战争前期美国对台政策上的某种微妙关系：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把它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基地；同时又对蒋介石观感不佳，不愿同他建立过于密切的联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止她接管台湾；但又不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避免卷入同新中国的全面战争。上述政策上的两面性便导致了“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方案。

四、“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 方案的酝酿

如前所述，从国民党的失败成为定局开始，美国就暗中试图把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开。这一政策在实行中遇到了阻碍，曾一度搁浅。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转而对台湾实行所谓武力隔离政策。为了避免舆论的谴责和盟国的分裂，美国声称不干预台湾的前途。但出兵台湾海峡和宣传台湾地位未定本身就说明美国又重新开始实行分离台湾与大陆的政策。这便是“两个中国”方案的先声。

实际上，还在朝鲜战争进行当中，美国就开始考虑台湾的前途问题了：军方设法把因朝鲜战争而暂时出兵台湾变为长久之策。1950年7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不论朝鲜形势如何，美国应把目前阻止共产党军队占领台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424页。

湾的政策继续下去^①。1951年3月13日，美国国防部决定，从即日起协防台湾的任务由负责朝鲜战争的远东司令部转到太平洋舰队总部，其用意在于把出兵台湾同朝鲜战争分开。在军方主张将台湾作为远东军事基地的同时，国务院则试图通过政治方法使台湾独立。艾奇逊、腊斯克、杜勒斯等人主张去掉妨碍台湾独立的障碍蒋介石，在台实行民主改革，通过联合国使台湾独立，实现一中一台。为此，艾奇逊竟设想通过联合国表决或监督选举实现台湾“自决”或“长久中立”^②。他于1950年9月20日在联大发言，要求把台湾问题列入议程^③。腊斯克则直截了当地对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说，美国的盟国厌恶蒋介石政权。如果台湾能对大陆保持克制态度，去掉蒋介石，实行改革，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民主国家，美国便可能对台湾承担更大的义务^④。杜勒斯也对顾维钧面授机宜，劝国民党政府接受一中一台。他说：如果美国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不但必须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而且美国也失去了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的理由^⑤。

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情绪进一步加

① 《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6卷，第391~392页。

② 同上第555~556页。

③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173页。

④ 〔美〕博格、海因里希斯编《未定之秋——中美关系1947—1950》（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第44页，1980年纽约版。

⑤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第54~55页，1981年台北版。

强，并明显增加了对台援助。杜勒斯等人认为，如果此时将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而联合国表决的结果容许把台湾交给共产党人，那么国内的压力将是难以忍受的。为此，美国推迟了通过联合国使台湾独立的计划（1953年4月，新任国务卿杜勒斯又重提通过联合国使台湾独立一事^①）。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美国的人力物力消耗越来越大，人们对杜鲁门政府的不满也日益增加。1952年正值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适时地利用了人们的情绪。他许诺上台后要集中精力结束朝鲜战争，并对“国际共产主义阴谋”进行更积极的斗争。

艾森豪威尔上台伊始，为了显示强硬姿态，尽快打破朝鲜战争的僵局，他在1953年2月2日首次国情咨文中改变了杜鲁门1950年6月27日宣布的对台政策。他说：“在1950年6月大韩民国遭受侵略攻击以后，美国第七舰队奉命防止台湾遭受进攻，并确保台湾不被用作对中共大陆作战的基地。这实际上就是要美国海军充当共产党中国的防御部队。不管1950年的情况如何，在那道命令下了以后，中共军队就侵入朝鲜攻击该地的联合国军队。……因此，我正下令不要再使用第七舰队来屏障共产党中国。让我把事说得更明白些。这个命令并不暗示我们有侵略意图。但是我们决没有义务来保护一个在朝鲜对我们作战的

^①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第183页，1984年新华出版社版。

国家。”^①以上这段话曾被称为“放蒋出笼”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这一政策有以下目的：第一，想以此威胁中国，暗示如不同意停战，那么美国可能会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第二，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后，中国可能不得不在台湾对面布置军队，这样多少可以减轻对朝鲜美军的压力。第三，这样做可以显示新政府的坚强立场，同时又不会冒太大风险。实际上美国并无意支持国民党政府进攻大陆。而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此上述政策与其说是“放蒋出笼”，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和冷战的需要。

此后，朝鲜战争虽于1953年7月结束，但由于冷战的不断升级，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的冲击，院外援蒋集团的推波助澜，美国国内反共反华空气十分浓厚。在对华政策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敌视中国的三项原则：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合法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同时，美国还着力组建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包围圈。1953年8月，美国与南朝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国推动东南亚各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强烈的反共反华情绪给一些美国人造成这种印象：凡是反共政权就应该支持，对蒋介石当然也不例外。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美台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已失去驻军台湾的借口，但美国仍坚持继续控制台湾，作为遏制中国战线上的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第1082页。

重要一环。美国通过扩大台湾的政治影响，增加对台援助，来向中国示威。在大使一职空缺了近四年之后，兰金被任命为美国驻台大使，于1953年4月2日向蒋介石递交了国书。此后美国军政要员接连访台，美国同台湾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增派军事顾问并不断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愿支持台湾当局进攻大陆，而只是想把台湾与大陆分开，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一个前哨阵地。

1954年12月2日，美国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它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正式定型。美国通过条约使驻军台湾合法化，以便长期控制台湾，使台湾同大陆永久分离，组成完整无缺的对华半月形包围圈。《条约》规定美国得以在台、澎驻军，保卫该岛。有记者问杜勒斯，这个条约是否使现状改变？杜答：“是的。”“这个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与大韩民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归于完全相同的一类。”“这些岛屿（指台、澎——笔者注）……以条约使它们与美国连在一起”^①。但美国签订这个条约也有顾虑，怕因此被热衷反攻大陆的国民党人拖进战争的泥坑。因此《条约》第六条特别规定：《条约》中所说的“中华民国”的所有领土“应指台湾与澎湖”^②。另外，写上这一条也可以为制造“两个中国”提供口实。国民党政府极力促成条约的签订，其目的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047页。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053页。

无非是要取得美国的保护和支援。它强烈反对上述关于领土范围的条款，但为了缔约也只好暂时忍让，而另谋以换文和单方面声明加以补救^①。美国企图利用条约使台湾的现状固定化。它一方面承认台湾当局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随着新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美国也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国际事务中不同她打交道是不可能的（1954年6月中美代表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单独接触，次年8月起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大使级谈判）。为了摆脱上述对华政策中的矛盾，美国便试图从“两个中国”中寻找出路。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在私下里不断寻找制造“两个中国”的机会。例如，1955年1月19日艾森豪威尔答记者问时表示，“两个中国”“是不断加以研究的若干可能性之一”^②。1959年9月，美国民间研究团体康伦协会首次公开提出了新的对华政策方案，建议成立“台湾共和国”，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它代表了美国一些自由派人士的主张。但由于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美国官方始终没能公开提出和实施“两个中国”的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坚持台湾必须与大陆统一。

① 《换文》中说：“中华民国对于……条约第六条所述之领土及其他领土均具有效之控制，并对其现在与将来所控制之一切领土具有固有之自卫权利。”（同上注第2100页）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表示：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妨碍自由中国光复大陆的权利”。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148页。

在具体对台政策上，建国之初中国中央政府原准备于1950年夏季以武力解放台湾。朝鲜战争的发生打断了这一行动。此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同时强烈谴责美国对台湾的干涉。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政策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酝酿使中国政府认为必须在世界舆论面前强调台湾的地位问题，以防止美国利用条约使台湾的现状固定化。1954年8月22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于9月3日开始炮击金门。1955年1月，中国军队又解放了浙江沿海由国民党军队控制的一江山岛，这也是为了反击美台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中国的行动引起了美国的恐慌。美国认为上述行动是进攻台湾的前奏。艾森豪威尔专门为此发表国情咨文称：“美国必须使人毫不怀疑我们准备在必要时进行战斗，来维护自由世界在保持一个自由台湾方面的重大利益”^②。他还威胁说美国有可能在台湾海峡使用核武器^③。美国的行动使中国的内部事务变成了国际争端，由此形成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它引起了亚洲国家的担忧，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同时，它也暴露了在是否防守金门、马祖问题上，美国内部、美国同台湾及盟国之间的矛盾。为了表明中国的立场，缓和亚洲地区的紧张局

① 195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第2153页。

③ (美)罗伯特·杜诺万著《艾森豪威尔内幕故事》第125页，1958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

势，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①同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②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政策的发展。此后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一再要求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以便使台湾的现状固定化。中国政府一方面努力创造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一方面严正声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

台湾当局虽然依赖美国的保护，但也不赞成搞“两个中国”。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有着共同的认识。这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先决条件。

总之，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反对“两个中国”的政策。美国多年来干涉中国内政，并没给自己的形象增加什么光彩。所谓台湾事关美国国家安全等论调也越来越难以使国内人民信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围堵和不承认是无济于事的。在历尽劫波之后的1972年，美国终于通过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个认识来得迟了一些，但毕竟是个历史性的进步。从此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台湾同大陆的统一减少了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5年第6号。

② 同上第7号。

阻碍。然而前进的道路并非坦途，诸如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及最近台湾当局推行的“弹性外交”^①都属不合时宜之举。往者可鉴，来者可追。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尚须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

^① 即台湾当局力图“重返国际社会”，要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发展官方关系，甚至恢复外交关系。这实际上是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参见《人民日报》，1988年12月20日）。

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文告 和谈话资料摘编

周 大 计

1949 年

12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布《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中国人民的光荣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1950 年

1月1日 新华社发表题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的元旦社论。社论提出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以一切力量完成人民解放战争，肃清中国境内的一切残余敌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的大业。”^①

9月30日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

^① 1950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员会为建国一周年而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作的题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他指出，现在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斗争还没有完结，这是因为反动派残余所盘踞的台湾，现在是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直接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并最后消灭中国反动匪徒的巢穴。^①

1955 年

4月18日—24日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同参加会议的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举行会谈，阐明了我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他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②

5月13日 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他指出，现在通过谈判来和缓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成为关心世界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要求，但是美国并未停止对中国人民的挑衅，因此和平力量和战争势力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任何错觉和松懈都是不能允许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页。

② 周恩来：1955年5月1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的。^①

1956 年

1月30日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并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②

6月28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台湾时指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他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③

7月 周恩来同陈毅、张治中、邵力子等在会见外宾

① 周恩来：1955年5月1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99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0—202页

时又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愿望。他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他还认为，我们对台湾，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①

9月15日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说，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②

1957年

4月 蒋介石派宋宜山到北京作“实际考察”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并由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与之进行了具体商谈，中共方面提出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成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政务仍归蒋先生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以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

^① 转引自陈登才：《略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形成》，载《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7页。

^②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

外国的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4月13日 周恩来接见埃及《共和国报》总编辑文·卡·古达。在回答他关于是否有可能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时说，我们愿意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也在一天天增长。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武装解放台湾的准备，因为如果放弃这种准备，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9月1日 周恩来接见埃及国民议会议员毛希丁时，回答了他的问题。在谈到是否有迹象说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时，周恩来说，现在和平解放台湾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发展，但也不能希望太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事件发展很慢，不过一旦成熟了，发展起来又很快，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

11月14日 周恩来与西德《南德日报》记者凯普斯基谈话时指出，台湾的政权仅仅由于美国军队的占领和保护才能存在。美国如果搞成两个中国，它对台湾的武装占领就合法化了。这是中国人民坚决不允许的。至于中国人民用什么方法来解放台湾，那是中国的内政。周恩来说，我们力求和平解放，可以承认蒋介石在台湾的领导地位，但台湾应变成中国的一个行政单位。

1958年

10月6日 毛泽东代为起草《国防部长告台湾同胞书》。《同胞书》指出：“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而“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余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①

10月13日 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命令，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毛泽东指出，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命令》告诫台湾当局：“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命令》还指出：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的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②

1959年

4月18日 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台湾地区一切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撤走。任何割裂中国领土、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都是中国人民绝对

① 1958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②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不能容许的。①

1960 年

4月10日 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的讲话。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人不得干涉。但是美国却要求中国放弃自己的领土台湾的神圣主权。直到今天，美国仍然用武力侵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不断侵犯中国的领海和领空，进行军事挑畔和战争威胁。同时美国还千方百计地制造“两个中国”，企图使它霸占台湾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不能不为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美国侵略而斗争到底。②

5月27日 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他还说，蒋介石没有发表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愿意同蒋介石谈判解决问题。

①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政府工作报告》。

②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

1964 年

12月21日—22日 周恩来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时他说：我们坚持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谈不上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具体问题，美帝国主义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滚出去，中国人民一定要收复自己的领土台湾。^①

1971 年

10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问题发表声明。声明谴责美、日继续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揭露妄图继续制造“一中一台”，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中国”的阴谋行径。呼吁将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正义决议，迅速地使之得到全面的实现，再次要求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通统驱逐出去。^②

1972 年

2月28日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国政府在公报中重申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

① 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② 1971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①

9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②

1973年

8月24日 周恩来在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③

① 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② 197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③ 197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75 年

1月13日 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重申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并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①

1978 年

12月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发表公报。公报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公报号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②

1979 年

1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强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这一文告还同时提出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

①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

②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局之间的商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双方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等一系列具体建议。^①

1月30日 邓小平在访问美国期间，向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对台湾的主张，强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981年

9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这就是：

（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

（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

^①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五) 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六) 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七) 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八)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九) 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①

10月9日 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是要为建设统一的国家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决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他同时明确指出，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这一要求日益高涨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台湾问题纯属我国的内政。这个问题要由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希望国共两党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尊重，长期合作，风雨同舟”。他以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宋美龄、何应钦等先生和台湾各界人士亲自到大陆和故乡看一看，大家携起手来，为和

^① 198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平统一，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①

1982 年

7月24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致蒋经国先生信》中指出：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他认为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他在信中说，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可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他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表达了自己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期望。^②

9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呼吁：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督促国民党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前途民族大义为重，不要执迷不悟，及早举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③

① 198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② 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1983年

6月4日 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阐述了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政策。她强调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充分考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祖国统一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6月26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指出：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们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也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谈到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时邓小平说，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享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它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至于实现统一的方式，邓小平说，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①

^① 邓小平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

1月12日 赵紫阳在旧金山会见美国西部华侨和华人代表时说，多年来，人们常常看到国共两党的分歧，其实，两党之间也有共同点。双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不就是很重要的共同点吗？而且，和平统一中国，现在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我们是真心实意希望能够和平统一祖国的。他在阐述了有关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后还说：“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同时也希望世界各地的中华同胞帮助推动。”^①

1月13日 赵紫阳在旧金山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台湾问题答记者问。他说，我们不改变对台湾的政策。第一，不吃掉台湾，第二，不化掉台湾。他重申，我们真心诚意力争用和平方式使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向其他国家作出保证，承担只采取一种方式而不采取其他方式的义务。因为这终究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5月15日 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台湾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只要在和平统一问题上国共两党具有共同语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湾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任何犹豫、拖延，都是违背民心民意的，希望台湾当局郑重考虑。^②

10月3日 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谈到

①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奋斗》。

② 1984年6月2日《人民日报》。

台湾问题。他说，1997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因为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两个中国”已经不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相信他们都是中国人，会站在我们民族一边，维护我们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①

1985年

1月 邓小平在会见以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主席嘉道理勋爵为首的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说，下一步要着手解决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更宽，所谓宽就是台湾可以保留军队。解决台湾问题也不能一厢情愿。大陆的利益、台湾的利益以及同台湾有关的外国资本的利益都要考虑到；否则就搞不成。^②

6月16日 程子华在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争取把所有的黄埔同学团结起来，形成祖国和平统一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此他重申了中共中央对台方针的四个基本点，“即，（1）坚持一个中国，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人搞一中一台；（2）国共两党实行平等谈判，不存在你吃掉我，我吃

① 邓小平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② 198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

掉你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不容许外人干涉；（3）实行‘一国两制’，香港问题就是本此方针解决的，澳门问题也将本此方针协商解决，对台湾比对香港更宽；（4）设置特别行政区，但它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他希望身居各个地区、各个不同国家的黄埔同学，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各种渠道为祖国统一开展工作。^①

9月3日 在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大会上，彭真发表讲话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台湾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回归祖国。但是30多年来，台湾被人为地同祖国大陆分离开来。这是中国长期内忧外患历史的产物，是外国势力干预的结果，是违背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意愿的。要结束这种局面，可以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来解决。他认为这是最大的“求同存异”。“‘求同’，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求‘一个国家’之同。‘存异’，就是存海峡两岸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之异。实现和平统一，就是保证谁也不对谁实行强制。大陆不要求改变台湾现存的社会制度。大陆人民所实行的社会制度，自然也不是台湾当局所能改变的。”^②

^①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文献和资料丛书，第一辑第368—369页，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理论研究所编。

^②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文献和资料丛书，第一辑第373页，中央统战部研究所三局编。

1986 年

3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地区部队发言人宣布,为了进一步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局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我部已奉命于1985年停止向台湾和金门、马祖诸岛空漂海漂宣传品。这位发言人说,自1979年元旦我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炮击以来,台湾有关方面对福建沿海乡镇的炮击也逐年减少。台湾海峡地区的形势已趋向和缓。我们真诚地欢迎这种事态的发展。但台湾有关方面至今仍向大陆飘(漂)散大量有伤和气的传单。这是不符合两岸同胞的意愿的。我们希望台湾当局尽快改变这一类不顺民心的做法。^①

4月30日 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在马尼拉开幕。中国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年会。陈慕华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与亚行合作前景广阔。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陈慕华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据中国方面与亚行当局所达成的有关谅解,台湾当局将以“中国台北”的名称继续留在亚行。我愿借此机会表示:我们愿意按照与亚行当局达成的协议同“中国台北”的代表,在亚行的范围内共事合作。”^②

5月 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 B198 号波音 747 货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中国

^① 1986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② 1986年5月1日《人民日报》。

民用航空局于当日及5月11日两次致电中华航空公司，敦促尽快来办理接回货机及人员事宜；并对该机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对机上货物尽可能作了妥善保管。5月17日至20日，中国民航代表和中华航空公司代表在香港就交接上述货机、机组人员和货物事宜进行了业务性商谈，并达成协议。根据中华航空公司的要求，中国民航同意于5月24日以前在香港具体办理上述飞机、两名机组人员董光兴、邱明志和货物的交接手续。^①

10月9日 胡耀邦在会见爱国人士黄顺兴、张春男时说，我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以台湾当权者为主要和谈对象，但也重视其他爱国力量和人民的力量。祖国和平统一之后，我们将照顾对统一有功的当权者的利益，同时也照顾其他爱国力量和人民的利益。^②

1987年

5月16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系教授李远哲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和夫人秦惠蓉时说，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③

10月16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

① 1986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② 1986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③ 198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通知》热诚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并对台湾同胞来大陆时申请办理旅行证件、所携带的行李物品、汇入、携人的外币兑换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通知》指出，台湾同胞在大陆购买飞机票、火车票、船票及住宿饭店，享有与大陆旅客同等的待遇，他们可以与大陆同胞一样，到各地自由参观旅游。《通知》要求回大陆探亲、旅游的台湾同胞“应遵守祖国政府的各项法律和规定，尊重当地的社会习俗”。^①

11月5日 中国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说，内地公证机关和律师单位正在进行充分准备，积极为回大陆探亲旅游的台胞提供法律服务，并期待建立两岸同行的业务委托关系。^②

1988年

1月14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谈话，对蒋经国不幸逝世表示悼念，重申和平统一祖国方针不变。他说，我们希望新的国民党领导人，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把海峡两岸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良好势头推向前进，为早日结束我们国家分裂局面，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积极贡献。他表示，我们愿与台湾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完成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大业。我们由衷地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

① 1987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② 198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乐业。^①

3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公告，宣布不再追诉去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犯罪行为。^②

7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台胞投资的规定》，对台湾同胞来大陆经商设厂所涉及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做了具体说明和规定。^③

7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摒弃歧见 增进共识》的社论，对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有关决议，报告中和一些与会人士发言中关于“消除偏安思想和‘台独’意识”，“只有团结一致谋求统一，国家才有生机和出路”的主张表示赞赏。社论对国民党“十三大”提出“以国家安全与厘清敌我意识为原则”，仍然坚持“三不”的立场表示遗憾。社论认为人为地制造所谓“敌我意识”，是背离时代、拂逆民心的。针对国民党“十三大”所提出的把中国共产党与大陆人民分开的主张，社论指出，这是毫无道理、根本行不通的。社论认为，国民党上述这些论点是不合时宜的、自相矛盾的，是无助于祖国统一进程的。社论呼吁两岸全面开放，以满足两岸同胞积之既久的愿望，以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

① 1988年1月15日《人民日报》。

② 1988年3月15日《人民日报》。

③ 1988年7月7日《人民日报》。

时谈到中国统一问题。他说，在最近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大”上，国民党领导人就两岸关系讲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不得不这样讲。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们也有些积极的想法。特别是一些先生在会上就如何进一步议善两岸关系，促进国家统一提了不少好的意见和设想。对此我们表示赞赏。赵紫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海峡两岸存在共识和基础。第一，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第二，海峡两岸都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第三，海峡两岸都需要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对世界文明有着伟大的贡献。这一灿烂的文化凝聚着我们，是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赵紫阳说，中国共产党愿与中国国民党和台湾人民一道，为在上述共识与基础之上早日实现国家统一而继续努力。^①

8月2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致电台湾商务仲裁协会及台湾仲裁界人士，就海峡两岸仲裁机构的合作问题提出了建议，以保护在投资、贸易和经济技术交往中，双方当事人的合法经济权益。^②

12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受权就台

^① 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② 198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海版)。

湾当局推行所谓“弹性外交”问题发表谈话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历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反对与我建交的国家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和进行具有官方性质的来往。对完全属于民间性质的经济贸易和文化来往我们向来不持异议。我们的上述立场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在国际组织中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严正立场是十分明确的，也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充分理解和支持。早在1971年联合国就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据此，联合国已把台湾从其所有机构中驱逐出去，联合国系统的机构绝不能与台湾发生任何联系，这一原则也应适用于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个别政府间国际组织，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在我国政府与有关国际组织协商同意后，允许台湾当局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这只是一种特殊安排，决不能被认为是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模式。这位发言人指出，台湾当局竭力推行所谓的“弹性外交”，就是在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不仅违背了它一再声称“中国只有一个”的立场，而且与海内外关心祖国统一的中国人的心愿相悖。我们希望，台湾当局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和民心，以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全局为重，停止不利于祖国统一的活动；并进而与我们一

起，为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作出努力。^①

12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座谈会，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十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十年来，海峡两岸的关系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这是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进一步实现“三通”、加速祖国统一的进程中，台湾同胞一定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所有关心祖国统一事业的台湾党政军各界人士。在谈到当前台湾局势时他说，台湾当局尽管在缓和两岸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但仍坚持反共拒和的立场，继续强调所谓敌对意识，为两岸关系的顺利发展设置人为的障碍。力图长期维持分离局面。这种局势如不改变，必将助长台独倾向的发展，既有违国家民族的利益，也不利于台湾的安定和发展。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严重的关切。他强调，中国必须统一，国家不应分裂。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台湾独立和分离的言论和行动。

吴学谦说，我们诚挚地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各界人士共商国是，就统一问题进行接触和协商。我们主张国共两党在平等的基础上，尽早接触谈判，可以谈国家统一问题，也可以先就两岸关系和具体问题进行磋商。我们热忱欢迎国民党党政要员、社会精英，无论是大陆籍的或是台湾籍的，老一辈的或新一代的，都能回大陆来看看，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来去自由。我们热忱欢迎台湾企业家，无论是大企业

^① 198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还是中小企业，来大陆投资设厂，兴办各种实业，并可协商在沿海地区设立合作经济区；也可在沿海划出专门地区，供台湾独资开发建设。我们将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以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互利互惠，发展民族经济。目前有许多台湾同胞旅居海外，从事经贸和学术等活动，我驻外使领馆愿意维护他们正当合法的权益。^①

^① 1988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在盐城

王世谊

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负责指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党的工作。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肩负这一战略任务，组织力量，深入华中敌后，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中抗日斗争。从1940年11月到1941年7月，刘少奇在盐城领导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使盐阜区迅速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盐城成为华中解放区的首府，在当时被誉为“第二延安”。

1940年10月10日，黄克诚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盐阜区，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镇胜利会师，开辟了盐阜抗日根据地。苏北局面打开以后，为了加强对华中军事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1940年11月7日，刘少奇从淮北到达苏北海安与陈毅首次会晤。11月17日，华中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任命叶挺、陈毅为正副总指挥，刘少奇（当时化名为胡服）为政委。11月23日，“华中总指挥部”机关迁到盐城，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同时抵达盐城。

苏北当时处于敌顽我三角斗争异常复杂的局面，特别是国民党顽固派与我方磨擦非常尖锐。黄桥决战后，韩德勤率残部退集兴化、曹甸一线，依据水网，构筑据点，与我抗衡；在皖西的桂系国民党军莫德宏部亦向我皖东推进，声言增援苏北；国民党东北军霍守义部则以“武装调停磨擦”为由，从山东南下援韩。韩德勤借口“要恢复黄桥决战以前的状态”，会同霍守义部攻占了阜宁西南凤谷村、盖林、东沟等地，并有继续扩张之势。

为了打退反共顽固派的挑衅性进攻，巩固已开辟的根据地，沟通苏北与淮南的联系，并解决韩德勤的威胁，根据党中央指示，刘少奇和陈毅作出部署，于11月29日发动了曹甸战役。战斗中，少奇亲临盐城西南的大冈前线和陈毅协同指挥。经过18天激战，歼灭顽敌8000余人，粉碎了反共顽固派的阴谋，保卫和扩大了盐阜抗日根据地。

曹甸战役以后，苏北局势基本稳定。刘少奇便着手领导苏北以至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对敌斗争，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日夜操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主持成立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建立党在华中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核心

早在1940年11月，党中央根据华中敌后形势的变化，即已决定将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以加强党对华中各项工作的指导。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及时付诸实施。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这一反共罪行，刘少奇在党中央的统一战略部署下，和陈毅一起在华中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反击国民党反共进攻的方针。1941年1月18日，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后工作布置意见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立即在苏北盐城成立新四军新的军部，提议任命陈毅为代军长。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1月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成立。刘少奇、陈毅等发表了就职通电，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经过整训，很快就完成了华中战略新布局，新四军终于在大江南北站稳了脚跟，华中敌后的战略态势也对我更有利了。

1941年4月27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于苏北盐城召开会议。刘少奇传达了中央关于华中局管辖范围、委员名单以及委员分工等决定。5月20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等任命及成立华中局的通知》，任命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至此，华中局在盐城正式成立，其管辖的区党委有：苏中、淮海、盐阜、皖东北、皖东（津浦路东）、皖西（津浦路西）、豫皖苏、鄂豫边、江南等。华中局的建立，加强了对华中各级党委的领导，统一了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的步调，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华中局成立后，刘少奇指出：“六中全会提出的发展华中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就是巩固华中的问题。发展

、巩固谁，我们要做的就是巩固工作。”^①为此，刘少奇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了解了各区党委的组织情况，在敌、顽、我三角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确立了华中战略方针。

与华中局成立的同时，党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任命刘少奇为军分会书记，委员为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军分会在盐城成立后，有力地加强了华中的军事领导。

为了从皖南事变中总结教训，以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在盐城先后主持召开了华中局高干会和军分会扩大会。1941年5月15日召开华中局高干会议，刘少奇作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的报告，就皖南事变的内外原因、经过及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的总结，并深刻地分析了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产生的原因。这次会议使华中高级干部提高了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从而使华中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同年6月8日，华中军分会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也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建设正规化“党军”的任务，具体阐述了党在部队的领导、干部工作、政治工作等新四军建设的7项工作。会后，新四军立即开展了建设正规化党军的运动，健全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整顿军纪，使华中新四军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从而奠定了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① 刘少奇：《在华中局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5月6日。

二、领导抗日根据地的群众运动

刘少奇非常关注根据地的群众工作。他认为，巩固华中中的“一个基础环节”是发动群众，“群众与党和军队的密切联系是根据地巩固的保证。”他还指出：“群众工作为目前中心一环，必须加紧来作。”^①194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四次会议上强调，所谓群众工作，就是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和保护群众利益的工作。这是三个经常性的任务，必须做好。

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刘少奇还在盐城召开了盐阜区各县县委书记座谈会，了解民运工作。在听取汇报后，刘少奇指示他们“做群众工作要放开手脚”，并要求各县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学习抗战的政策和策略，学习如何做群众工作。然后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广泛地发动群众与不法地主和高利贷者作斗争。当盐城县农民救国会成立时，刘少奇还亲自到会致词，并为农教会出版的通俗化读物《老百姓报》题词：“老百姓报要为老百姓讲话”，明确了该报的办报方针，使该报深受群众欢迎。

群众运动起来以后，一些地主、士绅对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抱着抵触的态度。为此，刘少奇在1941年6月召开的盐城县第二届参议会上着重阐述了减租减息运动的意

^① 刘少奇：《给黄克诚等的信》，1941年5月3日。

义，号召地主、士绅“把眼光放远点”，从“抗战的必要，社会进步的必要，工农待遇提高的合理”方面，理解减租减息的必要性，“自动起来拥护这些法令，自动向工农作合理的让步。”同时要求工农在抗战时期，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对于自己的经济要求，“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无限制的过分要求也是不好的^①。”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盐阜区减租减息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且逐年发展，几万家佃户少缴租粮 390.1 万余斤。通过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佃户和雇工在经济上得到利益，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 and 抗日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

为了进一步提高工农的阶级觉悟，刘少奇提出普遍向工农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并亲自抓这项工作，找工人、农民谈话，为他们写教育提纲，通过这次教育运动，使工农从理论与实际上搞清了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农民养活地主，从而提高了工农的阶级觉悟。

在盐城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后，刘少奇及时总结盐城农救工作的特点，写了《盐城农救工作的经验》一文，并把它介绍到苏中及华中各地区，对整个华中群众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党还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起新军旅行团，即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皖南事变后，遵照党的指示，新旅转移到盐城新四军军部旁边，刘少奇十分重视这支革命队伍，对新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关心得很具体，他要求

^① 刘少奇：《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1941年6月3日。

新旅的同志到盐阜区后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他和陈毅还决定把华中鲁艺分院少年队调属新旅，建立了新旅苏北分团，扩大了新旅的队伍。在少奇和陈毅的关怀下，新旅发展很快，成为深受各部队欢迎的随军宣传队，成为根据地的一支活跃的革命力量。

三、指导抗日根据地文化 教育事业的建設

为了加强对根据地文教事业的领导，1941年6月11日，华中局召开了会议，专门讨论宣传、文化教育工作问题。刘少奇在会上阐述了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政策，强调加强宣传、新闻、出版、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他多次指出，学校教育应大力发展，但这还不够，还要广泛地进行社会教育。之后，刘少奇在盐城直接指导了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各項建设。

1、提议创办《江淮日报》。在刘少奇的提议下，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于1940年12月2日创刊，刘少奇兼任报社社长，王瀚西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社址设在当时的盐城女中。“江淮日报”四个字，为少奇亲笔所题。报社成立那天，刘少奇作具体指示，要求报纸要办得有生气，多登群众爱看的新闻报道，要注意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他还为《江淮日报》撰写社论和文章，修改重要稿件。在他的关怀下，《江淮日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舞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士气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成

为华中党组织的喉舌。

2、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吸引了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到来，当时从苏中、上海等地陆续来到盐城的有钱杏邦（阿英）、范长江、邹韬奋、孙冶方、薛暮桥、贺绿汀、何士德、章枚、许幸之等，盐城一时名人齐集，盛况空前。为了发展根据地的文化事业，刘少奇在盐城找孟波等同志商量成立鲁艺华中分院，并在他亲自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筹委会，正式宣布筹办鲁艺分院之事。之后，筹委会又开过两次会，由于刘少奇工作繁忙，会议改由他的秘书刘彬和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彭康主持。1941年初，鲁艺华中分院在盐城正式成立。刘少奇任院长，邱东平任教导主任，下设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系。当时鲁艺缺少干部，刘少奇决定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所属的抗敌剧团合并到鲁艺华中分院，这样，有力地充实了鲁艺华中分院。鲁艺华中分院还出了油印院刊，第一期上有少奇以胡服化名为鲁艺写的题词手迹。不久，又成立了苏北歌咏协会和苏北戏剧协会。在此基础上，1941年4月16日，苏北文化协会在盐城成立，并在鲁艺华中分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的作家、艺术家、诗人、记者及机关团体、部队代表共约300人，刘少奇到会作了《苏北文化协会的任务》的报告。苏北文协的成立，对于苏北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对于团结人民，打击敌人，巩固根据地都起了一定作用。

3、开办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随着大后方很多进

步青年陆续来到盐城，刘少奇和陈毅等决定在盐城开办抗大五分校。校址设在盐城文庙附近（现在盐城中学正北楼），陈毅兼任校长，赖传珠、冯定、洪学智任副校长，分校共有 2000 多学生，分成六个大队，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时事政策、民运工作等。刘少奇经常到抗大五分校作形势报告和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在抗大五分校学员毕业证书上，刘少奇亲自题词：“为正义、为自由、为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而战斗到底。”抗大五分校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培养了不少军事干部，向人民军队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

4、创办中共华中局党校。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刘少奇把很大的精力用在党的建设上。1941 年春，经他提议在盐城创办了华中局党校，确定了办学方针，亲自兼任校长（后由饶漱石继任），彭康任副校长，温仰青任教育长，教员有骆耕漠、陈一诚、孙冶方、钱俊瑞、吕振羽、江明等知名学者，校址设在当时盐城西门河南仓库。党校主要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三门课，第一学期学员共 200 多人。开学那天，刘少奇到校讲了话，提出党校是马列主义的学校，要重视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党员的党性教育。华中各师、团的部队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大多数都到党校轮训过。刘少奇多次到党校讲课，还写下了很多重要文章、文件、书信、电报，如《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人的阶级性》、《论党内斗争》、《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

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等。这些论著是我们党的丰富斗争经验的总结，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刘少奇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敌、我、友的关系，团结了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取得了巨大成绩。他和陈毅在盐城经常亲自登门拜访开明士绅，了解他们的情绪，说明抗日民主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同他们共商抗日大计，这就充分调动了盐城上层人士的抗日积极性，密切了盐阜区党和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如著名教育家宋泽夫和绅耆计雨亭、唐碧澄等人都是在刘少奇的直接帮助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

1941年1月1日，盐城县第一届参议会在盐城商会大楼召开。这是盐阜区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组织。刘少奇和陈毅出席会议，并讲话说明我党的主张及目前形势，并号召一切抗日党派、阶级、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以后，在盐城县第二届参议会上，刘少奇又作了《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的著名报告，深刻阐明了我党的基本政策，指出了国共两党的争执所在，明确宣布我们在敌后干两件事：一件干抗日，一件干民主。这篇演说驳斥了顽固派对我们的攻击，也消除了中上层人士对我党的怀疑，团结了各抗日阶层参加根据地的各项建

设。

当时我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开赴皖南与顾祝同部队作战，为死难烈士报仇。刘少奇和陈毅从抗日大局计，立即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劝大家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要团结御侮，顾全民族利益大局，万勿以感情代替政策，要求大家必须听从党中央指挥，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中旬，刘少奇在新四军全体干部会议上做报告，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并指出：我们进行反磨擦自卫斗争，并不等于取消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只反对那些进攻我们的反共顽固派及亲日派，而同一切愿意继续抗战，不反共的人继续合作，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中国的抗战胜利。与此同时，他致电党中央，提出处理皖南事变，应“以在全国主要的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①。”他在另一封电报中指出：“我之政策仍坚持统一战线方针。”^②

针对有的同志认为反共高潮一来，国共关系就会破裂，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可以抛弃的情况，刘少奇作了《统一战线》的报告。严肃地批评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右的和“左”的思想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及时纠正这些

^① 刘少奇：《关于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问题向毛泽东等的建议》，1941年1月15日。

^② 刘少奇：《关于收容皖南事变失散人员建立游击根据地等问题致罗炳辉》，1941年1月18日。

错误。他和陈毅一道，灵活地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指示。在反韩德勤的反共磨擦斗争中，他们做到硬可硬到不破坏统一战线，软又不软到丧失阶级立场，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经过黄桥决战，新四军消灭了韩德勤的两个主力师，韩德勤败退兴化，在苏北苟安一隅。日寇对他采取政治诱降的办法，但韩德勤并未公开投降，少奇和陈毅千方百计争取韩德勤同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日。尽管韩德勤不坐下来同我们谈判，协商制订一致的行动纲领，或者共同划分作战区域。但在黄桥决战后，韩德勤承认新四军在苏北抗日的合法地位，在粉碎日伪的“扫荡”作战中，新四军、八路军和韩德勤部队还是有配合、有支持的，形成了苏北和平抗战的局面，盐阜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刘少奇和陈毅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使这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在苏北盐城领导中原局和后来的华中局工作期间，呕心沥血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他为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

陈 立 明

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进行的革命战争，也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一次旨在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封建军阀的战争。战争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及其各自所属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江西战场是除“两湖”战场外的又一个主要战场。北伐军在江西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粉碎了他夺取“两湖”、进窥“两广”的企图，进而为北伐军进军浙江、安徽、福建、江苏创造了条件。

一、孙传芳的野心和兵力

在北洋军阀中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虽然属于直系，但不是曹锟、吴佩孚的嫡系，而是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军阀。他比起吴佩孚、张作霖等资历要浅，是个急速发展起来的“暴发户”。1922年他不过是个师长。翌年1月他奉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之命率领所部自湖北经江西进入福建。驱

逐福建督军皖系军阀李厚基、王永泉等人，才占有闽省地盘并于同年3月就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9月，江浙战争期间，他又带兵入浙，驱逐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就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拥有闽浙两省地盘。1925年10月，他再次发动奉浙战争，联合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的军阀，驱逐奉系军阀委任的江苏军务督理杨宇霆、安徽军务督理姜登选，并且大败奉军邢士廉部于上海和鲁军张宗昌部于徐州，驱逐了奉系军阀在长江下游的势力，开始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到苏、浙、闽、皖、赣五省，并且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这样，他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就在北洋军阀派系倾轧中壮大起来，由一名普通师长一跃成为雄踞东南半壁的大军阀。

北伐战争开始时，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进军湖南和湖北，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并未进攻孙传芳。这时，孙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伪装不愿介入南北之争。1926年7月间，北伐军中的叶挺独立团首先进入湖南，连败吴军于安仁淅田和醴陵，吴佩孚急如星火地请孙出兵援湘。孙回电说：“目前赣闽吃紧，对湘事不能统筹兼顾，只能为相当之援助，仍请我帅自行主持”。^①8月中旬，他的联军驻沪办事处处长宋雪琴还对“东南社”记者说：“孙总司令仍抱维护五省之宗旨，五省以外之事暂不过问，目前决无派兵援湘之意。”^②同时，孙在

^① 见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史话》下册。

^② 《东南之军事行动》，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24日。

答复上海《字林报》的电文中也说：“余素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今因湖南扰乱，恐牵动赣境，破坏和局，不得不增兵防守，倘人不攻我，我决不攻人。此系余既定政策，断不改易。”^①

孙传芳打起“保境安民”的旗子，自有他的如意算盘。其意图是先让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与吴佩孚的军队决战，使之“两败俱伤”，然后坐收渔利。他曾说：“广东党军（指北伐军）本象一团绳索，刀子不能砍断，但当拉成一道长线时，用剪刀就能剪断它。”^②北伐军进到湖南时，他认为这团绳索还未展开，只有等到进入湖北，在武长铁路拉成一道长线时，用剪刀剪长线的机会才已经到来。同时，孙对广东国民政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切齿痛恨。北伐军人赣作战前夕，蒋介石曾致电给他，希望他能参加北伐，共同讨吴。他在回电中公开咒骂广东国民政府外受“赤俄帝国所接济”，内受“过激派所包围”，并要蒋介石“军中府中，尽去外人；贵党贵部，不留过激”。^③在孙传芳看来，绝不是参加北伐合作讨吴的问题，而是要消灭北伐军，抢占两湖和两广的地盘，把他的势力伸展到东南大半个中国。

1926年8月下旬，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连吃败仗之后，又一次向孙传芳连电求援，希望这位“馨远

① 《东南之军事行动》，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24日。

② 见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史话》下册。

③ 《孙传芳致蒋介石书》，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8月23日。

老弟”助他一臂之力；孙的部下也跃跃欲试，认为从江西出兵湘东抄袭北伐军的后路，可以举手之劳夺取湖南的地盘，孙却笑而不言，他只对少数心腹将领说了真心话：“别忙，湖北也是咱们的。”^①这说明他要乘人之危，趁火打劫。

当然，孙对出兵湘鄂也有后顾之忧，奉鲁军阀对于失去长江下游的地盘并不甘心，孙对此深怀戒备，害怕奉鲁军阀乘虚抄袭后路，以报战败之仇。直到北伐军在湖北战场上取得了决定胜利，北洋军阀各派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才能自保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矛盾才缓和下来。这时，张作霖主动采取和解态度，一面请孙的老上司、原湖北督军王占元到南京，对孙晓以利害关系，一面自孚致电给孙，说“玉帅新挫（吴佩孚，字子玉，故称玉帅），武汉已失。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付东流。倘有所需，敢不弼勉。”^②同时，鲁军张宗昌也有电报表示，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决不暗箭伤人。双方还订立了“苏鲁和平协定”，规定孙军在徐州、鲁军在兖州的驻军都不超过一旅。如有必要，鲁军只假道徐州，开赴陇海路援助吴佩孚。通过这些往来，孙对奉鲁军阀的顾虑才得以消除。

上述事实说明，孙打起“保境安民”的旗号，只不过是一种掩盖个人野心的伪装手法。但是，这在客观上大大有

① 见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史话》下册。

② 同上。

利于北伐军，使北伐军能够集中力量对敌人各个击破。北伐军正在利用孙传芳“保境安民”的幌子，一方面在两湖战场上与吴佩孚集中力量决战，一方面派出和谈代表与孙传芳周旋，从而争取到孙传芳的短暂中立，造成了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有利时机。

江西是孙传芳统治下五省地盘的大门，北伐战争发动时，孙传芳在江西的兵力如何？

当时，统治江西的是五省联军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邓原是赣北镇守使和中央第一师师长。1926年3月，在吴佩孚、孙传芳的支持下，驱逐了北洋军阀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就任江西总司令，依附于孙传芳。在北伐战争前夕，邓所辖兵力合计30000余人，其中邓兼任师长的中央第一师7000人，驻南昌、九江；江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兼赣西镇守使唐福山部5000人，驻萍乡、宜春；江西军务督办兼江西陆军第二师师长蒋镇臣部5000人，驻吉安、万安；中央第六师师长兼赣粤边防督办杨如轩部2000余人，驻信丰、“三南”（龙南、定南、全南）一带；滇军第一师师长兼赣南镇守使杨池生部2000余人，驻赣州、大余；江西陆军第四师师长赖世璜部4000人，驻瑞金、会昌、寻乌；中央第九混成旅张凤岐部3000人，先驻南昌，后调宜春；江西第一混成旅旅长兼赣东镇守使刘宝题部2000人，驻抚州；粤军第一师刘志陆所辖谢文炳和陈修爵两部，共约3000余人，先驻宁冈、莲花，后驻万载。

孙传芳在江西虽有以上兵力，但派系复杂，又多系杂

牌部队。他们表面上受邓如琢指挥，但对邓离心离德，不愿受邓的调遣。赣军赖世璜部实际上早与广东国民政府建立了联系，把邓如琢下达的作战计划密报北伐军总司令部，使北伐军及时得知江西敌军的作战部署。杨如轩、杨池生两部都是滇军张开儒的旧部，1922年6月曾投奔孙中山，参加驱逐陈炯明的战斗。后来，因有暗联陈炯明的嫌疑，被逐离粤，避居赣南，被江西军务督理蔡成勋收编。北伐战争前夕，“两杨”也采取了“脚踩两边船”的态度。1926年3月，当陈炯明的残部流窜粤赣边时，“两杨”曾将其缴械，并致电广东国民政府，说：“此辈现已肃清，从兹赣粤两边。获免扰害，堪以告慰。”将镇臣、唐福山、张凤岐三部都是前江西督办方本仁的旧部。方被邓如琢驱逐后投奔了北伐军。北伐战争开始时，广东国民政府委方为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叫他随军进入江西动员旧部倒戈北伐。因而这些部队军心动摇，缺乏斗志。谢文炳、陈修爵两部则是陈炯明的旧部，流窜江西后，人枪长期得不到补充，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至于刘宝题部更是人枪两缺，只能看守赣东，缺乏冲锋陷阵之力。

因此，依靠江西原有部队，孙传芳不但不能实现他夺取两湖的计划，而且就连江西也难于守住，进而苏浙皖等省也将不保。

面对江西原有北军实力和认识到江西战场的重要性之后，孙在1926年8、9月间，调动他的五省联军部队源源不断地从苏、浙、皖等省来到江西和鄂豫边界。8月中下旬，苏军第四师谢鸿勋部到达武宁、修水；第七混成旅杨

震东部到达铜鼓；第六混成旅彭德铨部、第八混成旅颜景崇部开到南浔铁路沿线。9月上旬，浙江总司令兼中央第二师卢香亭部、浙军第三师周凤岐部、第五混成旅杨赓和部都开到赣北；安徽总司令陈调元和所属王普、刘凤图、毕化东等部也从安徽到达武穴、富池口一线；苏军第十师郑俊彦部和其他部队在奉命开拔江西途中。

在这些部队陆续来到江西后被统一编组为五个方面军，孙传芳以邓如琢、郑俊彦、卢香亭、周荫人、陈调元分任方面军总司令。其中第一方面军，以原江西部队组成，各部集中赣西、赣中、赣南、赣东一带，司令部驻樟树；第二方面军以苏军组成，各部集中南浔铁路南段沿线；第三方面军以苏、浙两省军队组成，各部集中南浔路北段和赣北各县；第四方面军以福建部队组成，各部集中闽南，相机进攻广东潮、梅；第五方面军以皖军组成，各部集中赣鄂边境。这五个方面军有三个集中在江西，一个集中在赣鄂边，随时可以入赣作战。从这个部署可以看出，孙传芳十分重视江西战场的得失，投入了十万以上的兵力入赣作战。

但是；这五个方面军，只有二、三方面军是孙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颇强。其余各部大都战斗力低下，且对孙首鼠两端。因此，孙传芳虽然在江西及其边境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表面上看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大多数部队都不是他缓急可恃的力量。

孙传芳五省联军战斗序列如下：

五省联军总司令 孙传芳 参谋总长 刘宗祀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邓如琢

第一军司令 唐福山 (江西陆军第一师)

谢文炳 (粤军第一师)

第二军司令 蒋镇臣 (江西陆军第二师)

陈修爵 (粤军第一师)

第三军司令 岳思寅 (中央第一师)

张凤岐 (中央第九混成旅)

第四军司令 杨如轩 (中央第六师)

杨池生 (滇军第一师)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 郑俊彦

第一军司令 李彦清 (苏军第十师第二十旅)

第二军司令 彭德铨 (第六混成旅)

第三军司令 王良田 (苏军第十师第十九旅)

第四军司令 杨赓和 (第五混成旅)

独立支队司令 梁鸿恩 (第二混成旅)

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卢香亭

第一军司令 刘士林 (浙军第二师)

第二军司令 刘景义 (第二十四混成旅)

第三军司令 谢鸿勋 (苏军第四师)

杨镇东 (第七混成旅)

第四军司令 颜景崇 (第八混成旅)

第四方面军总司令 周荫人

第一军司令 张毅 (闽军暂编第一师)

第二军司令 李凤翔 (闽军第三师)

第三军司令 刘俊 (第二十四旅)

第四军司令 周荫人 (第十二师)
第五方面军总司令 陈调元 副总司令 王普
第一军司令 王普 (第三混成旅)
第二军司令 刘凤图 (第四混成旅)
第三军司令 毕化东 (第六师之一旅)
另有第一混成旅 马祥斌 别动队司令 陈雷
联军总预备队司令 周凤岐 (浙军第三师)
第一军司令 斯烈 (第三师第六旅)
第一支队司令 成光祖 (第一混成旅)

二、北伐军分途入赣作战

北伐战争向湖南方向首先发动，由湖南而湖北，战场逐渐向北开展。当时，对江西暂取守势。

当北伐战争在湖南展开时，北伐军总司令部考虑到江西和福建与广东毗邻，又都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因此，派出两支部队在粤赣湘边和闽粤边防守。其中，担任警戒江西的为第二军第五师谭道源部和第五军第十六师四十六团陆满部，分别驻守广东南雄和湖南汝城，共同监视赣南守敌杨如轩、杨池生部队。

此后，当北伐军和平江、岳阳、汀泗桥和贺胜桥等地歼灭吴佩孚的主力以后，开始腾出兵力开辟江西战场。1926年8月下旬，准备攻赣的北伐军各路部队分途向湘赣边界靠拢。北伐军进攻江西的兵力开始只有四五万人，随后援军陆续入赣，但最多时也不过六七万人。攻赣部队

序列如下：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中正

总参谋次长^① 白崇禧

第一军 代军长 王柏龄

第一师 师长 王柏龄 辖孙元良 倪弼 薛岳 3 团

第二师 师长 刘峙 辖陈继承 蒋鼎文 惠东升 3

团

第二军 副军长 鲁涤平 党代表 李富春

第四师 师长 张辉瓒 辖谢毅伯 周纬黄 邓赫绩 3

团

第五师 师长 谭道源 辖罗寿颐 朱刚伟 彭璋 3 团

第六师 师长 戴岳 辖黄友鹄 廖新甲 刘凤 3 团

另有军直属谢慕韩炮兵团，合计 10 团

第三军 军长 朱培德 党代表 朱克靖

第七师 师长 王均 辖曾万钟 万人敌 彭武扬 3 团

第八师 师长 朱世贵 辖韦杵 祝膏如 李思槩 3 团

第九师 师长 朱培德 (兼) 辖××× 李明扬 2 团

另有军直属张言传炮兵营和×××营合计 8 团 2 营

第六军 军长 程潜 党代表 林伯渠

第十七师 师长 邓彦华 辖傅良弼 文鸿恩 钟韶 3

团

第十八师 师长 胡谦 辖苏世安 宋世科 李明

^① 另一说法是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见《白崇禧回忆录》第 28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5 月出版。

澎2团

第十九师 师长 杨源浚 辖王尹西 张珍 王茂泉 3

团

另有莫希德 罗心源两炮兵营，合计9团2营

第七军 军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第一路军指挥官 夏 威

第二路军指挥官 胡宗铎

第一旅旅长 韦云淞 辖陶钧 吕演新 2团

第二旅旅长 李明瑞 辖俞作豫 李朝芳 2团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 辖陆受祺 杨腾辉 2团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辖尹承纲 周祖晃 2团

另有李少述独立第一营 罗传英炮兵营 马典符工兵营合计12团3营

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 张发奎 辖缪培南 黄琪翔 许志锐 3团

独立第二师师长 贺耀组

独立第一师师长 赖世璜 辖谢杰 马建中 易简 3团

第五军第十六师四十六团 团长 陆 满

北伐战争在江西的战事，是从1926年9月初开始的。9月1日，北伐军总司令部下达总攻击令，各部队从驻地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其中，第二、三两军自湖南醴陵向赣西进攻；第六师和第一军第一师自鄂南、湘东直捣赣北，截断南浔路；防守赣粤湘边的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陆满团则会同独立第一师赖世璜进攻赣南。

（一）进攻赣西

进攻赣西的北伐军为二、三两军。其中第二军部队因军长留广东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故改由副军长鲁涤平指挥。9月2日，二三两军从醴陵出发，向萍乡前进。这时，萍乡守敌唐福山部驻萍乡西面上栗市、湘东、麻市、美田桥、刘公庙一线。9月5日，当北伐军二三两军分路向该敌攻击前进时，唐部不战而退，于5日深夜撤离萍乡退驻宜春，二三两军跟踪追击，6日上午十时占领萍乡县城，7日又占领安源，并进至萍乡县城以东上埠至楼下之线。萍乡占领后，北伐军于9月9日继续向赣西政治中心宜春前进，并于10日晚将其占领。

北伐军攻取萍乡时，各以一部兵力分左右两翼前进。左翼第三军第九师二十六团李明扬部由萍乡桐木经宜春慈化进占万载，接着又于9月14日克复上高；同一时期，右翼第二军第六师十六团和十八团一营，也从萍乡出发，先后占领莲花和永新，敌陈修爵部向安福溃退；第十六团向分宜攻击前进于12日上午占领分宜。

北伐军在攻克分宜后，在新余县西与敌军展开了激战。敌军张凤岐、唐福山和岳思寅三部从分宜溃退后，利用有利地形，在分宜、新余之间的醴泉铺、江口、洋津、仰天岗一带，布置阵地，邓如琢也从樟树赶来前方督战。临行前夸下海口说：“10天内即可将北伐军赶出江西，直抵长沙。”^①从9月12日起，双方激战3昼夜，北伐军奋勇冲锋，阵地得而又失。北伐军牺牲第四师十八团

^① 《邓如琢战败详情》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3日。

团长邓赫绩和下级军官多人。15日，第二军党代表李富春亲率各师党代表和政治干部多人，深入前线作鼓动宣传，士气大振。洋津、江口、仰天口一带的农民也拿起梭标、鸟枪、土炮参加战斗。结果，毙敌团长王生乐以下1000余人，敌主力大部被歼灭。邓如琢率残部向樟树撤退。

新余攻克后，邓如琢的部队成为惊弓之鸟，纷纷撤退。16日清晨，第二军再克清江（当时县城在临江县）。21日，第二军第六师一部又克安福，陈修爵部退往吉水。

总计，二、三两军从9月5日进入赣西后，在赣西各县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在短短的半个月内，连克萍乡、宜春、莲花、永新、分宜、新余、万载、上高、清江、安福等10县。

（二）进攻赣南和赣北

当北伐军在赣西节节胜利之时，赣南的北伐军也展开了攻击。

9月2日，由江西陆军第四师被北伐军改编为独立第一师的赖世璜部队，其主力从于都出发，兵分两路向赣州进攻。4日，左纵队先后在高墩、沙河和小南门与敌接战后，逼进赣州城；右纵队也将茅店之敌驱逐，推进至七里镇。4日晚左纵队进入赣州城，敌军经西门浮桥向沙地、遂川方面逃窜。5日拂晓，右纵队也渡江入城。

赣州位于赣江的上游，自古以来即为粤赣通道。北伐军在赣州的得手既可巩固湘粤的屏障，又给闽南和赣中敌

军以严重威胁。

赣州攻克后，广东国民政府以独立第一师攻克赣南有功，升该师为第十四军，以赖世璜为军长，熊式辉为党代表。该军于赣南一带稍事整顿后即奉上级指示，以必要兵力控制会昌、瑞金一带，警戒闽南之敌，主力则会同二军第五师挥师北上，进攻吉安。

在赣西、赣南北伐战争发动的同时，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也分别由粤南和湘东向赣北前进。

9月5日，第六军从湖北通城越过幕阜山脉向江西修水县移动。中共修水县支部派出党员到路口加以迎接并带领该军第十七师直奔修水大道，第十九师也在当地邮差带领下，由风鼓泉走山间小道进入修水。7日上午8时，第十七师在修水县西马坳与谢鸿勋师第八旅赵国荫部展开激战，第十九师也在杭口和县城南部与敌激战，11日，第六军将赵旅两团击溃，攻克修水，敌军向武宁县撤退。

在第六军进攻修水时，第一军第一师也从湖南浏阳进攻江西铜鼓。铜鼓守敌为苏军第七混成旅杨镇东部，兵力约3000余人。9月12日晚，第一师第二团在曾公庙、丰田等地与敌接战时上庄400余名造纸工人在中共铜鼓县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为北伐军担任运输和救护工作，又组织一支40余人的向导队，带领第三团于13日上午8时迂迴至铜鼓县城东南攻入县城。第一团也同时攻至温汤。当第三团攻入县城时，与第二团激战的敌人才纷纷退却。这次战斗，杨震东旅防守铜鼓的两个团大部被歼灭，仅杨镇东率少数残部向宜丰退却。

修水铜鼓攻克后，第六军主力进入铜鼓县东之大垵，派第十七师、十九两师各一部进入宜丰、奉新边界的早桥、甘坊向宜丰县的谭山、同安会剿杨旅残部。同时命令配属第六军的第一军第一师由铜鼓向奉新进攻。16日清晨第六军兵分两路，十九师自同安向高安攻击，十七师往上富进攻奉新。17日，攻克奉新县城。第一师则于16日由铜鼓出发，17日进至甘坊。这时，第三军第二十六团李明扬部已克上高。敌张凤岐、唐福山等部俱退高安，二十六团也向高安追击，接着会合第十九师进攻高安。18日，高安为北伐军克复，残敌从新建渡过赣江，向丰城溃退。

这样，北伐军在赣北战线，也取得连克修水、铜鼓、奉新、宜丰、高安五县的胜利。

(三) 南昌得而又失

北伐军攻克赣西北各县后，战场逼近南昌外围。这时，进克高安的第六军得知南昌敌军防务十分空虚，于是改变攻克奉新后直取德安的计划，决定兵分两路奇袭南昌：第十九师由高安进攻南昌，十七师和第一师由奉新向南昌攻击。

当时，孙军卢香亭部在南浔铁路涂家埠至九江沿线，邓如琢部在樟树、丰城一带。防守南昌的仅宪兵两连。省署警备队两连只能保卫各督署衙门，地方秩序只有警察维持，南昌城内只有邓如琢的一个骑兵团。合计城内守敌不过600余人，几为空城。

9月19日，十九师先头部队便衣队200余人潜入南

昌，当天晚上，在南昌工人、学生和省长公署警备队的内应下，向邓部骑兵团发动攻击。接着，十九师五十六团王尹西部赶到南昌，在占领牛行车站之后，立即包围南昌城，在惠民门进行爆破，越过城壕，进入市区。北洋军阀委任的省长李定魁、戒严司令刘焕臣、警备处长阎筱亭，均越墙而逃，南昌即为北伐军攻克。

南昌的攻克，对北洋军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诚然孙传芳曾预料南昌可能失守。他曾对人说：“党军（北伐军）如得南昌，战线愈阔，兵力愈难分配。这是自取失败之道。”^①但是，南昌的丢失，对他的作战计划和部队的士气有严重的影响。因此，他一方面电令卢香亭师和刚刚开抵九江的江苏军郑俊彦师迅速由南浔路开抵牛行车站，一方面又严令邓如琢由樟树回师反攻，并“限定18小时内恢复失地，否则牵动全局，军法俱在，本总司令不能曲。”邓在接到命令后，抽调15000人组织反攻。临行前，给官兵打气称如果能夺回南昌，保证满足三条：一、克城后发饷3个月；二、官佐普遍升级；三、士兵大抢3日。

南昌被攻克后，第十七师和第一师仍在奉新向南昌的途中，并未到达南浔铁路的乐化至牛行车站之线，致使敌军能够利用铁路运输之便，向南昌增援。20日晚，第一师先头部队两营到达牛行车站，开始攻击，遇到敌军顽强抵抗。21日午后，第十七师陆续到达，参加作战。22日，第十九师一部也渡江协同作战，缴获敌军枪械数百，

^① 《南昌失而复得》，载《申报》1926年9月24日。

歼敌 200 余名。后来敌军卢香亭、郑俊彦两师向涂家埠、乐化开来，企图抢占牛行车站，截断北伐军的后路，第六军军长程潜即令驻牛行车站的第一师第一团协同第六军一部，开赴乐化附近，堵截敌军前进。但是，由于该团团长孙元良不听指挥，致使乐化战斗失利，敌军不断地向牛行车站靠拢。驻在牛行车站的第一师又因先前排斥共产党员导致战斗力削弱。特别是代军长王柏龄本人，在进入南昌后竟离开部队嫖妓，当敌军骤到时，该师军中无主，被冲得七零八落，仓惶撤退。因此，第六军不得不于 22 日晚和 23 日清晨撤离南昌，分向南昌西南方向的生米和万舍撤退。当十九师和军部在万舍准备渡河时，又遇上由丰城回援南昌的邓如琢后续部队，致使前后受敌包围，经死战破围后于 24 日渡过赣江到达西山万寿宫。这次作战，第六军和第一师损失严重，两部不得不撤到高安、奉新等地休整。

9 月 24 日，邓如琢重返南昌，下令闭城大抢 3 日。商店、民家贵重财物被抢一空，学校被毁，行人绝迹。南昌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留短发的妇女，一经被捕即遭枪杀。据《申报》转载上海《泰晤士报》10 月 11 日南昌通讯说：邓如琢部队从樟树回师时，“沿途抢劫不辍。入城后更四处搜索，商店居民之被抢者，十居其七，昨日（10 日）记者出门，犹见士兵纷纷以包裹邮寄回家。此次店铺共闭 6 日，凡人民之曾欢迎南军者，多被搜杀，尤以学生为多。据警署统计，被杀者不下 2000 人。杀戮之滥，凡人民头发之剪作俄国式者，即为通敌证据，

捕杀无赦。”^①

三、江西战场上的激战

(一) 敌我双方再次调整作战部署

北伐军在江西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北伐军总司令部行营即从湖北向赣西开来。9月19日到达萍乡，25日到分宜，29日到清江。10月1日起，又进驻高安。同一时期，第一军第二师也从湖北经湖南进入江西，到达清江，接替第二军第四师防地。

从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北伐军方面再次部署了作战计划。赣南方面从赣州向赣中吉安前进，赣西方面从安福和清江合攻吉安，与第五师会合；第三军向高安、新建前进；第六军和第一师在奉新、高安休整后，以一部由奉新进攻永修，截断南浔路。同时，按照原定计划，命令第七军从湖北进入赣北。

同一时期，孙传芳亲自到江西，指挥联军作战。9月21日，孙乘坐招商局的江新轮由南京出发，临行时他向送行的江苏省文武大员大吹牛皮说：“我这次督饬所部，恢复赣境，算不了一回事，蒋介石以为自己骁勇无敌，纵横天下，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吴玉帅的部队，号令不一，军队复杂，除刘玉春一旅外，其余都望风而退，这怎么能打仗？现在南军要与我较量高低。我于最短时间内，就可

^① 见1926年10月16日《申报》。

以返回南京。”^①22日，孙到达九江，把他的总司令部设在江新轮上。

孙到九江后，制订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计划，这个计划分为三路：一路由南昌向高安方面追击，一路由修水、武宁向通山进展，一路由武穴渡江进攻阳新。同时，又调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率领八艘军舰，开到赣北长江江面助战。其计划是在江西采取守势而以主力进攻湖北，以便相机截断粤汉路，腰击北伐军，实现他剪长绳的美梦。

按照孙的作战部署，陈调元和王普都到达武穴，与湘军叶开鑫、粤军马济等残部会合，鲁军第一混成旅马登瀛旅也调来鄂南受陈调元指挥。9月26日，海军掩护马旅渡江窜扰黄石港、大冶一线，谢鸿勋师也从修水、武宁之间越过幕阜山脉占领通城，并向通山、崇阳进攻。10月1日，陈调元部占领阳新，前锋到达鄂城。郑俊彦部也在新建和高安边界，对北伐军展开攻击。当时，武昌城正在北伐军第四军的围困之中，孙还用无线电指使守城部队刘玉春部坚守待援。同时，还约请退守河南的吴佩孚由武胜关发动反攻，以箝制北伐军左翼各部队，又勾结川军杨森部及驻鄂西的北军卢金山、于学忠等部由宜昌、沙市顺流而下，分兵进攻武汉和岳阳，企图四面向武汉靠拢，以解武汉之围。

（二）北伐军在北战场的胜利

就在孙传芳忙于调兵遣将向湖北发动一场大战时，北

^① 见1926年9月24日《申报》。

伐军第七军李宗仁部却避开敌军从阳新进入赣北。

第七军为广西部队，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这支部队除留 8 个团驻守后方由黄绍竑指挥外，其余 12 个团由李宗仁率领参加北伐。它的编制不同于其他北伐军采用的苏联军制，而仍沿用民国初年陆军部颁发的编制。在参加北伐的部队中，组成第一、二两路军，每路又辖两旅和若干个团。路的指挥官即等于其他各军的师长。

9 月 26 日，第七军进入瑞昌县的下马吴、八角桥一带。苏军第四师谢鸿勋部一旅之众自瑞昌开来，进驻洋港。当第七军向洋港前进时，敌军又从石里头、范家铺方向转移，准备退走瑞昌。28 日上午，北伐军在石里头与该敌进行了一次前哨接触战，敌向箬溪方向退却，七军追击前进。

箬溪为武宁县东面位于修河北岸的一个小镇，谢鸿勋师约 10000 余人驻守这里。30 日拂晓，七军第二路军胡宗铎部第八旅从正面攻击，敌军顽强抵抗，自清晨至下午 3 时，七军数度冲锋，未能得手，战斗十分激烈。这时，胡部第一旅包抄至敌军右翼，向敌侧后攻击，敌军遂全面崩溃，这次战斗，当场击毙敌旅长庞广荫及一名团长，俘敌参谋长以下官佐 2000 余名。敌军师长谢鸿勋足部受重伤，被俘后因无人认识，被他的卫士偷偷抬着逃走，后因伤重而死。

谢鸿勋师在箬溪被第七军歼灭，为北伐军入赣后对孙军嫡系部队作战的一个大胜利，对五省联军援赣部队的士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箬溪战斗后，中共德安县支部派代表杨丕显、陈太康等前往箬溪迎接北伐军，第七军随即于10月2日乘胜向德安前进。德安位于南浔铁路中段，如被占领，南浔铁路即被截断，驻守南昌、乐化一带压迫国民革命第三军的敌军即失后援。10月3日拂晓第七军抵达德安城郊。德安守敌为苏军第一混成旅陈光祖部、第二十四混成旅李俊义部和浙军卢香亭部段承泽旅，共约3万多人，由卢香亭亲自指挥。北伐军占领箬溪后，德安守敌于城外铁路西侧高地构建坚固工事。另有铁甲车数辆，装载野炮10余尊往来巡逻。企图以逸待劳实行固守。10月3日上午9时，北伐军行距德安约10里时与敌遭遇，随即展开进攻，敌军则依托阵地以密集炮火向北伐军反击，战斗十分激烈。至下午6时，北伐军左翼陈钧团和敌军展开肉搏，才将敌右翼突破，占据南浔路铁桥，敌军全线崩溃，北伐军随之占领德安县城。这次战斗，第七军死伤2000余人，第七旅九团团团长陆受祺阵亡，此为第七军出师北伐以来，战斗最激烈、牺牲最大的一战。敌军也死伤1000余人，无法逃脱被迫坠河淹死的也达数百人。

德安的攻克，给孙传芳的联军部队的士气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引起了江西战场上联军的极大混乱。北伐军在德安拆毁铁路，割断电线，使联军九江至南昌间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中断，联军所需物资不得不改由鄱阳湖转运南昌。与此同时，九江也陷入一片慌乱之中，英国军舰格那脱号开往九江，“保护”英租界外侨。这就完全打乱了孙传芳的作战部署，使孙不得不停止进攻武昌、切断粤汉铁路

的计划，从乐化、涂家埠和九江抽调卢香亭、颜景崇两部增援德安，又急速命令进入阳新、大冶的陈调元部进入瑞昌，以侧击北伐军后路。第七军因为后援部队不继，成为孤军作战，有陷于敌军重围的危险，遂于10月5日主动退出德安向武宁撤退，孙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颜景崇部重占德安，被提升为第六方面军总司令。

北伐军主动退出德安，目的是为了歼灭从瑞昌来犯之敌，并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但是，《联军日报》却于10月23日大吹大擂，称：“孙联帅对战事，极抱乐观，因所部于高安、德安二战中，显出优越能力，此后无论敌已残败，纵有援兵，亦足应付。”同日该报又说：“孙联帅对于和议，非党军全数退出赣境，不允开议。”

北伐军撤出德安后，于10月6日退回箬溪。这时，联军陈调元部所属第二军刘凤图部、第三军毕化东部和鲁军马登瀛部均已渡过长江，进驻瑞昌。11日，刘凤图、毕化东各率三团之众和骑兵一团深入到瑞昌县西南方向的王家铺，企图围攻箬溪。第七军于12月清晨赶至迎战。敌军据守梅山、昆仑山、复盆山和双溪之线顽抗。至午后5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这时，第一军第一师派兵两团由谢家埠开到德安、瑞昌边界的白水街向昆仑山之敌猛攻，至晚7时才将该敌击溃，歼敌向瑞昌逃去。10月18日，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奉命入赣作战，由平江经修水、武宁到达王家铺接防，第七军各部开回箬溪补充休整。

（三）北伐军在南战场的胜利

在第七军进入赣北与孙军激战的同时，南战场的北伐

军也在赣中和赣江中下游各县取得了重大胜利。

当时，五省联军部队在赣中各县的配置是：驻吉安的为蒋镇臣部；驻遂川的为赣南败退下来的“两杨”部；驻吉水阜田一带的为安福败退的陈修爵部。

北伐军采取南北夹击、东西围攻的策略，分四路向吉安靠拢。9月22日，攻占赣州的北伐军分两路出发。第五师和四十六团组成左路，进攻遂川、万安、泰和，迫敌“两杨”部队渡过赣江，向永丰溃退。23日，又从泰和出发，直取吉安南门；十四军组成右路，经兴国向吉安东西开进；与此同时，在清江的第二军第四师也向新淦、峡江开进；在安福的第二军第六师第十六团也经固陂，向吉安攻击前进，敌陈修爵部从阜田退峡江，渡过赣江，向新淦、樟树退却。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蒋镇臣被迫不战而渡过赣江，向吉水溃逃。24日午后三时，第五师先头部队首先进入吉安，其余各团和第六师十六团也于25日陆续开进吉安城。

北伐军攻克吉安是与当地党组织工农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早在北伐军到达吉安之前，中共吉安特别支部即已组织群众支援北伐。8月间，吉安党利用各中学放假的机会，组织各校教员分头发动群众，破坏北洋军阀的通讯联络，只一夜的时间就砍断了塘东、罗子山一带的电杆，使敌军的联络中断。又在北伐临近吉安的前夕，将市内的电灯熄灭，使敌军惊恐万分。党还派梁一清、胡庭等同志组织情报站，派遣可靠的同志乔装农民，任军阀抓决，以窥探敌军虚实，同时派人作为北伐军担任向导，又在城内秘密

张贴标语，造成革命声势，党还组织第七师范学生乘黑夜渡过禾水迎接北伐军。在这种情况下，蒋镇臣感到四面楚歌，惶恐万状，不得不弃城逃走。

9月26日，北伐军占领吉水。29日，第十四军再向永丰攻击前进，并于当天中午占领永丰。然后在吉水、永丰两地作短暂休整后，于10月9日再克乐安，11月，又克崇仁和宜黄。

与此同时，留守瑞金的十四军谢杰师，也抽调该师陈团和炮兵及机枪连编成特进支队于9月29日经宁都向北开进，于10月2日占领广昌，3日占领南丰，12日续克南城。

至此，赣南、赣中两地的守敌都被赶至抚州及其附近各县。南城、崇仁一线以南广大地区均被北伐军攻克。

此时，第二军第四师也沿赣江西岸向新淦、峡江前进。第五、六两师攻克吉安后也向峡江推进。在峡江与第四师会合。第二军三个师随即于29日，在峡江县城和仁和一带渡过赣江，向新淦前进。10月1日，第一军第二师也在新淦和峡江之间渡江，协同第二军作战。这时，当地群众向北伐军报告敌情说：驻守新淦至樟树的敌军为赣西各县败退的唐福山、张凤岐、邓如琢、谢文炳、陈修爵等部。唐部驻新淦县城和溧江、永泰一带；张部驻孔埠、誉家州一带；邓部驻樟树至丰城拖船埠一带；陈、谢两部均驻樟树附近。

当北伐军向新淦开进时，唐部于1日晚向永泰溃退，第二军于2日占领新淦。4日再向永泰进攻，敌军稍作抵

抗即向北逃跑，驻守樟树的陈、谢两部也分向丰城和抚州溃逃。5日清晨，第二军开进樟树镇。6日傍晚，又占领丰城，邓、唐两部和丰城守敌张凤岐部退守南昌县的市汊，谢、陈两部退守临川的李渡和南昌县的三江口，至此，赣江中下游各县也为北伐军占领。

当北伐军渡过赣江攻占新淦时，邓如琢因所担负的赣南、赣中、赣西防区纷纷失守。因此，于10月4日发出通电，引咎辞职。孙传芳改派郑俊彦继任江西总司令，改派岳思寅继任中央第一师师长。但是这样的战场换马已无法挽救五省联军的失败。

(四) 第二次围攻南昌城

当北伐军攻克樟树、丰城的时候，邓如琢各部纷纷向南昌、抚州方向溃逃，战场又一次向南昌靠拢，于是北伐军开始了第二次对南昌的强攻战。

战斗先在南昌外围新建西山的万寿宫进行。在攻克清江以后，与第二军渡河攻占新淦、峡江一带的同时，第三军向北开进至高安和新建边界。9月27日，第三军进到新建县石岗和高安县高邮市一带时，孙传芳派郑俊彦部两旅和第五（旅长杨赓和）、第六（旅长彭德铨）两混成旅开向西山万寿宫之线，阻击北伐军第三军。从30日起，第三军一连3天在万寿宫与敌展开激战，并于10月2日占领了万寿宫，俘敌高级官佐百余人，士兵5百余人，毙敌军2千以上，溃敌向北撤退。北伐军乘胜向南昌方向追击。

接着，已攻克樟树、丰城的第二军和第一军第二师也

向北推进。于10月8日，攻克南昌县南境的市汊和万舍两地，岳思寅、唐福山、张凤岐三部都向南昌城内溃退。9日，郑俊彦升张凤岐为江西陆军第四师师长和守城总指挥，岳、张、唐三人联衔张贴布告，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暂作武昌城第二。与此同时，郑俊彦部也在牛行车站、蛟桥、乐化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与北伐军决战。

北伐军于10月9日向南昌城附近攻击前进。当天，第二师和第二军从莲塘向南昌靠拢，将南昌城四面包围。其中，第二师攻击德胜、章江二门；第五师攻击永和、顺化二门；第六师攻击进贤、惠民、广润三门；第四师为预备队，驻守南昌、丰城、临川三县边界的三江口一带，并警戒抚州之敌。第二军由进贤、顺化等门开始攻城，守城北军登城还击，双方用步枪、机枪和大炮轰击。第三军各师也向南昌西北攻击前进，一部于9日攻占蛟桥，一部于10日攻占长棱，进至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附近。10日，攻城的枪炮声从早到晚响声不绝。晚上，敌军敢死队300余人乘夜出德胜门，绕道至铜元局，包围北伐军第二师第六团。黑夜混战，秩序大乱，第六团受到很大的损失。11日，攻城全面展开，北伐军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敢死队，于11日晚架设云梯几度爬城均未成功。章江、广润、惠民三门，因为商店民房紧密，不利于攻城，但北伐军埋伏于房内，经常伺机射击守城敌军，使敌军伤亡很大。当天，第三军在乐化、蛟桥和牛行东站一带遇上由涂家埠开来敌援军四五千。双方展开激战，敌后续部队又利用铁路运输的便利条件源源开到。北伐军奋力攻击，苦

战两昼夜，双方伤亡很大。12日，为了使北伐军在城外无处隐蔽和切断群众的支援，岳思寅、唐福山和张凤岐等人，赏洋两万元，命令张部工兵营400余人，用水龙头喷射煤油等然后放火将惠民、章江、广润、德胜门外的商店民房尽行烧毁，大火延烧至13日仍未熄灭，就连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也未能幸免。与此同时，敌军又一次在城内进行极端野蛮的屠杀和抢劫，男女老幼被枪杀和烧死的尸横遍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为惨重的损失。

就在北伐军围攻南昌的时候，居住在德胜门外环丘街的各国侨民代表美国人长孙维廉和英国人葛阴、安澜等，到北伐军第二军军部，声称愿意负调和之责，请北伐军停止攻城并撤兵20里，北伐军表示同意，提出守敌不得任意烧杀抢劫和应缴械投降两项条件。14日，北伐军如约停止攻城，并将军队撤离南昌20里，长孙维廉等返回城内到南昌总商会，约请各界代表见张、岳、唐等人。这三个军阀对双方停战表示赞成，但对于缴械投降，“绝对不肯容纳”，对于不烧杀抢劫问题即趁机向总商会勒索军米2000担。总商会代表等请求他们约束士兵归队，军米可以解决。事实上，守城敌军已无子弹，急切希望停战，北伐军也因为南昌城垣非常坚实，敌又外有援兵，使北伐军屯兵于坚壁之下，背水作战，伤亡很大，十分不利。故决定暂时撤围。

10月14日，北伐军各路部队分别离开南昌，第二师由南昌县渡过赣江转到奉新休整，第二军各师撤到丰城和南昌边界一带，以监视南昌和赣东之敌。第三军也在南浔

铁路沿线与敌脱离接触，后退休整。15日，郑俊彦派兵两团开进南昌，增援防务。17日，郑本人进入城内，并宣布就任联军江西总司令之职。

四、北伐军歼敌主力攻克全省

(一) 肃清江西的计划和战场外的事变

南昌撤围后，江西战场上有一段短暂的休战，敌我双方都利用这一时机，作下一步攻守的部署。

在这期间，北伐军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制定出新的肃清江西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规定集中主要力量在南浔铁路沿线与联军决战，消灭孙传芳主力于赣北。为此，重新确定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指挥系统，将攻赣各部组成左翼军（指挥官李宗仁）、右翼军（指挥官朱培德）、中央军（指挥官程潜）、总预备队（指挥官刘峙）等几部。右翼军中又分左纵队（指挥官朱培德兼）和右纵队（指挥官鲁涤平）。各军担负的具体目标为：左翼军攻占德安、九江和永修；中央军攻占乐化，然后与左翼军会攻永修涂家埠之敌。右翼军左纵队攻蛟桥和牛行车站，右纵队先围攻抚州，再围攻南昌。总预备队驻守奉新、安义，随作战进程参加作战。

为完成上述计划，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加强左翼军力量。从湖北抽调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从湖南抽调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进入赣北，受李宗仁指挥。10月18日，贺师由平江经修水到达王家铺，28日，张师也从大

洽到达。

与此同时，又决定右翼军先攻抚州，横扫南昌东南外国之敌。为此，在赣北各军作短暂休整期间，右纵队先向抚州合围。10月16日，第十四军分别从南城、崇仁向抚州靠拢。17日，第二军四、五两师也从丰城、南昌边界向抚州开进。这时，抚州革命青年章应昌、许瑞芳等人主动与北伐军取得联系，配合北伐军向沿途群众开展宣传、动员群众烧茶送水，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并且约集郊区同学爬进城内张贴标语，使敌军军心涣散，惶惶不可终日。逃往抚州的蒋镇臣、杨池生、杨如轩、陈修爵、谢文炳等部纷纷向进贤和东乡溃退。抚州守敌刘宝题在抚州至南城的东馆和抚州去崇仁的秋溪两地布防，企图阻止第十四军前进。18日，双方在上述两地接战后，敌退回抚州。同一天，第二军第四师也在抚州西面与敌发生接触。这时，退往进贤的蒋、陈、谢等部进到云山，企图增援抚州，被第四师压迫后退20余里。20日，十四军猛攻抚州，激战数小时未能攻克，并阵亡师长易简等官兵多人，这时近郊学生和农民抬来楼梯百余乘，帮助北伐军登城，在群众的配合下，北伐军于当日傍晚将抚州攻克。毙敌数百，俘团长1人，刘宝题部向东乡败逃。23日，第四师也攻克进贤。25日，第十四军又克东乡。此后，余江、贵溪相继克复，陈、谢两部向铅山溃退。两杨部队在赣东北为北伐军收编，蒋镇臣部向南昌溃逃。第十四军即驻抚州待命，第二军四、五两师仍回师向南昌靠拢。这样，北伐军在集中力量消灭南浔铁路敌军主力以前，就扫除了南

昌东南外围之敌。

当北伐军进行肃清江西的准备时，敌军也在计划新的作战部署。孙传芳在南昌之围解除后，仍然准备对江西战场采取守势，按照原定计划向鄂东南进攻，企图避开北伐军主力，一鼓而下武汉，再鼓而克长（沙）岳（阳），把北伐军从湘鄂赣三省全部驱逐出去。这个军事突破的计划在于会合鄂西北军与川军联合进攻武汉。10月下旬，驻鄂西的北军卢金山、于学忠等部进退了进攻荆沙的属北伐军系统的黔军王天培、彭汉章等部，占领公安、石首，杨森部川军由监利向新堤（今洪湖县）前进，鄂北张联升的军队也由襄樊长驱而南。在这种形势下，孙传芳除调第二十四混成旅李俊义部开入鄂东外，同时命令陈调元配合湘军叶开鑫向黄梅、广济、田家镇、蕲水、兰溪一带进攻，只等鄂西川军北军再进一步，便可以联合起来，对武汉三镇发动大规模的钳形攻势。

但是，正当孙传芳企图进犯鄂东、北伐军准备肃清江西的时候，江西战场外接连发生了几次重大事变，使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士气受到严重影响，北伐军的士气受到很大鼓舞，从而造成了孙传芳在江西战场上大溃败的必然趋势。

第一件事是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自治。夏超是浙江省地方实力派。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时，就是由于夏超的内应，孙才得以从福建取得浙江的地盘。后来，孙向江苏伸张势力，却还兼任浙江军务督理。再后，孙虽然不再兼任浙江军职，却又派卢香亭任浙军总司令。这就使夏

超与孙传芳之间加深了矛盾。当孙传芳派卢香亭率师援赣时，广东国民政府派人与夏超联系，委夏为北伐军第十八军军长兼浙江省民政长（即省长），叫他在浙江宣布自治。夏超即秘密联络地方派军人，拟将驻防徐州的浙军第一师陈仪部和在江西的浙军第三师周凤岐部调回浙江。经过一段时间的 secret 准备后，夏超于10月16日在浙江宣布自治。对此，孙立即抽调苏军进入浙江进攻杭州，加以扑灭。夏超于10月23日在撤出杭州的途中，被枪杀，自杀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这后院起火必然对前方五省联军部队的士气产生严重影响。

在夏超准备自治的过程中，驻守江西德安的周凤岐即派参谋樊嵩甫与北伐军秘密联系，不仅密报了孙传芳在江西的兵力及其作战部署，而且秘密策动苏军第一混成旅陈光祖部准备一同倒戈。他们起初约定在10月上旬北伐军再攻德安时加以响应，后又打算于10月12日晚全部在星子县渡过鄱阳湖开拔回浙。后来因为德安为苏军颜景崇部恢复，孙传芳调周师回驻九江，并且派部队加以监视，致使周师不能行动。浙江自治被扑灭后，周又再次与北伐军约定，如北伐军再攻德安和九江，陈光祖和周凤岐两部即放空枪树黑白旗为响应标志。

第二件事，是福建周荫人的大溃退，北伐军入闽部队的迅速占领闽南。北伐军入闽作战比湖南、江西要晚。当北伐军出师湖南时，周荫人曾与广东国民政府军队订立和平条约，划定诏安为缓冲地带，双方宣布戒严。9月初，江西战事发动后，孙传芳派周为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

令，要他带兵进攻潮汕，闽粤边界的局势才突然紧张起来。福建周荫人指挥的军队除他直辖的第十二师外，还有暂编第一师张毅、第三师李凤翔、第二十混成旅李生春、第二十九混成旅孔昭同等部。9月下旬，北伐军分三路攻闽，一路由饶平攻诏安、云霄，一路由蕉岭攻武平，一路由大埔攻永定。驻守闽南的周荫人所属各部纷纷向后逃跑。从10月上旬到10月下旬，北伐军在福建民军的配合下，未经大的战斗即占长汀、漳州一线以南广大地区。这大大影响到江西战场上五省联军的斗志，同时也减少了北伐军在赣闽边防的压力，使赖世璜部免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安心地向赣东前进。

第三件事，是为孙传芳运送军火的江永轮在九江突然爆炸，使孙军的接济受到严重的损失。江西用兵期间，孙传芳将华商招商局和三北公司行驶长江的全部轮船扣作军事运输。10月16日黎明，载有孙传芳增援江西的士兵1500名，佚役500余名、子弹2000箱、大炮8门、光洋30万元、棉被3000余床、棉衣4000套以及炮弹、面粉等大批军用物资的江永轮突然爆炸起火。结果，1500名士兵仅800名获救，军用物资也悉数被烧毁。而这一行动正是革命党人潜入九江发动海员工人干的，是九江群众打击敌军，支援北伐的一次重大行动。

（二）南浔铁路沿线的大决战

北伐军最后歼灭五省联军主力的作战地点，是在南浔铁路沿线。

担负进攻涂家埠至九江之线的北伐军左翼军首先向德

安和马迥岭进攻。11月1日，第七军和第四军十二师向德安、独立第二师向马迥岭靠拢。德安守敌陈光祖部大部驻河东北岸，余部分驻小尖岭、香山、狮子岭、毛家湾一带。2日，第七军进抵德安县郊时，陈部略作接战，即沿河北岸向东南撤退，北伐军未经大的战斗即占领德安县城。但是，马迥岭方面战斗却异常激烈。该处守敌为颜景崇旅，颜部凭借坚固工事抵抗北伐军。战斗发生后，原驻黄老门、沙河一带的上官云相的第七师第三旅和马登瀛旅立即增援颜部。第七军也抽调第一旅和第四军第十二师赶赴马迥岭加强北伐军的攻击力量。激战至3日清晨，北伐军向马迥岭之敌发起全线攻击，颜、马、上官等敌向黄老门、沙河和九江狼狈溃退。

北伐军攻克德安和马迥岭，粉碎了敌军南北夹击北伐军的计划，截断了南浔铁路的交通运输。这时，卢香亭部在涂家埠、郑俊彦部在乐化至南昌一线均陷于极大的混乱之中。孙传芳正在武穴准备亲自主持发动对武汉的强大攻势，得到以上消息后，赶紧于4日晚乘船抵达湖口。而北洋军阀委派的九江军政大员如赣北镇守使李鸿程、浔阳道道尹邹日奎、九江海关监督高培枢等，均于4日携带家眷逃往九江英租界。联军预备队兼九江戒严司令周凤岐的司令部也急忙将周字大旗取下，所有该师一切军用品都运往招商局码头开赴湖口。日本和英美等国军舰水兵也以保护侨民为名，作好战斗准备，九江英租界内安设大炮，租界内外的交通完全断绝。

11月3日，北伐军乘马迥岭之战胜利的威力继续挺

进。独立第二师兵分两路，向九江和瑞昌前进，除以第六旅攻瑞昌外，主力第一、二、三旅又分两路向九江前进：一路由马迴岭横出莲花洞，一路由马迴岭向黄老门、沙河前进。3日下午5时，敌军驻莲花洞的两团守敌与独立第二师第二旅激战4小时后经十里铺向江边溃退，北伐军乘胜追击，溃军纷纷登轮向下游撤退，4日，敌军颜、马、上官等旅在沙河、赛湖一带背水而战，殊死抵抗，激战1昼夜后向九江城郊溃退，陈光祖部表示与北伐军合作，不战而退星子。北伐军向九江城追击，在官牌闸又与颜旅发生激战，颜部被歼1000余人，剩下2000余人被缴械。守城敌军周凤岐部以小部在九江城内略作抵抗，大部向湖口溃退。5日清晨，九江即为北伐军攻克，7日清晨，又克湖口。与此同时，第六旅何培基部也于5日上午攻克瑞昌，驻守该地的皖军刘凤图、毕化东两旅于4日晚略作抵抗即逃往武穴，7日，武穴也被攻克。

九江为长江中下游重镇，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九江为北伐军攻克，不仅使江西战场上的敌军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而且对湖北战场上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原来准备进攻鄂东南的陈调元、王普、叶开鑫、马济等部纷纷从武穴、蕲春经黄梅向安徽宿松、太湖、安庆一带夺路而逃，武汉三镇来自鄂东南的威胁得以解除。而在仍由孙传芳统治下的安徽安庆和芜湖则引起极大震动。

九江攻克的同时，北伐军第七军还向涂家埠开进。这时，涂家埠驻敌卢香亭部已于11月3日大部开往乐化增援，一部向星子溃退。11月5日，北伐军第四军第十二

师向星子追击，第七军由德安开涂家埠，卢香亭师第四旅崔锦桂部被迫向吴城溃退。这时，第七军得知新建、蛟桥、乐化一带的孙军主力向第六军反扑，第六军几被包围，于是分出两团前往增援，主力仍向吴城攻击，结果吴城敌军 1000 余人除少数乘船逃跑外，大部被缴械，敌第三方面军第三军司令官崔锦桂也被俘虏。

当北伐军左翼部队向敌进攻时，11月2日，中央军第六军和总预备队第一军第一、二两师也从安义向蛟桥、芦坑、乐化之线进攻，敌军卢香亭、郑俊彦两部拼死抵抗。卢又调涂家埠守军主力向乐化增援。鉴于敌军主要兵力配置于土地岭、桃花岭及安峰尖一带，11月3日，第六军第十九师采取避实击虚战法，由梅岭山间小道进攻芦坑，敌军不得不抽调桃花岭、土地岭方面的兵力，向芦坑增援。经过3天激战，第六军于5日击溃当面之敌占领涂家埠，与第七军和第一师会合。第二师则从大塘尾追溃敌，当追到下湖庄附近时，击破残敌 3000 余人的最后顽抗，激战 3 小时后，将敌一部歼灭，大部被缴械，敌第三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刘士林也被俘虏。

当第六军和第七军各一部在涂家埠会师时，右翼军第三军和第二军第六师仍在南昌牛行车站至蛟桥一带与敌激战。在敌郑俊彦部拼死反扑下，北伐军阵亡团长 3 人，士兵伤亡 2000 余人，几被敌包围，情势十分危急，此时，第六军第十七、十八两师四个团、第七军第一旅一、二两团和第一师由白崇禧率领于 11 月 6 日由涂家埠赶来增援。敌军见北伐军援军已到，不得不于 6 日晚渡过赣江向

南昌东北方向滁槎逃跑，第二军第六师、第三军第八师和第七军第一旅各部续渡赣江尾追溃敌。8日在滁槎将郑俊彦所属各部和南昌溃退的张凤岐师第八旅共20000余人缴械，敌第二方面军第一、三、四三军司令官李彦清、王良田、杨赓和和旅长牛明光等人全被俘虏。

(三) 北伐战争在江西战场上的全面胜利

当北伐军在南浔铁路全线发起总攻击以后，从11月1日到8日短短几天内，孙传芳五省联军派到江西的各部先后被歼灭，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这时，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不得不于11月5日从湖口改乘决川军舰逃往芜湖，7日再黯然回到南京，而他离开南京到江西督战是9月22日，至他回宁前后还不到一个半月，他果然应了自己所说的“很快就会回来”的话，但却不是得胜回来而是战败而回。为了掩饰失败惨状他回到南京后，立即宣布五省一律戒严，在戒严中，还吹嘘自己“出师以来，迭获胜利，捷音所播，遐迩共闻。”^①但这也丝毫挽救不了五省联军在江西战场的彻底失败。

由于五省联军在南浔铁路全线的大溃败，加上主帅逃跑，驻守南昌城内的敌军就成了瓮中之鳖。此时北伐军右翼军右纵队第二军四、五两师在攻占赣东各县后，迅即由进贤回师，向南昌靠拢。11月1日驱逐南昌东南谢埠、邓家埠一带之敌。2日，将南昌城三面包围，只空出沿河

^① 《孙传芳已返宁，宣布五省一律戒严》，载《申报》1926年11月19日。

一面。南昌守敌张凤岐、唐福山、岳思寅和蒋镇臣等部再一次在城内展开了疯狂的大抢劫。3日清晨，郑俊彦见大势已去，率领所部两团离开南昌，向鄱阳湖逃跑。岳、张、唐、蒋等部闭城而守并一度要求他们以前的老上司，现在北伐军方面的将领方本仁前往收编（方曾去联系过收编事被软禁后放出），但被拒绝。北伐军命令他们开往德胜门外七里街一带听候改编，岳、蒋等犹豫观望。北伐军8日破城而入，守敌10000余人全部被俘。岳思寅、张凤岐、唐福山等被俘，仅蒋镇臣化装逃脱。10日，岳、张、唐等3名罪大恶极的军阀在南昌人民的要求下被处决。

南昌攻克后，溃向赣东北的苏浙联军和少数原来驻赣的杂牌军继续向皖、浙边境撤退，11月14日，北伐军又相继占领彭泽、马当和景德镇。至此，江西全境的残敌均已肃清，北洋军阀对江西13年多的统治即告结束。

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 人数诸问题的考辨

周 兴 樑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过去60多年了，关于它的代表人数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近因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较广泛地查阅了有关的资料及论著，现就国民党“一大”代表的总人数、实际出席大会的代表数及其中的共产党员代表等问题，对以往不确的说法，作一辩证。

一、国民党“一大”代表数的 纷纭众说及其原因

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人数，据笔者所见，至少有156人、160人、165人、189人、196人、198人、201

人、208人等八种不同的说法^①。

出现上列纷纭众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观而论，国民党“一大”遗下的这方面的资料较少，后人的记述又各不相同。就主观来说，论者往往忽略对这一问题的考订，信手摘录某一材料；有的论者虽进行过考订，但因参考的资料欠完备，而未能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因此，进一步考订核实这一问题，仍属必要。

国民党“一大”代表名额的确定和实际代表的指派与选出，情况较为复杂。1923年冬，负责发起与具体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开会议决过“一大”的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当时议决每省代表额6名，“由各省区党员互选3人，总理指派3人”，“至海外党员人数众多，每支部定派1人，……分部亦推派1人，但无表决权”^②。

① 参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1卷，第183页；《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64页；《中国国民党“一大”60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9、52页；《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关于中国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人数问题》；《中国国民党史稿》一卷本，第358—361页；《国父年谱》增订本，第1053页；《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一期《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若干史实考》；《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14页。每种说法皆可见于多种论著中，此仅列出一种，其余不一列出。

②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记》，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26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一大”预备会上未指出这一原则何时决定的，只笼统说“在筹备改组之先”的一次谈话会上定的。关于时间问题，《国父年谱》下册指明是在1923年10月28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参见该书第965页；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下册，则认为是在同年11月26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参见该书，第1595页。

如按照这个原则推算，国内 24 省，“合计代表名额全数 144 人，海外总支部、支部约 12 人”^①。实际上，当时议定的原则，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了较大的修改和变更，所以它不能作为我们考订代表人数的依据。

首先，孙中山指派和各地推选的代表均未严格按照“每省各 3 人”的原则，而是有些变更。从现在看到的史料，只有 11 省、市遵循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订的“一大”代表由孙先生指派 3 人，各省、市自选 3 人这一原则。其余的一些省、市，由孙中山指定的代表，或由各省选出的代表，都有多于 3 人或少于 3 人的情况。如湖南省，在推举国民党“一大”代表时，发生了舞弊现象，而会期将近，不能复选。于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议决：“将该省选举时所封存之票，由本委员会定期开票，将所得多数者依次列出 12 名，呈请总理选派”^②；结果，该省由孙中山指定和党员推选的代表名额，各为 6 人。还有些省份因交通不便或出现邮电扣留等情况，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为在各该本省区地方不能选举，或已指派者不能到会，故由在广州的党员选举或就广州的党员中指派。不料开会时，内地代表同时莅止，总理

^①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 1595 页另《新民国杂志》第 1 卷第 4 期，范体仁所写《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开会记》谓：“海外各分部由总理指派 10 人”。

^②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1597 页。

特命一并出席”^①。这样就出现指派的代表数或选举的代表数均在3人以上的情况。如直隶、奉天、山东、吉林和汉口特别区，孙中山指派的代表各为4人，山西和河南指派的代表还多，分别为5人、7人；上海特别区和安徽选举的代表则各为4人，江西省推出的代表为6人。还有一些省份，因党务问题等种种原因，出现指派或推举代表均不足3人的情况。如新疆、西藏两地，孙中山指派的代表分别为1人，这两个省和蒙古、甘肃均无推举出来的代表；奉天推选代表仅为1人，四川和陕西两省，选出的代表也各只有2人。

其次，海外各支部、分部的代表人数，经孙中山同意几经增加。如前述，海外总支部或支部原先共定代表额12人，由孙中山指派；分部推派的代表（每分部1人）无表决权。到1924年1月中旬国民党“一大”召开前，莅粤“各代表以海外分部代表来粤甚多，若无表决权，殊失海外同志之心。乃推举澳洲暨南太平洋群岛总支部代表黄右公、加拿大代表黄季陆、墨西哥代表余和鸿、西贡代表何觉非等同谒大元帅，请准海外各部代表得有表决权，经帅同意加海外分部代表6人。而各代表仍以海外同志众多，只占代表18人，为额甚少。特又由黄等趋谒帅座，陈述来意，经准加派海外代表10人，由各总支部代表推

^① 范体仁：《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记》，《新民国杂志》第一卷第4期，1924年2月20日出版，第3、3—6页。

荐指派”^①。从现有材料来看，海外总代表人数实际上超出孙中山同意的 28 人，指派与推荐代表计有 37 人。

第三、除上述 24 个行省外，当时确定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和哈尔滨五大城市为特别区，可以按一个省的代表额指派和推举代表，而且，国民党“一大”召开前，“代表资格，其中稍有变更”并为此设立了“资格审查委员会”^②。关于这一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现尚未看到，从旁的一些资料来推测，这一委员会大概讨论决定了某些省、市代表的递补及已到达广州的代表参加会议等问题，并且还议决了包括国民党总理在内的所有未被指派或推举为代表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秘书长得列席国民党“一大”会议，享有代表的资格与一切权利等一系列问题。

国民党“一大”在筹备过程中，代表指派与选举出现的上述这些复杂情况，给后人确定大会代表人数增加了一些困难。这也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列有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的报刊资料与论著中，常常出现代表数目记载不一和具体名单上的大同小异情况的原因之一。

①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记》，上海·《民国日报》，1924 年 1 月 26 日。

② 廖仲恺：《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上的报告》，《双清文集》上卷，第 602 页。

二、有关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的各种记载

就笔者目前所见到列有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的报刊资料和论著，有以下几种：

(一)《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7日列有孙中山前一天指派的国内直隶等21省市代表名单57人。同年1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转载了这份名单。该两报均称：“粤省及北京上海两特别区，经已指派，六号复由总理将各省应指派代表，一律派定”，“尚有湖南、福建二省未指派。”^①可惜，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福建等省市孙中山指定的“一大”代表名单，在这两份报纸上目前均未见有刊出。

(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事录》(以下简称大会记事录)之十“附录”，列有“一大”代表名单197人，其中国内各省市男代表157人，女代表3人，海外国民党各总支部、分部代表37人^②。

(三)《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4期所载范体仁写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记》一文(以下简为“大会开会记”)，列有“一大”代表名单194人，其中国内各地男

^① 参见《国民党指派代表人名录》，《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月7日；《国民党指派代表题名》，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13日。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事录》，1930年8月校印本，“附录”第114—119页、119—120页。

代表 153 人，女代表 3 人，海外各埠代表 38 人^①。

(四) 邹鲁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以下简称“史稿”）“组党”编下，列有“一大”代表名单 198 人，其中国内各地男代表 156 人，女代表 3 人，海外各埠代表 39 人^②。

(五) 台湾省出版的《革命文献》第八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举行》中，列有“一大”代表名单 198 人，其中国内男女代表 159 人，海外代表 39 人^③。

(六) 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以下称“参考资料”）列有国民党“一大”的“出席代表名单”198 人，其中国内男女代表 159 人，海外各地代表 39 人^④。

(七)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在记录国民党“一大”会务进行情况时，列有大会发言代表名单 40 人，此外还有孙中山、刘芷芬和大会主席团 5 人，共为 47 人。

(八) 司马璐编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 3 部第 2 章《国民党的改组》内，列有出席国民党“一大”的跨党

① 范体仁：《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记》，《新民国杂志》第一卷第 4 期，1924 年 2 月 20 日出版，第 3、3—6 页。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1938 年 7 月修订本，台湾 1965 年 10 月重印一卷本，第 358—361 页。

③ 《革命文献》第 8 辑，台北 1955 年 3 月印行，总第 1100—1103 页，它虽称代表总额为 196 人，但列出名单却实际为 198 人。

④ 安徽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1980 年 8 月版，第 46—49，第 44—45 页。

的共产党人代表名单 23 人（下文将具体开列）。

以上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人数名单的八种记载，其史料价值是不一样的。《广州民国日报》及上海《民国日报》所列的代表名单，虽不完全，但它是会前孙中山亲自指派各省国民党“一大”代表的报导，可视为当时难得的原始材料。“大会开会记”和“大会记事录”上所列的名单，不仅齐全与完整，而且具有可靠的权威性：“大会开会记”出版于 1924 年 2 月 10 日；“大会季事录”虽只看到 1930 年 8 月的“校印本”，但其扉页上却仍印有原版孙中山亲自批写的“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等字样，显然，这本“大会记事录”，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于“一大”后审定印发的关于这次大会情况的资料专集^①。因此，这三份名单，可以互相参照印证，作为推定国民党“一大”代表人数的主要史料依据。

至于“史稿”、“革命文献”、“参考资料”三者所列的“一大”代表名单，实际上可能是一份名单，后二者所刊名单，大概是由“史稿”的名单转录而来，致使这三份名单内代表的人数一致，只少数人名字的文字上，互有正误之处。更令人难解的是：它们三者都将“哈尔滨”特别区的代表，指为海外华侨之列；并将女代表陈璧君错列为兼任南

^①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记事录》目录后之扉页批语。笔者所见“大会记事录”目录开头注明此系“原版卷面”后还有“校印后记”对之说明。整本记事录分为十大类：贺电、祝词、宣言、总章、决议案、议事简明表、党务报告、党务提案存目、函电、附录。校印本“大会记事录”封面盖有“秘密”，“民国十九年八月拾□日收到”等印记。

洋代表。实际上，哈尔滨市当时和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城市一样，是作为一个特别区来指派和选举代表的，决不能将它视为海外支部的华侨代表；孙中山是一位精明的人，在海外代表名额紧张的当时，他决不会指派陈璧君一人为两种身份的代表。此外，“一大”会议录提供了部分代表的座次编号，司马璐所编《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提供了部分共产党员代表名单（不完全）。以上五种资料，只可供考察国民党“一大”代表人数时参考。

三、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的总人数

现依据《广州民国报》、“大会开会记”、“大会记事录”所列的三份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参考其他资料，对各地指定与选出的国民党“一大”代表的总人数，作一考订。

上述三份可靠的名单，在具体记载上仍有不吻合之处^①，笔者认为：孙中山指定的国民党“一大”代表共为122人，其中国内各省市代表99人，港澳和海外各代表23人。

孙中山指派的国内各省市代表名单是：

广东省：廖仲恺、邓泽如、陈树人。

^① 这三份名单的不吻合处在于：有些省市指定和推选的代表名单不一，有些人名单相同却又在“指定”或“推举”上排列不同，还有个别人所属地区说法不一致等。凡遇以上情况，笔者参证考订后依其中一种记载酌定，或将名单同时列下。在随后各省市及港澳海外各地的名单下，对此不一注明。

广西省：刘 岷、苏无涯、覃 超。
云南省：李宗璜、杨友棠、胡盈川。
贵州省：周仲良、李元著、王 度。
四川省：杨庶堪、赵铁桥、谢 持。
福建省：丁超五、黄韞山、刘 通。
湖南省：程 潜、谭延闿、陈嘉佑、李执中、
谢 晋、刘 况。
江西省：萧炳章、彭素民、王 恒。
浙江省：杭辛斋、沈定一、戴传贤。
直隶省：张 纯、王法勤、于树德、李永声。
湖北省：田 桐、刘成禺、詹大悲。
安徽省：柏文蔚、张秋白、陈独秀。
江苏省：茅祖权、刘云昭、狄 侃。
山东省：于观成、丁惟汾、张苇村、王乐平。
山西省：王用宾、刘孟训、刘景新、谷思慎、
韩书麟。
陕西省：于右任、路孝忱、焦易堂、张兆基。
奉天省：朱霁青、杨大实、宁 武、祁耿寰。
吉林省：李希莲、董耕云、徐清和、何 猛。
黑龙江：田铭章、乔 根、傅汝霖。
河南省：刘荣棠、张善与、丁 騫、李存智、李
衡、宋聘三、王传恕。
甘肃省：师世昌、张震枢。
西 藏：乌勒吉。
蒙 古：恩克巴图、克兴额、白云梯。

新 疆：张凤九。

广州特别区：谭平山、孙 科、吴铁城。

上海特别区：叶楚伦、何世楨、伏 彪。

汉口特别区：居 正、李 法、夏 声、彭介石。

哈尔滨特别区：秦广学、张识尘。

北京特别区：李守常、谭熙鸿、延瑞祺。

妇女界代表：何香凝、陈璧君、唐允恭。

孙中山指定的港澳及海外各地代表名单是：

香港：阮 旺、李 林。

澳门：蔡世芬。

美国：叶崇濂、陈汉子。

墨西哥：黄宽禄。

加拿大：赵卫平、黄发文。

南 洋：陈鸿锐。

暹 罗^①：林伯岐、萧佛成。

缅甸仰光支部：黄德源、黄复生。

越南海防支部：冯苇渔。

越南河内支部：陈觉梦。

越南西贡总支部：林永伦。

西贡薄寮分部：何觉非。

西贡金欧分部：邱家荣。

芙蓉支部：萧振堂。

菲律宾吡叻：赵鸿汉。

① 今泰国

联义分部：林达生。

日里棉兰分部：梁如九。

尾利伴：雷 鹏。

还是以前述三份资料所列名单为根据，国内外各地自己推选的代表共计 90 人，其中内地各省市代表 76 人，海外各埠代表 14 人。

国内各省市自推的代表名单是：

广东省：冯自由、谢英伯、胡文灿。

广西省：蒙卓凡、施正甫、徐启祥。

云南省：周自得、杨华馨、刘国祥。

贵州省：凌 霄、筒 书、韦 杵。

四川省：刘詠、刘泉如。

福建省：许卓然、林丽生、林黄巷。

湖南省：林祖涵、邹永成、罗 迈、夏曦、袁达时、毛泽东。

江西省：赵 干、刘伯伦、洪宏义、徐苏中、胡谦、周道万。

浙江省：戴 任、胡公冕、宣中华。

直隶省：韩麟符、于兰诸、陈镜湖。

湖北省：刘 芬、张知本、孙 镜。

安徽省：李次宋、曹似冰、杨 虎、凌 毅。

江苏省：顾子扬、朱季恂、张凌霄。

山东省：王尽美、杨泰峰、孟广浩。

山西省：邓鸿业、苗培成、赵连登。

陕西省：姚丹峰、江伟藩。

奉天省：王秉谦。

吉林省：张晋、李忠选、赵志超。

黑龙江：龚德宣、常毓望、韩喜亭。

河南省：王友梅、赵峻、薛广汉。

广州特别区：方瑞麟、陈竞西、董维。

上海特别区：黄詠台、张拱辰、谭惟洋、朱之洪。

汉口特别区：李能至、廖乾五。

北京特别区：许宝驹、谭克敏、石瑛、张国焘。

海外各埠推举的代表有：

檀香山支部：刘福球。

美国三藩市支部：刘芦隐。

墨西哥支部：余和鸿。

日本神户分部：刘土木。

日本东京第二分部：宋垣忠。

暹罗分部：陈美堂。

西贡美荻分部：许英祥。

西贡金边分部：陈有庚。

菲律宾第二分部：梁为杰。

菲律宾怡朗支部：杨挺秀。

加拿大支部：黄季陆。

澳洲雪梨支部：黄右公。

已城支部：李国瑞。

越南西贡总支部：陈彪生。

以上所列孙中山指定及各地选派的海内外国民党“一大”代表共计 212 人。另参照国民党“一大”会场席次图名

单，尚有席次第 122 号朱叔痴、134 号李宗选（“一大”会议录误为：李宗运和 173 号刘百泉三人未列入上述名单（见后附表一）。此外，还有人多次提到瞿秋白“经孙中山提名”也“出席了大会”^①。这样，由孙中山指定和各省、市、各埠选出的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总人数应是 216 人（列席者不包括在内）。

四、关于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实际人数

国内外各地被指定或被选出的国民党“一大”代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的临时负有孙中山指派的某项特殊使命（如湖北代表田桐奉命赴沪），有的因工作关系无法与会（如安徽代表陈独秀），有的因病重入院治疗未能

^① 参见陈铁健：《国共合作初期的瞿秋白》，《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210 页；《瞿秋白与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学说》（系纪念孙中山诞辰 120 周年“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可惜的是作者未列出资料出处，不知瞿秋白应属何地代表。目前瞿秋白的名单在见到的各种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名单中，均未列入。此外，在国民党“一大”筹备的过程中，据张国焘回忆说：“鲍罗廷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在他那里，任他的助手和翻译……其中有这次大会的宣言和草案，是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见《我的回忆》第一册（下），第 316 页；周恩来同志也曾谈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66 页。从当时瞿秋白在国民党改组中的地位及他在“一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来看，瞿秋白参加了国民党“一大”会议，完全是可能的；同时也有当时的集体照片以资佐证。

动身（如浙江代表杭辛斋），有的因交通受阻不能前来（如新疆代表张凤九），等等。因此，这216位代表，并没有全数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一大”会议。

到目前为止，笔者见到与会者的名单有两种：一是前述“大会记事录”之十附录中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场席次图”，上面排列了“一大”会场内196位代表的姓名和席次编号。这是一份不可多见的国民党“一大”会议与会者的原始姓名单，为保留其史料的原始性，现将它附录于本文之后。二是前述“参考资料”中，有一份《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题名》^①，上面除列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及大会主席团成员胡汉民、汪清卫、林森、李大钊、谢持外，还列有出席大会之代表名单计196人（李、谭又重列在北京、四川代表名内）。这份名单，在与会代表数目上恰与“会场席次图”之人数相同。但在具体的名单上，它与“会场席次图”仍有所不同。该名单上的上海朱之洪、浙江代表杭辛斋、哈尔滨特别区代表张识尘等人，在“会场席次图”中未见；值得指出的是，当时病危并未与会的杭辛斋也居然列名其上^②。笔者将这份“大会

^① 安徽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1980年8月版，第44—45、46—49页。

^② 国民党“一大”代表杭辛斋，因病重未出席“一大”会议。他于1924年1月24日在上海病逝后，26日，沪上部分议员电请孙中山予以褒扬，28日“一大”会议据冯自由提议，议决以大会名义致电吊唁杭辛斋。参见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27日，《留沪议员电请褒扬杭辛斋》；《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

代表题名”与“大会记事录”中的“代表名录”比较，除缺少暹罗支部代表萧佛成和几处名单有显然错别字外，其题名之地区顺序和名单之排列，几与“代表名录”相一致。笔者认为，这份“题名录”可能不是当时与会代表的题名，而只是一份不完整、姓名有错漏的“一大”代表名单。

我们在确定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具体代表时，只能依据“会场席次图”上的编号代表名单。不过，从现见材料看，“会场席次图”也有遗留之处，如北京代表张国焘实际上是参加了会议的，后为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作准备工作，提前离开广州返北京^①。因此，实际报到与会的代表应为 197 人，其中国内各省市代表 160 人，海外代表 37 人。前述的 216 名代表中，未与会者除已指出的田桐、陈独秀、杭辛斋、张凤九外，尚有于观成、王用宾、刘孟训、杨大实、宁武、丁寿、师世昌、彭介石、张识尘、韦杵、朱之洪、谭延闿、张纯等未出席这次会议。应指出的是，有些代表抵广州后，因病或因事并未莅会，故国民党“一大”会议录所记每天大会实到人数，始终未达 197 人，到会人数最多的 1 月 30 日上午，也才有 175 人。

在考察国民党“一大”实际出席人数时，还应将享有正式代表资格与权利的人考虑在内。这些人包括孙中山（国民党总理）、刘芷芬（大会秘书长）、瞿秋白（大会宣言起草者之一）以及列席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下），第 315、319—321 页。

1923年10月24日和11月8日，孙中山曾两次指派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执行委员会19人，经查核其中11人已充任各省市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余下8人也享有国民党“一大”代表的资格与权利。从国民党“一大”会议录记载看，出席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与候补委员最多的一次是6人再加上孙、刘、瞿3人（1月20日上午）^①。这样，因特殊身份而出席国民党“一大”会议者共计9人。据此，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大会法定人数，总共应是206人。

五、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 中的共产党人数

各地被孙中山指定及自选出的国民党“一大”代表中，兼跨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目前可以确定的有26人，其中孙中山指定者9人，各地选出者17人。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守常）、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詹大悲、谢晋、李永声、瞿秋白、林祖涵（伯渠）、李能至（立三）、于方舟（兰渚）、罗迈（李维汉）、夏曦、张国焘、毛泽东、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

^①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号。另《学术月刊》1985年第4期蔡鸿源、孙必有《关于中国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人数问题》一文称1月30日上午有“临时中央执委14人”与会，实误。查当天会议录，列席会议的临时中央执委为4人。参见同前“会议录”第16号。

符、王尽美、陈镜湖、赵干、刘芬、袁达时^①。“一大”共产党员代表人数约占总代表数的12%。

上述国民党“一大”这26名共产党员代表，从“会场席次图”及其他资料来看，有24人出席了“一大”会议，仅陈独秀、刘芬二人未到会。共产党员代表李大钊、谭平山、张秋白、毛泽东等人，为国民党“一大”的筹备以及大会的圆满成功和国共两党革命联合战线的正确建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积极的贡献。

附录：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场席次表（名单后数字为座号）：

凌 霄 1	孟广浩 2	王尽美 3	沈定一 4
李元著 5	黄馥生 6	丁惟汾 7	戴 任 8
刘 岫 9	杨 虎 10	陈觉梦 11	刘永福 12
刘伯伦 13	叶楚傖 14	于兰渚 15	刘国祥 16
陈汉子 17	赵卫平 18	黄发文 19	周道万 20
廖乾五 21	邓泽如 22	李大钊 23	李国瑞 24
李希莲 25	狄 侃 26	张秋白 27	朱霁青 28
林祖涵 29	冯自由 30	陈镜西 31	张凌霄 32
张知本 33	梁为杰 34	伏 彪 35	张苇村 36
杨华馨 37	乔 根 38	毛泽东 39	杨庶堪 40
谭熙鸿 41	黄德源 42	王友梅 43	谢英伯 44

^① 参见司马璐编：《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三部，第57页；《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10、222页；《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2页。

邹永成 45	柏文蔚 46	林伯歧 47	刘 通 48
周仲良 49	黄季陆 50	林达生 51	赵鸿藻 52
延瑞祺 53	薛广汉 54	阮 旺 55	黄宽禄 56
冯莘渔 57	施正甫 58	许宝驹 59	杨友棠 60
刘福球 61	邱家荣 62	苗培成 63	刘士林 64
杨泰峰 65	董 维 66	居 正 67	丁超五 68
胡公冕 69	胡文灿 70	刘芦隐 71	谭 敏 72
吴铁城 73	张宸枢 74	洪宏义 75	杨挺秀 76
李 法 77	刘泉如 78	萧炳章 79	许英祥 80
宋垣忠 81	陈镜湖 82	罗 迈 83	蒙卓凡 84
宣中华 85	谭惟洋 86	萧佛成 87	徐苏中 88
石 英 89	刘 况 90	赵铁桥 91	赵 干 92
袁达时 93	陈树人 94	彭素民 95	陈鸿悦 96
胡 谦 97	苏无涯 98	叶崇灏 99	谢 持 100
张 晋 101	茅祖权 102	何香凝 103	陈璧君 104
方瑞麟 105	朱季恂 106	林丽生 107	江伟藩 108
何觉非 109	黄右公 110	赵志超 111	覃 超 112
王 度 113	李能至 114	李执中 115	李次宋 116
林黄巷 117	韩喜亭 118	韩麟符 119	于树德 120
白云梯 121	朱叔痴 122	谭平山 123	夏 曦 124
常毓 125	于右任 126	孙 镜 127	陈有庚 128
孙 科 129	林永伦 130	王法勤 131	傅汝霖 132
戴季陶 133	李宗选 134	周自得 135	刘云昭 136
刘 芬 137	赵连登 138	黄温山 139	廖钟恺 140
赵 峻 141	黄泳台 142	陈楚生 143	恩克巴图 144
曹似冰 145	龚德宣 146	邓鸿业 147	张拱辰 148

- | | | | |
|---------|---------|---------|---------|
| 筒 书 149 | 余和鸿 150 | 何世楨 151 | 田铭章 152 |
| 蔡世蕤 153 | 谢 晋 154 | 王 恒 155 | 陈美堂 156 |
| 詹大悲 157 | 刘景新 158 | 萧振堂 159 | 刘成禹 160 |
| 乌勒吉 161 | 梁如九 162 | 秦广学 163 | 胡盈川 164 |
| 夏 声 165 | 祁耿寰 166 | 董耕云 167 | 克兴额 168 |
| 王秉谦 169 | 李宗黄 170 | 张兆基 171 | 王乐平 172 |
| 刘百泉 173 | 陈嘉祐 174 | 焦易堂 175 | 宋聘三 176 |
| 何 猛 177 | 顾子扬 178 | 程 潜 179 | 李 衡 180 |
| 徐清和 181 | 王传恕 182 | 李永声 183 | 富 鹏 184 |
| 唐允恭 185 | 徐启祥 186 | 李存智 187 | 许卓然 188 |
| 路孝忱 189 | 张善与 190 | 刘荣棠 191 | 李 林 192 |
| 谷思慎 193 | 姚丹峰 194 | 韩书麟 195 | 凌 毅 196 |

更 正

本刊第30辑内封中有两处错误：第三十期，应为第三十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室编，应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

1989年9月